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5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朝阳科普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75 印张 170 千字

199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7000 册

ISBN 7-80023-535-1/K·513

定 价:4.50 元

目 录

回忆录

- 回忆延安南昌公司 杨 琦 (1)
隐蔽战线上的一场胜利斗争 杨斯德 (13)
核武器试验场初期记事 张蕴钰 (39)

人物介绍

- 彭德怀在三线 《彭德怀传》传记组 (53)
陈树湘传略 朱光梅 (64)

专题资料

-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
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分歧 王德京 (8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

- 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 杜松 (108)
- 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完成 李孝民 (134)
- 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 寇清平 王晓伟 李永忠 (186)

译文选登

从“一二九”到“八一三”时期

- 的上海地下党..... [日] 田中仁著 张晓峰译 (206)

民国史·现代史

- 黄埔军校沿革述略 刘志青 (224)

史实考订

关于《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

- 致聂荣臻电》成文时间的考证 谢忠厚 (239)

回忆延安南昌公司

杨 琦

延安“南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昌公司”，是1943年我党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根据贺龙同志的提议，陈云同志同意，又经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而成立的，并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命名。公司的工作人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军队及地方一些单位抽调而来。该公司系公有制综合性企业，其宗旨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也是它开展经营活动的指导思想。延安南昌公司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指导和关怀下，在边区军民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公司系统全体同志的艰苦奋斗，在发展经济，繁荣市场，保障军需民用和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南昌公司的诞生

南昌公司于1943年10月正式成立。

当时的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是全国各解放区的中心，也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胜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

在军事上实行了联防。还是在整风运动高潮期间，作为两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的贺龙，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部队既要打仗，又要自己动手搞生产，以减轻两边区人民的负担的伟大任务，认为应该在大生产运动的基础上，把部队和地方机关办的一些商业货栈、手工工厂、作坊及运输行业从组织上、资金上联合起来，扩大经营领域，使资金发挥更大作用，争取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对边区群众发挥指导作用，这样势必会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产生积极作用。贺龙司令员将这一设想向当时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作了汇报，陈云同志完全支持，并要贺龙直接去请示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请求周副主席的批准。结果，周副主席不仅批准了，而且还亲自为即将成立的经济组织取名为“南昌股份有限公司”，其意是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公司很快在延安南关城南门街首处挂牌开业，并很快对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的经济发展、商品流通、物资交换和运输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南昌公司的性质

南昌公司系新民主主义公有制经济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性质载入了它的组织条例和公司大门上挂的“南昌股份有限公司”说明牌匾。南昌公司经营基金的基础是公有制，入股集资者即大公小公，不是私有。公司作为新民主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实行股份制入股分红的分配形式，这种股份集资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规模，因而也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入股南昌公司的投资者，以资金转化

为股份，投资者向公司入股投资，对公司的收益则有权按股分红。公司在完成营业额的基础上，扣除营业费用、员工开支和向政府应缴纳的税收后，其余的就是可进行分红的收益部分。当然，公司也留有公积金作为积累资金，也有公益金，用于职工福利补助。公益金虽然数量很少，却也体现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分配形式的优越性，如对那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又经过长征的年事已高的老同志，公司负责赡养，使他们安度晚年。另外，在当时经济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对体弱有病的同志也给予了保健补助。

三、南昌公司的组织机构

公司设总公司、分公司、支公司、商店（当时在延安市号称十大门市部），还有纺织厂、照像服务、墨锭加工、畜力运输队等企业经营业务。

公司的领导班子由总经理、副总经理、政治委员组成，公司机关内设科室。具体的任职情况和组织结构是：总经理钟典三，副总经理杨种南、尚振发、史林，政治委员李春田（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生），办公室秘书高杰，业务科科长杨种南（兼），副科长荣树森，指导员陈树球，会计科科长肖志军、钱亚振（女），总出纳刘宽、刘杰，总务股股长黎德，总务股工作由高杰同志分管，保管科科长曹庆云专管各商品库房，还有接待科，负责客人住宿和招揽客户。我本人在公司创建时期，先后在公司所属的大生、天顺长两客货栈担任会计、副经理等职，后又调公司本部担任办

公室主任兼业务科长。

党的总支委员会书记李慧（女），各支部大都按公司分支机构建立，总公司各支部则以科室党员多少而进行组建。

隶属公司的分公司有：晋亨客货栈、晋丰客货栈、晋恒客货栈、大成永客货栈、天顺长客货栈、大生客货栈、金隆客货栈、兴隆货栈、拐峁支公司（客货栈）、腰店子支公司（客货栈）、定边南昌分公司，还有设在山西临县的联号同济号。

总公司迎街面设一门市部，当时在延安算是商品较齐全的店铺，还有饭庄。这里每日顾客盈门，门庭若市。各分公司设的十大门市部，大部分也分布在延安市新市场和南关、北关，这样的布局，更加繁荣和活跃了延安市场。

当时，延安的南昌公司和西北土产公司、贸易公司、盐业公司，对边区的经济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以及对国统区进出口贸易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各公司之间也都相互协助，相互支持。特别是西北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叶季壮同志，对南昌公司十分关怀，经常在市场物价行情和组织货源等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记得1944年秋季来临前，为了抓住季节转换时期市场需求的大好时机，叶季壮总经理和钟典三总经理商量，让南昌公司和所属的分公司从边区外组织大量的布匹进入边区。叶、钟决定要我去陇东庆阳地区的西华池采购，并派了富有经验的公司业务科的王大（属于聘雇，陕西韩城人）相随。由于总公司、分公司的密切配合，我们采购到大批的土布和其它商品及时

投入了市场。当时恰逢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劳模大会，同时举办“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展览”，还有城乡物资交流会、骡马大会，人员云集，真是盛况空前。当时我们南昌公司也遵照上级的安排，在劳模大会会场搭设了一个规模较大的门市部，出售的布匹、土产、日用百货等种类繁多，颇为引人，连中央领导和边区的首长们也纷纷来到门市部参观。有一天，毛主席布衣简从，来到门市部柜台前，笑容可掬地询问营业人员，生意怎么样，群众最喜欢买什么，营业员一一作了回答。突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毛主席，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毛主席！顿时人群沸腾起来了。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难以忘怀。这期间，到处欢声笑语，一派喜庆景象。在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努力进行生产，积极发展经济的大好形势下，南昌公司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它为繁荣延安市场，满足城乡人民的需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南昌公司的经营方针

公司本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根据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的经济条件，将经营范围定为以农副产品、土特产为主，其中又以粮食为主。公司在夏秋季节，从各个集市大量收购粮食和农副产品，然后视市场、季节需求，再抛售出去，这样一进一出，既对城乡之间起到了调剂作用，也使公司获得了利润。当时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之间也有需要交流、交换的物资和商品。晋绥的商业单位经常派出

业务人员住延安南昌公司及各分公司，自西安、豫西、甘肃、宁夏、内蒙（也称草地）进货；而南昌公司也经常派人到晋西北通过日寇封锁线，从敌占区进货。货物运到延安后再统一由南昌公司的总公司、分公司批发经营，有的转手以差价盈利，大部分是收取佣金，还有货栈草料费收入。大部分客户都有自己的驿马骡、骆驼、毛驴运输队。记得在佣金草料食宿费收入上，有这样的一句话：“算帐不留情，给钱人对人”，意思是算帐时要分毫不差，应算的都要算上，但收钱时大部分尾数就舍掉了。往往客户在离开前，到帐房算帐时，经理或营业主任在会计把帐结算清后，便当客户面一句话就把尾数舍掉了。会计没有此权。公司这样做，客户满意，也就会吸引更多的回头客，从而使主雇之间商业关系比较固定。

当时的商品交换价格当然受本地市场支配，但也受西安和日寇统治区价格的影响。为解决币制不同带来的问题，我们规定商品计价均以银元为计算单位。在根据市场价格进货的问题上，我们也掌握了一定的规律，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宁买迟中迟，不买快中快”。意思是某些货物虽然暂时销得慢些，但过上一定的时候，就会销得快。这就要凭经验掌握市场价格和行情了。度量衡是以延安的计量为标准，在延安以外，秤是16两为1斤，但延安是折半称，即1斤半为1斤，斗以折半斗算，即1斗半算1斗，尺以老尺计。由于度量衡的关系，算起帐来要折算，颇为繁琐。有的分公司请的是中国商业界里的老管帐先生，他们采用

方本帐，有上收下支的流水帐，也有底帐即分户帐，按“四柱”（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清册，进行月度、年度决算。但公司会计制度规定，月结和年终决算要以西式帐表报送，遂先由管帐先生结帐，再由会计按收方、贷方、毛利、纯利做出年终报表，然后上报。当时的会计业务人员，既懂老式簿记，也会新的会计簿记和结算，可以说他们都具有相当高的业务能力和熟练的会计业务技术水平。

公司从边区外进的货物，主要是各种布匹、纸张、文具、印刷工具、西药、中药材、百货、卷烟等，卷烟尤以河南的鹿牌、星星牌最受欢迎。边区也有自己生产的曙光牌香烟，价格适中，大家也爱购买。南昌公司本身也经营销售物品，所以公司的同志通过经营都学到了一定的商业知识和掌握了鉴别货物质量的技术。如对豫西的三八布、四八布（一匹三丈八、四丈八）的质量、尺码，手一拿，一掂分量，对尺数估计都差不多。还学会了捆绑布，一卷50匹，一根绳子就可以捆得很结实，技术熟练在行。特别是对贵重药品，如鹿茸、麝香、红花以及黄金等的鉴定，跟着有经验的老商业工作者，也都学会了鉴别成色和质量，不至于上当受骗，这就保证了公司在经营中资金正常周转不受损失。公司的同志们责任心都很强，遇上贵重稀有的商品，那真是反复核实，确保不错不误。

五、南昌公司的行业作风

南昌公司虽然是商业单位，做买卖的，搞经济的，并且从总公司到分公司都聘请有陕西关中和山西晋中晋南以

及陕北的一批富有经验的职业商人，但公司的经营作风、生活作风却始终以延安精神为指导，形成和坚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在经营活动中更是强调经营道德，公买公卖，斗秤公平，童叟无欺，取信于民，对来往顾客也是热情接待，认真为顾客办事服务。记得有一次从陕西关中来了一队马帮商队，所驮的布匹，置于总公司院内，适遇倾盆大雨，当时又无防雨篷布，公司人员全部出动，由总经理钟典三亲自组织指挥，把商队的布匹全部都转移到了房檐下和住舍内，使得客户的财产没有受到损失。一个西安商人，将从榆林购的羊毛先运到了延安，卸在了大生客栈，但因到西安的运力一直雇不到，所以这批羊毛堆放了很长时间，不巧又遇上了雨季，大约有一月之久，大生客栈的职工们一遇晴天就赶忙为这一客户翻晒羊毛，使客户未受到大的损失。这个商人到处称赞，非常感激。总之，从总公司到分公司，凡为客商存放的货物不仅不错乱，也不丢失，客户反映信的过，放心，有信誉。有时服务员多收了钱，客户下次来时，就主动退还。在经营作风、商业道德上有这样的好信誉，充分显示了通过整风运动，公司工作人员焕发出的工作热情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思想，体现了延安精神深得人心。

六、南昌公司内的政治思想工作

公司里有一批满怀激情的年轻人，他们政治热情饱满，在工作上勤奋努力，踏实肯干，在学习上刻苦认真，奋发向上。公司每周都有时事学习，在公司党总支的领导下，由

高杰同志根据《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刊登的时事文章进行认真准备，然后，给总公司和各分公司的同志做时事报告或学习辅导。这类学习差不多都安排在晚上。夏天，点上汽灯在院内学习。每次学习，大家都按时到场。在抓时事学习和思想教育上，上下左右都认真对待，真诚地搞好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搞自由主义，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谈心活动也是经常的，心里有什么就讲什么，直言不讳，以诚相待，发扬了我党的优良作风。团结求实的公司风貌使人们愉快地工作，大家都很热爱自己的公司，更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公司的工作。我们在公司期间，公司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贪污和盗窃的事。

在公司的工作人员中，有一批参加过百团大战的同志因身体有伤病而回到延安，分配到我们公司工作。他们来时，公司开了欢迎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经理钟典三常常教育和提醒大家，一定要虚心向这些同志学习，搞好团结。在工作分配上也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使这批同志都各得其所。公司刚组建时，从一二〇师来了一批工农干部搞运输工作，他们身上有着老红军、老八路的好作风，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运输任务次次都完成得很好，对骡马的饲养也同样一丝不苟。他们的行动为公司树立了榜样。公司及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使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在公司得到了发扬。

七、南昌公司的领导作风

良好的思想作风和经营道德，使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

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公司领导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是分不开的。总经理钟典三为人处事公道正派，一心为公。他认为，做后勤工作的，就是要做到保障供给，全心全意为部队和群众服务，这点在他身上始终表现的很明显。我们和他相处，深深感到，在工作上他是我们的领导，在思想作风和生活上是我们的老师和亲切的长者。他平易近人，待人诚挚热情，对同志、对部下体贴入微，关怀倍至；他民主作风好，遇事总能以商量的口吻征询意见，并尊重他人意见；他团结同志，搞五湖四海。公司是个大摊子，不仅有部队的，也有两个边区地方上的，每个分公司又都聘有协助做买卖的工商业者，加上其他人员、股东等，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思想，也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当时最明显的是，部队同志与地方同志的作风不一样；聘请的工商业者又与我们自己同志的思想作风不一样。在这样一个人员庞杂、思想不一的状况下，钟典三同志很注意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和团结工作。他注意发挥各分公司领导的作用，在各项原则确定后，他就放手让下级干，调动了各分公司领导的积极性。他还很注重人才的使用。他经常去各分公司通过找人谈话等形式了解情况，对聘请来的工商业者，也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信任他们，关心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心悦诚服地供职。他还要求各分公司对所聘请的人员，逐一了解他们的情况，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使受聘人员深受感动。其中的不少人后来自愿参加了革命，成为我们的同志。

八、搞好统战工作争取外商

在经济工作中，南昌公司及其分公司都十分重视与陕西关中客商和甘肃、宁夏、陕北、榆林、内蒙伊克昭盟的商贾往来和交易，注意结合经营活动做好党的统战工作。虽然国民党顽固派一直用军警宪特以及封锁沟、封锁墙、碉堡、铁丝网等严密封锁着陕甘宁边区，企图困死、饿死我边区军民，但这却难不住我们，因为在抗日战争条件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沦陷区，敌伪之间有着互不信任的矛盾；在国统区，蒋系中央势力同地方实力派有着各种复杂矛盾；日本侵略者同国民党顽固派虽然在反共上有共同点，但彼此却仍有着尖锐对立，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利用矛盾，在封锁线上打开缺口，冲破封锁。此外我们还有人民的拥护。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有许多马帮脚夫，他们既有自己的骡马毛驴，又有自己的资本，既是商人又是脚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来往于延安和边区封锁线上的关口——富县的茶坊、关中的乌兰、庆阳的西华池、榆林一带三边地区、伊克昭盟的三段地（也称草地）。尤其是关中耀县的脚夫，他们差不多都是彪形大汉，很重义气，我们与他们之间通过商业买卖关系，建立起了相互信赖的信誉感和密切的协作关系。为了发展这种关系，以利我们战胜封锁，顺利经营，公司的钟典三总经理反复强调，对边区外客商特别要重视讲信誉，要以诚相待，我们延安需要商品，他们能设法运进来，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这些边区外的客商，过封锁线时，也有被察觉的，他们中有

的人甚至因此付出了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做为我们的统战对象和朋友，他们在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封锁中做出的贡献，同样值得肯定。特别是他们在同我们交易时，把边区以外地区有关经济、物价、国统区法币和金元券黑市变化情况的信息带入了延安，公司再责成我把从这些客商脚夫那里获得的情况，于每周的星期六向陕甘宁边区银行业务处长乔培新及辛波同志汇报，从而为有关部门研究边区如何有效地同国民党经济封锁进行斗争提供了材料。对来自伊克昭盟蒙古上层贵族派来的以做皮张生意为主的客商，公司也以礼相待，这些除了经营活动的意义外，也可以说是边区党的统战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年的10月，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这些来自晋绥边区在延安南昌公司担任工作人员的同志，由钟典三同志带领，依依不舍地辞别了革命圣地延安，辞别了工作数年的南昌公司，于11月到达山西兴县，进入吕梁贸易局。第二年，我们又在钟典三同志带领下，重新进入我们的老部队——一二〇师独立第四旅，不久投入了解放战争，一直战斗在大西北，直至全国解放。

隐蔽战线上的一场胜利斗争

——回忆莱芜战役前后我党对韩练成将军的工作

杨 斯 德

解放战争前期，华东我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组织莱芜战役的行动中，重视利用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矛盾，积极开展对敌第四十六军的工作，在隐蔽战线上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为我党、我军的敌军工作史写下了胜利的一页。

(一)

1947年初，蒋介石错误地判断华东我军在苏北、鲁南连续作战，伤亡重大，不堪再战，遂调集30余万部队，组织所谓“鲁南会战”。其部署是，南线以7个整编师又1个军共20个旅为主要突击集团，由整编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自台儿庄、新安镇、城头一线，分3路向临沂进攻。其中，整编七十四师、整编十一师为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整编二十五师、五十九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八十三师和第七军（未整编），多为美式装备的部队。

北线以3个军9个师（旅）为辅助突击集团，由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由淄川、博山、明水经莱芜、新泰南犯，企图南北对进，夹击我军。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则坐镇徐州督战，狂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党国成败在此一举”。大战在即，形势十分严峻。

北线敌军中，由韩练成任军长的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六军为广西部队，李宗仁、白崇禧视其为桂系最精锐的部队，号称“钢军”（以别于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的张发奎的第四军）。尤其是白崇禧对这支部队控制很紧，白的外甥海兢强和桂系另一重要人物夏威的外甥甘城成分别任该军一八八、一七五两师师长。由于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积怨很深，加上蒋历来歧视杂牌军，桂系部队在装备及生活待遇上不如蒋之嫡系，长期以来，该军上下有一股反蒋情绪。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不愿为蒋卖命，千方百计保存实力，是该军的一个基本特点。该军军长韩练成出身西北军，大革命时期曾受我党革命思想的一定影响。30年代，先后取得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任，为蒋、桂系均能接受的人物。故日后能以既非蒋之嫡系，亦非桂之嫡系的身分出任桂系主力四十六军军长。抗战后期，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参谋的韩练成，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曾于1943年夏，在重庆与我党秘密接触，周恩来、王若飞、李克农等同志与其多次见面，由此建立了联系。1946年底，韩部奉命由海南岛调往山东，进攻我解放区。韩练成行前按照白崇禧要求千方百计保存这

支部队的旨意，借故到上海，设法找到董必武同志，商议了联系办法，然后匆匆赶往青岛。

四十六军海运山东后，党中央即将与韩练成的关系转华东局，要求速派人前去联系。华东局接到中央电报后极为重视，张云逸、舒同等同志（陈毅等领导同志正率部队在前线作战）经过研究，当即指派新四军（当时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不久后才改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干部陈子谷按中央电报交待的代号前往打通关系。陈子谷同志在四十六军军部见到了韩练成，表明了自己的身分。韩对陈很客气，但未深谈，只是要求我党派中央或华东局的代表前去与其面商。陈子谷同志完成了第一步“打通”华东我军与韩的联系渠道后，于第三天返回军部汇报。

华东局对第一次与韩联系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决定派华东局群委会民运部部长魏文伯同志以“山东分局秘书长”的名义前去与韩见面。魏文伯同志打扮成一大商人模样，带陈子谷同志进入敌四十六军。在军部逗留的3天中，韩练成热情款待，多次晤谈，但仍然不谈实质问题，而是坚持要见华东局负责同志。第四天，魏文伯、陈子谷同志回到解放区。通过这次联系，使我们加深了对韩的了解，增强了做好韩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经过反复研究，华东局决定派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社会部部长舒同同志前去会见韩练成，争取韩部配合我军行动。舒主任是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派这样重要的领导

人进入敌军营垒亲自开展工作，在我军的敌军工作史上是少有的，因而不得不格外慎重。后方的同志为此专门发电报请示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陈毅同志，获得同意。舒同同志对我说过，陈毅同志的复电中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可见华东局首长对做好韩的工作下了最大决心。

舒同主任亲自“入虎穴”，需要带一名干部随同前往。经首长们研究，决定派我随舒主任进入敌四十六军。我当时任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科科长。舒主任这次进入敌四十六军，已是华东我军第三次与韩联系了。

1947年1月6日约黄昏时分，我随舒同主任抵达韩的军部驻地平度县兰底镇。此时韩去了青岛，由其副官和情报参谋等人出面招待、陪同。韩练成留了一封信给我们，内称“弟因公赴青，最迟于六号即可返回，一切请放心……”但我们6日到其军部后，韩并未归来。其后数日，行动不自由，昼夜有哨兵站岗，严密监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全、保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舒同主任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既来之，则安之，非常沉着冷静。他跟我商定，为了取得日益迫近的一场大战的胜利，冒点风险是值得的，无论如何也要见韩练成一面，争取最好的结果。

1月10日，我们见到了韩练成。舒主任首先向韩谈了战争的形势和我军准备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心，并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和各方面的情况，与韩商定了3条：（1）四十六军不主动向我进攻，看情况再议第二步打算；（2）在情

报上韩部帮助我军，该军行动随时向我军通报；（3）由陈毅司令员派两名干部帮助韩工作。至此，华东我军与韩练成建立起了关系。11日，舒主任和我安全返回解放区。

根据我军与韩达成的秘密协议，我被军区首长指派到韩部工作。同时，我建议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科副科长解魁同志与我一起派入敌军内部，华东军区首长也同意了。解魁同志长期从事敌军工作，有胆识，有经验，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

为了掩护工作和方便进出韩部传递情报，我化名李一明，对外称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学生，与韩是朋友；解魁同志化名刘质彬。因韩在山东的社会关系很多（韩早年在西北军时，随冯玉祥驻扎山东），我俩来此是为了帮韩寻找这些社会关系，以便吸收他们为初到山东的四十六军工作。开始时，我俩的名义是军部高级情报员，几天后，我被“任命”为“军长秘书”，韩部上下都称我为“李秘书”。对我俩的“任命”，韩都向南京作了报告。我俩有了这种特殊身分后，就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正式开始了内线工作。

（二）

我和解魁同志于1月中旬到韩部“上任”。几天后，韩的军部移驻胶县附近，留驻兰底的还有1个师。兰底地处我胶东根据地的交通要地，敌四十六军进占后，对我很不利。韩部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对我主力部队能避则避，但

与我地方部队、基层政权和民兵，双方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国民党部队。按照胶东军区首长的要求，我赴“任”后即请韩约束驻兰底的部队不得出动，以免与我胶东军区的部队发生冲突。双方约定韩部驻地10里以内为非武装地区。实际上，这些地区抗战时期即为我根据地，现在我们更利用与韩的约定，限定敌人只能在驻地附近活动，与此同时放手开展地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

有一天（大概是1月20日左右），韩向我谈到了他对山东战局的观察。他分析胶东地区蒋军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第一，五十四军沿津浦线向鲁南进攻，由四十六军接替胶济线防务；第二，五十四军在胶东方向作战，沿高密诸城公路进攻诸城，四十六军配合行动。他建议我军集中力量消灭五十四军，拿出一部分力量牵制韩部，并积极威胁胶东，以便韩部留驻胶东。从韩的谈话中可看出，他希望我军消灭其他蒋军部队而保存自己的部队，为避免被消灭，四十六军不愿离开胶东。了解到韩的这一意图后，我与解魁同志商量，一方面向韩提出与我军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极为重要，为此要增加一名交通员；另一方面，由我回“家”一次，向胶东军区首长汇报情况。对此，韩都同意了。我回到胶东军区时，舒同主任还在那里，他和胶东军区首长一起听取了我的汇报。首长们分析韩所谈内容虽为其个人判断，但也披露了敌人的部分企图。认为在总的形势发展下，战局对我有利，对韩可进一步争取，工作大有可为。因此确定了对韩部采取“利用即互相利用”的方针。这一

方针的确定，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数天后，韩部接上司命令西调淄博，拟于 29 日开始行动。韩希望我军让其安全西调，不要打车破路，待该军西开后，派部队攻击即墨、兰村等地，以求得其上司将该军再调回胶东。我一边听着，一边紧张地思考着。把四十六军留在胶东，是韩早已暗示了的意图，对此我们心中有数。而蒋介石、陈诚突然命四十六军调淄博，则预示着敌人有了新的部署，很可能是组织新的进攻。于是，我立即派解魁同志将此重要情报送回胶东军区。

果不其然。1 月 31 日，敌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副司令李仙洲等人到博山，于翌日召开军事会议。当晚，我即向参加会议后刚刚返回军部的韩询问博山会议情况。韩说：“鲁南处于决战关头，双方正调集军队准备进行会战，此一会战将是整个华东战局的转折点。上峰决定南北夹击，北线由四十六军、七十三军、十二军向莱芜、新泰进攻。四十六军自不必说，对十二军我也有法约束。请你赶快与鲁中军区王建安司令员联系，希望贵军很好地掌握政策，不要打我们，同时在胶济线上搞些动作。为便于我约束部队，也请王司令告诉我有关鲁中军区部队的一般情况。”韩谈完后，我们商定派刘情报员（解魁同志）当夜出发，以寻找韩的朋友杨俊雷为名，到我鲁中军区联系。

刘走后，韩抽空又跟我谈到：“目前山东只有四十六军比较完好，王耀武还不是指望这个军吗？我不能白白牺牲掉此军。能错开战争焦点，将来作用很大，小可控制胶济

线，大可北向平津，给李宗仁、白崇禧撑腰。到一定时期，迫李、白出面表明态度……”听了韩的这番话，我意识到他对率部进攻解放区有可能被我军吃掉的顾虑很大。针对这一心理，我向他提出，初到鲁中地区（为避免刺激他，我未用“进攻解放区”的字眼），要给我鲁中部队和人民留下好印象。一要掌握部队纪律；二要约束部队行动，如发现我方民兵，不可进攻，用火力威胁一下即可；三要尽量拖延时间，这一点最为重要。

2月4日，韩部由博山出发，向我山东解放区腹地进攻。出发不久，即进入山区，群山连绵，深壑纵横，时而奇峰突兀雄峙于前，时而绝壁千仞侧立两旁。山路崎岖，加上下大雪，韩部行进十分困难。我和韩练成骑着马都深感不便，炮车辎重更是难以行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鲁中山区即是我军的老根据地，当地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国民党对我进攻开始后，当地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敌军所到之处，空无一人，甚至不闻鸡犬之声，致使敌军上下深深感到有一种灭亡前的恐惧。我鲁中军区的地方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白天神出鬼没，打冷枪，捉舌头；夜幕降临后，到处进行袭扰，摸岗摸哨，小股奇袭，或者吃掉一个班，或者消灭一个排，弄得敌军行则提心吊胆，驻则坐卧不宁，真是惶惶不可终日。韩对此深感不安，既对我军的游击战术感到苦恼，更对上司严令他打头阵表示不满。4日晚宿营和庄时，韩部一个排被我地方部队消灭。韩见到我时嘟哝道：“这样零搞也不合算”。我故意装作不

懂，反问他：“你说什么？”韩回答：“损失了一个排”。接着他又骂其上司，对上边命令他6日占领新泰非常不满，并说：“我要给鲁中一些时间准备”。

我于6日晚得悉敌七十三军跟在后边，而且还催促四十六军加快南进速度，就对韩说：“你这个军掩护他们攻击前进，很难不让人怀疑你的意图。”韩听后就向我解释：“这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让非嫡系部队打头阵，王耀武是不会让七十三军在前头的。”他还补充说：“我们在前边也好，可以给鲁中军区一些方便。我决定明日不动，让一八八师（进攻鲁中先头部队）炮击颜庄南山，如此可以拖延两天，让鲁中部队准备。”我又提出，“如进新泰，不能带还乡团”。韩答称，“县长们都在李仙洲处，可让他们迟一点去。就是去，我也会有交待，请放心。”

韩部于8日占领新泰后，已对我军造成威胁。此时南线敌人已迫近临沂，敌南北集团前锋相距不过300余华里，我华野部队战役机动余地已很小。如果北线敌人继续南下攻占蒙阴，将给我军造成极大被动。因此，决不能让敌人占领蒙阴。然而此时解魁同志还未归来，鲁中军区以及华野首长有何指示无法知晓，我心中非常着急，决定自己出去联系。韩练成也是忧心忡忡，当即表示同意我去蒙阴。

9日晨，韩派一个排护送我到双方警戒阵地。然后，我一个人骑马前往蒙阴。人着急，马也懂“事”，跑得飞快。说起来真是所谓“无巧不成书”，我在途中被华野侦察科长严振衡带的侦察兵“抓”住了，他是奉陈粟首长的命令到

北线来侦察李仙洲集团动态情报的。当时他和一些侦察人员正隐蔽在新泰东南约10余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我一见到严即请他讲明身分，并要求屏退左右，以便有重大机密相告。严当即同意。待其他人员退出小屋后，我向严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分、姓名、化名和任务，尔后向严提供了李仙洲集团兵力部署的最新情报：敌四十六军为前锋，8日进占新泰；李的总部率敌七十三军和敌十二军的新编三十六师居中，位于新泰以北的颜庄地区；敌十二军主力担任后卫，驻莱芜城和吐丝口镇。此外，我还转述了韩练成的5点意见：1、建议陈毅将军一心一意掌握鲁南大会战，不必顾虑北线。如有力量在北线动作时请告之；以便设法应付。2、最近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让四十六军去打蒙阴，如果是这样，建议你们去打七十三军；二是两个军齐头并进，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四十六军往后拖。3、情况愈来愈紧急，为便于联络及时，请指定一部电台距我二三十里。4、如将七十三、十二两个军完全消灭，仅剩四十六军时，希派人来研究我部出去之办法。5、请问陈毅将军还有何要求？听了以上情况的汇报，严科长非常高兴，立即用电台向野司报告了我所提供的情报，并要求速查胶东军区有无杨斯德其人。当晚，严科长即收到陈粟首长回电：“杨斯德确有其人，暂留你处，很好接待。已派黄毅参谋骑摩托来接你，速返汇报。”是夜，严科长急返野司驻地青驼寺向陈粟首长汇报情况，并于翌日上午赶回侦察队驻地，向我传达了陈粟首长对我和解魁同志的亲切慰问，以及工作上的重要指

示，大意是：请杨斯德同志很快赶回四十六军去，转告韩练成军长，我们必将粉碎蒋介石南北夹攻的阴谋，请他等着听我们的捷报。我们打李仙洲集团时，将不打四十六军。待消灭李总部、十二军、七十三军后，可以放开东北方向，让四十六军回到胶济线去。但一定要韩练成随时将部署变更和行动方向与位置事先告诉我们，免得打错。要特别注意不要同七十三军搞到一起，否则会玉石俱焚。我们有侦察部队监视李仙洲各部的行动，如遇情况变化，请韩随时让我方代表出来报告。我们的侦察部队带有电台，将在韩部附近开设联络点，以便随时与韩部联系。陈粟首长还要求转告我和解魁同志，战场上情况多变，随时会出现复杂、险恶的情况，此时我斗争越坚决，意志越坚定，就越安全。如果四十六军与七十三军搞到了一起，我们不得不连四十六军一起打的时候，就要劝说韩练成放下武器，我们将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10日下午，严科长派侦察小组护送我到新泰城附近。我返回韩的军部后，见到了头一天返回的解魁同志，心中十分高兴。正在交谈时，韩要我去面谈。他对我迅速与华野司令部取得了联系感到欣慰，同时又郑重地对我说：“李仙洲已决定要我向蒙阴进攻，是用一个师或是使用全军兵力，还没有明确。我的打算是，假设命令我全军行动，一定要拖延至18日到达蒙阴；如果命令我用一个师进攻，就先进到常路（蒙阴城北约30里），看情况再决定前进或后撤。请告诉我陈毅将军是否决心保卫蒙阴以及军事机关、

物资所在地。如果决心保卫蒙阴，请马上大量制造并张贴宣传品，内容最好是欢迎贵军各个番号的主力部队保卫蒙阴城，我好借此吓唬李仙洲，就说共军主力部队多，前进困难。我自然会约束自己的部队，行动前首先向前进方向上空打三炮。如决心阻止我前进，贵军就在高地上放一把火，我即不前进或缓进。请告诉陈毅将军对我不要怀疑，同时通知下面不要摸岗哨，吃小股部队。”对于韩所谈情况，我立即整理好，火速派解魁同志当晚出城送往蒙阴。此时，陈粟首长已下达了战役部署，以两个纵队在临沂以北伪装全军继续阻击敌人南线集团进攻，主力则于10日晚分3路隐蔽兼程北上，求歼北线李仙洲集团。

其后数日，韩愈益感到“错开战争焦点，保存四十六军实力”的想法有落空的危险，顾虑越来越大，因而更加有求于我军。随着工作的进展和韩部对我军的依赖加深，使韩与我军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向我方提供重要情报，而且还主动设法拖延时间，甚至向李仙洲提出实则有利于我军的反建议，造成北线敌军集团行动迟缓，攻击不力，为我主力北上赢得了时间。

15日，解魁同志返回韩的军部，带回了陈毅同志给韩的口信：韩将军诚意地告诉我们好多问题，表示谢意。我们希望同韩将军永远为民主事业共同携手。我党中央和我本人对韩将军毫不怀疑，我野战军决不打他。由于不能暴露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便告诉地方兵团，因而摸岗捉哨在所难免，希不必在意这等小事。我军有足够力量确保

蒙阴，如不保蒙阴，会直接影响南边会战（实际上此时南线我军仅以两个纵队佯装主力与敌激战，大部队正向北运动中），希望韩将军最远进到常路。不论哪个军，谁过常路就打谁。对于南北两线，我们有足够力量与充分条件取得胜利。希望今后不间断地联系，以免发生误会。

听了解魁同志的传达，我的精神为之一振，陈毅司令员亲自做韩的工作，对于争取韩将起关键的作用。当晚，我将陈毅司令员的意见告诉了韩。他听后连声表示：“很好，很好”。他还说，我的建议上边（指李仙洲）已采纳，决定部队后撤，不进攻蒙阴了。如此不仅蒙阴免去威胁，而且你们在南线可以放手大打。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感觉陈毅将军对我多少还有些怀疑，希望他以对待自己的同志那样对待我。我部这次北撤，请贵军不要打车破路，从新泰到博山都是四十六军的部队。七十三军、十二军他们在莱芜方面，你们要打就集中力量去打他们。”我听后马上对韩将军说：“那就明天让刘情报员再出去一趟。”这时，韩以一种半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李先生，你说我将情况告诉了人家，叫人家去打友军，如把友军都打掉了，只剩下我是多么危险呀！我曾考虑在那种情况下，如叫我有何表示，那是不行的。”我当即回答：“你这是多想，这些问题请不必考虑，因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何况我们都是有远大眼光和远大理想的。”

2月17日，韩在陈诚的严令下，将其一度撤到颜庄的军部，又重新南下返回新泰。此后，韩发现我大批部队向

北运动，感到处境不保险，顾虑重重，唯恐韩部驻地成为战役的重点，每晚都约我长谈。我以冷静、安慰的态度对他说：“你不是建议我们去打七十三军、十二军吗？我们的部队肯定是去打他们的。根据我军在两侧运动的情况来分析，很明显不是打四十六军的，请尽管放心。”

到了19日，我站在高地上观察到我们的大部队源源不断地上来了，由于掌握了敌军的部署，所以部队运动非常顺利、迅速。我心中暗暗地高兴，知道歼灭李仙洲集团的战斗就要打响了。而只要一打上，我军就一定能打大胜仗。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陈毅、粟裕首长的组织指挥，有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有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我们一定能“打下莱芜城，活捉李仙洲”。

(三)

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了。

这天上午，韩练成奉其上司之命率部由新泰北开颜庄地区。午后4时，莱芜东北和庄方向传来隆隆炮声，同时，在颜庄东北方向，韩部与我军开始交火。敌一八八师师长海兢强在电话中向韩练成报告“不好了，这次是和共军的主力打上了”。此时韩对四十六军的命运深表忧虑，而我们对韩的工作了也到了最紧张的阶段。

黄昏时，回蒙阴已3天多的解魁同志返回韩部，带来了陈毅同志的指示。1、我莱芜战役之决心是全歼李仙洲集

团，不过开始时不打敌四十六军，先打莱芜城李仙洲总部和敌七十三军、十二军之一个师，尔后再将敌四十六军包围起来，迫使其起义或放下武器。2、战役打响后，李仙洲势必要韩练成增援，因此你们要力争拖住韩不去增援，向韩说明，不增援不打，若增援则必遭歼灭。3、为求得此战役彻底胜利，决不撤出你们两位同志，以你们两人战胜敌人两万人。你们在敌人内部应积极活动，动摇韩之军心。同时要有思想准备，在我包围韩部时，韩也可能翻脸或有其他危险，你们要斗智斗勇，沉着应战。4、尽量拖延时间，待晚10时半攻击开始后再把我军战役决心大体上告诉韩（但不告诉我军第二步将包围四十六军），迫使他继续与我配合。5、对韩称陈、粟在南线，北线作战由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指挥。6、我代表党中央和华东局，向你们两位同志表示态度，党对同志们是非常爱护和关心的，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需要你们两个同志去担当危险的重任。了解解魁同志的传达，我的心情十分激动。随后，我们对如何落实陈毅同志的指示反复进行了研究，确定了对韩所谈之内容、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动计划以及意外情况下的措施，并下定决心，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就在我和解魁同志研究出一个眉目时，韩又派其卫士来请我去谈。自解魁同志返回韩的军部始，这已是韩第三次派人来催我去商量问题了。我又借故拖延了一会儿，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起身到韩处，将刚才研究的问题按预先确定的策略讲给他听。韩练成听完后脸色、声音都变了，

急切地对我说：“王建安能掌握政策吗？一旦将七十三军打完后回头来打我怎么办？请务必派刘先生（指解魁同志）明天再去联系，尽可能让军区的政委到前方来掌握政策，另派一高级干部化装进来，以便研究打完七十三军后我这个军如何行动。”

我没有接他的话茬儿，而是向他提出明天无论如何不得增援莱芜的问题，这一点极为重要。韩听后面露难色，他表示如不增援则违抗上司命令，如增援又开罪于我军，真不知如何是好。其后，韩称李仙洲若命其增援还是要去，我则坚决反对。我同韩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打假仗，反正颜庄东北方向确实已打响，对李仙洲也可以搪塞得过去。对此，韩表示同意。于是当晚枪声不绝于耳。

回到住处已是半夜，我和解魁同志又商量韩提出明天出去联系的问题，一致认为不能去。因为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已十分明确，战役也已打响，不必再去联系，而且韩请我军高级干部来谈的企图是要我们让开一条路，以便四十六军尽早突出包围圈，这不符合我军战役意图。

第二天清晨，我按拟好的口径对韩说，刘（解魁同志）和王（王建安司令员）考虑不周到，没有规定联系地点，加上战场形势又是这么复杂，恐怕出去后联系不上，就是联系上了也很难马上回来，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无法再派人出去联系。所以现在不能派刘出去。韩听后不再提联系的事，转而对我说：“李仙洲已令我增援，故决定今日向莱芜靠拢。不过我已告诉部队迟一点前进，争取时间让

莱芜方面解决问题。”我听后即严肃地说：“你如增援莱芜，一定会引起我军怀疑，也一定会与我军打上，请你务必慎重。”韩说：“李仙洲有命令，不去不行，还是向前动一动，看情况再说，哪里打上就在哪里停下。”韩不顾我的劝阻，率部放弃颜庄，缓慢地向莱芜靠拢。不巧途中没有我军打援部队，约下午4时许，四十六军推进到了莱芜南约10里许的南冶一线。这时我攻击部队即向韩部猛烈开火，战斗相当激烈。

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王耀武坐飞机到战场上空直接指挥，命令韩练成率部于黄昏前靠近莱芜城，与李仙洲总部、七十三军、十二军的部队合为一股。这时韩已高度紧张，摔掉受话筒后说：“完了，完了，我这个部队毁在他们手里。李先生，你说怎么办？”我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尽力争取四十六军与莱芜敌军隔离，以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想到这里，我故意以不满的口气说：“现在跟李仙洲他们已经很难分清了，还能进城吗？进城不是进包围圈去送死吗？我早就说过，不能前来增援，不要和他们（指莱芜之敌）搞到一起，可你却认为情况不至于这样严重。事情搞到这个样子，完全是你自己做的。”韩听后，更加乱了指挥方寸。

夜幕降临后，韩部欲进城，因事先未与敌七十三军守城门的部队联系好，结果发生误会。城头上轻重武器猛烈开火，差一点把韩打死。我赶紧把韩拉到我的身后，用身体挡住他，然后朝城墙上大声叫喊：“这里是四十六军韩军

长，不要打了！”边喊边挥手。城头上的敌军一看我的样子不象是攻城部队，就不打了，问清身分后，放韩和我进城，韩的部队则退驻河南（靠莱芜城有一条大河）。

韩带我进莱芜城后，他到李仙洲处商议，我则乘机向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的副官了解战况，得知驻和庄地区敌七十三军的一个师已被歼灭，吐丝口已被我军攻入，莱芜城及周围地区陷入包围，我军在东关方向正组织攻城。兵临城下，李仙洲的总部已是相当混乱。李仙洲等原决定是夜即突围，但韩不同意，称部队都在河南，尚未收拢，晚间行动有困难。

22日拂晓，四十六军开始向城内收缩。其间受我军杀伤很大，被我军抓获的俘虏和伤兵即不下千余人。激战竟日，至黄昏前，仅城内收的伤兵，40辆汽车都没有装完。在韩的部队极度混乱动摇之际，韩练成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这下是彻底完了。李先生，你有什么意见？”我反问道：“你有什么打算？你能掌握多少部队？”韩称只能掌握军部特务营，其他部队都只听贵族子弟（指海兢强、甘城成）的。

对于这些情况，我当然了解。陈粟首长也清楚韩并不能真正掌握这支部队，所以从未要求过一定要策动韩率部起义。现在已到了战役的关键时刻，如何采取正确、果断的措施，以最大可能配合我军全歼敌人，是我和解魁同志加紧思索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有三种可能：一是韩率部起义，二是韩命部队放下武器，三是韩脱离部队，造成敌人失去指挥，以利我军消灭。由于韩在关键时刻掌握不

了这支桂系部队，因而前两种可能已无法转变为现实。于是，我以真诚的态度对韩练成说：“举义是最好的，放下武器也行，但你说不能掌握部队，那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只有负起保护你的生命安全的责任。”韩听后有些动感情，说：“我相信你”。于是我接着说：“如果随军突围，那是极其危险的。现在只有一条路，请你提早离开部队，免遭个人生命危险。至于我牺牲了，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韩听后即说：“好，就这样办。”

当晚，李仙洲召集韩浚、韩练成等将领开会，研究决定翌日拂晓向吐丝口方向突围。23日天刚放亮，敌军开始行动。趁四十六军部队在东关集合之际，我和解魁同志借口“军长到后边看看部队”，将韩又带进莱芜城保护起来，无论各师如何呼叫“军长”，韩均不理睬。李仙洲和四十六军参谋长杨赞谟等派人四处寻找，怎么也找不见韩练成的踪影。直到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来催赶快行动，李仙洲才发出突围的命令。这时已是上午8时了，敌军的突围行动因此延误了1个多小时。由于韩脱离军长指挥位置，造成敌四十六军刚突围即陷入混乱之中，敌七十三军的战斗队形也被搞乱。数万敌军争先出城，向吐丝口方向仓惶逃窜。我军待敌脱离即设阵地后，立断敌军后路，自东、西两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炮火最猛的时候，我将韩藏身于莱芜城墙的一个墙洞里，解魁同志则冒着生命危险出去联系我军。我七纵的一位营长（也许是教导员）得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将我们送到师部，后又到纵队司令部，成钧司令员

立即与野司联系，陈粟首长即派侦察营营长章宏同志带人来将我们送往后方。此时，莱芜战役的硝烟已经散去，我军取得了歼敌1个指挥部、两个军、7个师共5.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这是自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我军歼敌建制最大、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2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专门为此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刘（伯承）、邓（小平）并饶（漱石），说：“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

（四）

莱芜战役胜利后的第五天，陈毅司令员在蒙阴城外的一个村庄里亲切会见了韩练成将军。当时在座的有我和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的康矛召同志。

陈毅同志是我军著名的儒将，其文韬武略早已为韩练成所仰慕，尤其是在此次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更令韩心悦诚服。我也是第一次直接聆听陈司令员的谈话，深深感受到陈老总非常善于做工作。他的谈话，和蔼可亲，肝胆照人，谈笑风生，纵论天下，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韩深受震动和教育。陈司令员首先肯定了韩在莱芜战役中是有贡献的，转达了我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个人对他的慰问。韩听后表示感谢，并连声说“惭愧，惭愧”。接着，陈司令员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是不得人心的，遭到了解放区军民以及蒋管区

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反对。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前不久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说明蒋介石发动内战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国民党军内部也引起了不满。自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仅半年多的时间就足以证明，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对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所谓“三至六个月消灭共军”的神话已经不攻自破，我军是愈战愈强，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军则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整旅、整师、整军地被歼灭。总的看，虽然目前战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但我军已经扭转了被动，并逐渐取得优势，战争的结局无疑是人民必胜，我军必胜，蒋军必败。对此，我们充满信心。陈司令员还就韩今后的安排问题代表我党表示：欢迎他留在解放区工作，去中央、在华东均可，并就此询问韩本人有何打算。

我党中央以及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陈毅司令员的热情话语，使韩练成深受感动，数日来紧张、羞愧的情绪一扫而去。关于自己今后的打算，韩表示：“今后如何为人民效力，当完全听陈将军决定”，其个人的考虑是回南京，继续在蒋介石的营垒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韩的大胆计划是非常危险的一着棋，稍有不慎将招至杀身之祸，但韩一再表示个人安危非其所计。陈毅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韩本人的意见，并说要向中央报告。韩还提出请我军派一个人随他去南京，陈司令员当即对我说：“杨斯德，你负责到滨海去挑选一名干部。”

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包括对韩构思的“鲁中战场脱险记”进行润色后，我带一个班，乘坐新缴获的一辆美式卡车，护送韩前往青岛。途中，按陈司令员指示，到华东局驻地拜访了张鼎丞同志，韩对我方周到的安排一再表示感谢。

3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一行人到了滨海军区滨北分区所在地胶县黔陬。这里是我抗战时期工作过的地方，与滨北分区的首长、战友都很熟悉。滨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彦同志出面热情接待韩。张彦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很善谈，谈了政治、军事，也介绍了蒋军占领下的青岛的近期情况。韩的情绪也很好，认为从陈毅等人的身上可看出，共产党的干部信仰坚定，水平高，廉洁奉公，同老百姓关系好，确实是打天下的样子。我那两天则抽空物色去南京的干部，挑来选去，最后与分区首长一起决定，由分区政治部联络科驻高密联络站干部张保祥同志，化装成韩早年在山东的拜把兄弟王汉青的儿子王忠杰，随其去南京。对张保祥同志我很熟悉，我在滨北分区任联络科长时，他就是科里的干事。这个同志忠诚可靠，人很机警。物色好韩练成的“世侄”后，我就带张保祥同志去见韩，韩对“王忠杰”很满意。其后，我们一起对去南京后可能遇到的麻烦，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进行了讨论，直到认为滴水不漏、万无一失了，这才放心去休息。

在黔陬住了3天后，我和武工队的同志送韩和张保祥同志到了胶州湾海边一个名叫红石崖的地方，他们将从这

里乘船去青岛。出发前，我和韩合影留念（可惜这张照片在“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当晚约10时许，他俩上了我们雇的一条船。我们互道珍重，挥手告别。记得那天晚上月光如洗，我伫立在海边，望着月光下一叶轻舟渐渐消失在沉沉黑夜，思绪飘荡，感慨万千。经过前后3个月的工作，特别是陈毅、张鼎丞、舒同等领导同志亲自做工作，加上解放区在政治上、军事上与蒋管区相比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使得韩练成对我党、我军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这是非常来之不易的。韩此次去南京，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他能够自圆其说而不露破绽吗？能够从“军统”、“中统”那里蒙混过关吗？能够重新取得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任和重用吗？诸多问号，浮上脑际。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他们安全无恙，希望韩能如其所表示的那样，在未来的日子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在青岛有一个后方留守处。1个月来，留守人员及军官家属们都在为四十六军全军覆没而哀叹。韩突然返回，令他们大吃一惊，一边手忙脚乱地安排为军长接风洗尘，一边赶紧向上司报告。3天后，王耀武命令韩去济南，并拟于第二天派飞机来青岛接韩。考虑到去济南后“说不清楚”，王也可能抓韩作替罪羊，凶多吉少，韩决定抢在王耀武的飞机来青岛前即带张保祥乘船去上海。到上海后，韩立即住进了白崇禧在北四川路的公馆。白未在，韩就在电话里先向他说明了“脱险经过”。两天后，韩、张坐火车去南京。大约1周后，蒋介石召见韩练成，不

但未斥责韩，反而予以安慰，并根据韩事先准备好的“鲁中战场回忆录”，嘉誉韩为“独胆英雄”。这篇所谓“回忆录”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内容除谈了韩本人对莱芜战役的记述、评价外，用很大篇幅杜撰了韩如何突围、掉队、伪装、利用旧关系掩护、辗转脱险的经过。韩一到南京，就把“回忆录”报上去了。估计蒋介石见韩前，已经看过，情报、特务机关可能一时也未看出疑点。当然，我们分析也许是当时无法查证。而蒋当时急需笼络人心，“鼓舞士气”，有必要利用韩。这样，韩回南京后，并未遇到什么麻烦，而是平平安安地住在傅厚岗七号自己的家中，张保祥同志也住在韩宅。

大概是4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召集陈诚、白崇禧等人开了一个小型检讨会，韩练成也被召去参加。韩与白在会上大肆攻击陈诚，认为李仙洲集团被歼，主要是陈诚指挥失误所致。韩还具体分析了鲁中战场失利的原因，认为陈诚错估敌情，指挥失策，被解放军派一部佯攻兖州、在运河上架桥所迷惑，把共军主力北上说成是败溃，令李仙洲孤军南下，陷入重重包围，其后陈又处置不当，救援不力。韩的发言，是进一步作出对“党国”效忠的姿态，以图再次获得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信任和重用。蒋介石认为韩的分析和意见很有道理，在作结论时说：“一切由我负责，但辞修（陈诚字）也不能辞其指挥不当之责”。1个多月后，蒋介石任命韩练成成为高级侍从参谋，对莱芜战役的检讨和对韩练成在战役中表现的调查，就此也

告一段落。

其后1年多，韩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特殊环境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一些工作。1948年春节期间，韩曾利用休年假之机到香港与潘汉年同志联系。张保祥同志也曾回华东军区汇报工作。1948年11月初，韩脱离国民党军队，只身前往香港，经华南党组织安排，秘密转赴解放区，辗转到达我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1950年5月，由张宗逊、甘泗淇同志介绍，时任我西北军区副参谋长的韩练成将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韩练成将军在莱芜战役中的作用，党一直给予高度的评价。韩练成将军去世后，党组织在讣告中称他“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特别是在莱芜战役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莱芜战役胜利已46年了。当年在陈毅、粟裕以及舒同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开展对韩练成将军工作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今天，我将保存在记忆里近半个世纪的这段秘密写出来，谨以此文献给在莱芜战役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们，并深切怀念陈粟首长。我从这段难忘的经历中深深地体会到，隐蔽战线上斗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由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所决定的，而党所制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借此机会，我还要着重指出，我们党对凡是为人民的事业做过有益工作的人是决不会忘记的，是非常关怀、爱护的。韩练成将军从一名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旧军人，在我党的教

育、帮助、指引下，顺应形势的发展，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经历，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人民的事业是必胜的事业，一个人也只有将自己的生命投身到人民的事业之中才会获得永生，永远为人民所怀念。我想，这就是莱芜战役中我党、我军的敌军工作所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核武器试验场初期记事

张 蕴 钰

1958年8月初，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①：“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我于第二天由大连乘火车到达北京。当晚即由曾副司令员带我到灵镜胡同41号去见陈赓副总长。到了那里还没坐稳，陈副总长就对我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我回答说：“好！服从命令！”在我心目中，陈大将宽宏大度，是可敬可亲的首长，在他面前我说不出个“不”字。他继续说：“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陈大将快人快语，总共这么几句话，就将我的工作和生活引上了一个新开端。

次日，我到总参装备部去见安东副部长。1955年驻旅大苏军撤退回国时，因为中苏两军交接防务和装备，安东同志曾在大连工作数月，我们有过很多接触，算是熟人了。所以一见面没什么客套，很快进入我们要谈的话题。他告

^① 作者时任旅大军事基地司令员。

诉我工程兵的陈士榘司令员和商丘步校政委常勇同志已经带领一些人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去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他让我先回旅大交待工作，然后再返回北京。

9月初，我举家迁至北京，住在广安门内志愿军办事处宿舍。在这期间，我见到了常勇同志。自此，开始了我们的长期合作和共事。常勇同志直爽热情，向我详细介绍了勘察选场的前期情况。他告诉我，中央军委确定建立核武器试验场后，国防部组织了选场委员会，成员有陈士榘、江文、唐凯、李兆邦、常勇、塞风，他们与阿·彼·安德列耶夫等4位苏联专家共同研究了选场方案。陈士榘司令员已带领委员会成员和二机部的郭英会同志及4位苏联专家到敦煌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60公里处的后坑适合建场，这一选场方案已经得到了总参谋长黄克诚的正式批准。勘察大队由张志善任大队长，他与勘察大队政委常勇、副大队长史国华一起在敦煌选定的地区内进行了地质测绘、道路和通讯设施建设。常勇同志还告诉我，为了保密，勘察大队的代号是0673部队，让我去敦煌时在红柳园下火车，将有人接。

1958年10月2日，我乘火车抵达敦煌。勘察大队住在城南关，我到住地后很快见到了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卫全等同志，他们都在这里工作几个月了，着实很辛苦。在这里我看了苏联顾问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试验场设计指标为可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提出的编制有

靶场主任、学术秘书、力学测量室、光学测量室、核测量室、放射化学测量室和技术室。我看了之后暗暗想：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我们在这种时候建个试验场只能试验2万吨级的原子弹，相比之下起点太低了。

住下后，张志善同志带我到城内走了走，看了看敦煌的市容。张志善边走边告诉我，敦煌虽是有名的古城，但现在还十分贫穷，县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的。这里属内陆性气候，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农作物产量低，水井很少且又很深，所以，群众用水很困难，常常要用毛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日常生活燃料主要是牛粪。但令我诧异的是，国营商店里竟有海参、鱼肚、干贝这些海货，当然是无人问津。因为这里的“高消费者”不过是往返格尔木的汽车司机，他们也不过是吃些烙饼、炒肉、牛肉拉面而已。敦煌全县5万人口，多数群众的生活还很贫困。

次日，常勇同志宣布军委决定由我担任部队主任的任命。接着，张志善、卫垒和史国华同志带我去看已选定的靶场区——后坑，到那儿玉门关是必经之路。

在玉门关小憩后，我们继续前行。一会儿就没路了，只有原先勘察队走过时留下的车辙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沿途所见不过是稀疏地长着的芨芨草、罗布麻和野梧桐树。大片地区则是草木不生，地质上叫大孔土，如果车子陷下去，没有救援就不能前进。而车若一停下，就会有成群的蚊子来骚扰。经过一段艰苦的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预选靶场

的中心桩，看到了中心东北方向的指挥点。归途中我深思着，试验场距敦煌 100 多公里是太近了；大孔土能搞工程建筑吗？施工和生活用水从哪里来？——这个地方不行！我心里暗下了这个决心。回到住地我和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和卫奎谈了我考虑到的预选试验场的不利条件：只能试验数万吨级当量的核爆炸，距敦煌太近，地质不好，百里内无水源等等。并建议将这些因素上报以便上级决策另行选场。很快，我回到北京分别向安东副部长、陈士渠司令员、总参军务装备部长万毅同志汇报了情况和意见。在陈赓副总长召开的办公会议上我汇报完预选的敦煌靶场的不利情况后，陈副总长作出了结论，他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吧！”会后，我立即将会议结果通报常勇、张志善两同志，并随即于 12 月 15 日回到敦煌，着手筹备穿越戈壁向新疆境内另找新靶场的工作。在最初的选场方案作业图上，敦煌以西有两个方案，最西一案是在罗布泊，这就是我们向西勘察的最后目标。勘察队人员有我、张志善、史国华和总参测绘局的朱处长，上尉杨金岭管理汽车和生活。勘察队带了 1 部电台，准备了 10 天的饮水、油料、粮菜、罐头和柴，还有帐篷等生活用品，分乘 4 辆吉普车和 4 辆生活车，于 12 月 24 日出发上路了。

车队行至天黑，我们就地搭起帐篷，生火做饭，吃罐头煮饼。饭后架起电台进行联络，然后，大家用枯红柳根烧起篝火，真是野趣横生。

那时我们用的地图是沙皇俄国绘制的新疆地形图。从

图上看有一条南北连绵不断的“白龙堆”。这“白龙堆”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形，我们都不清楚。中午到达此地一看，才知是一条绵亘数百里的白沙堆。一座座沙山绵延起伏，高的10余米，矮的五六米。这些银白色的沙堆绵亘远去就像一条玉龙曲身卧在广漠的戈壁滩，故此得名“白龙堆”。我们从沙堆豁口低凹处通过继续前进。后来我才从一些书籍中看到，西晋时通西域诸国的使者和商人，为避开三隆沙和白沙堆，由玉门关向西北找到一条新路，直通哈密王属地，想必过白龙堆的路那时就断了。回想起来，我们以50年代的后勤保障条件通过白龙堆，真是不容易。

车队继续前进，我们边走边勘察地形，评价着所过之处对我们此行目的之价值。再前行，我们进入了地质学上所称的“雅丹地貌”区。这种地貌是由于冲积土被风蚀形成，是沙漠上吹来的热风天长日久把原始地貌“雕琢”成了一座座峭立的土丘，它们或楞角分明，或体圆如柱，似碑似塔，参差不齐，姿态万千，不啻是戈壁滩的一大自然奇观。面对这神秘莫测的奇异地貌，我们不敢深入到里面去，只好向北绕道而行。刚拐过去不久，张志善的车发现了车辙，是解放牌汽车新压的车印。这时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如释重负。顺着车辙走不到五六公里，在一个转弯处看到了几顶帐篷。一位中尉见到我们一行格外兴奋，他告诉我，他们是总参测绘大队的一个班组，担任着对位于新疆民丰县境内的导弹试验发射弹着区进行测量的任务，在外已经两个月了。他们用水是从罗布泊取的，离此大约50公

里。顺着他指的那条取水的路，日落时我们到达了罗布泊。孔雀河的水日夜流入罗布泊。在入泊口，河两岸生着柳树、芦苇，对于戈壁行旅人来说，这真是个美景宝地。我们尽情地洗了个痛快，连汽车上的尘土也洗刷干净了。当晚我们宿营在罗布泊。次日乘兴逆河而上，继续勘察。西行百余里，目测一下这片戈壁滩，起伏不大，基本平坦。我们选了一个中心点，再分别向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各个方向踏勘地形地貌。结论是：这里完全适合选场条件。我们庄重地就地打下了一根木桩，就此选定了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

一块石头落地，勘察任务完成了。我们的归程是经辛格尔去吐鲁番，可是走了很多路都走不通，只好返回，想找到由罗布泊去鄯善的那条路。但车队现在在地图上是什么位置都搞不清楚，如何走呢？我们真有点着急了，因为车的油已经不多了。最后决定派人到高处看山势，以使我们走出这山窝。稍后，派出的人员回来了，他说在山顶上看到山下有个小水沟。听说有水，我们不由急中一喜。方想起今天是除夕，大家就在这一一起包饺子过年吧。我给总参的万毅部长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回鄯善的路。然后我命令对每辆车的油箱都检查一下，看各有多少油，能跑多少公里，心想如必要就甩掉几辆车。第二天，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来时的车辙，遂顺利驱车抵达鄯善。不久，我从哈密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将在罗布泊勘察的情况向万毅部长、陈士

渠司令员作了汇报。1月下旬，我陪同万毅部长和工程兵设计院的唐凯院长由北京飞往新疆，对新选定的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区进行空中观察。飞机临近场区上空时看到了场中燃起的3堆火。我在飞机上边对地面观察，边向万毅部长报告情况并回答他的询问。我们选场的中心位置在东经41度50分，北纬89度50分。孔雀河到北山之间有60余公里。这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左右，地面土质是冲积土，外缘地带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也很便利。这里长年风向是西风，下风方向至敦煌420多公里之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也尚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在西南有个村子叫铁干里克，也在120公里以外。飞机盘旋几圈后便飞往乌鲁木齐。万毅、唐凯两同志都说这次选的是一个好场子。

到了乌鲁木齐，又向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我再回北京，2月初由陈士渠、万毅和我联名向国防部写了核武器试验场选场报告，建议试验场定点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很快又于3月25日通知新疆军区，0673部队将进驻新疆执行特种工程任务，该部的军事、行政、党政、后勤工作均归新疆军区领导，并要求这支部队的有关情况需特别注意保密。

部队于3至4月间进入新疆，暂时住在新疆和硕县乌什塔拉公社和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一个被废弃农场的土房里。这时，靶场的领导同志只有常勇政委、张志善副司令

员和我，首要工作是为营区选个点。经过实地考察，最后，营区定点在乌什塔拉以南地区，这里无耕地，无树木，地下水丰富，东距试验场区 250 公里，北靠天山，南不到 20 公里有博士腾湖，可以调节小气候，使这里不像一般戈壁滩那样奇寒酷暑温差强烈。在这里建一个可居住 5 万军民的特别营区是可以的。因这里仅有很少一点马兰草，当地人称此地为马兰滩。我、张志善、工程处长苏润海最后定点时就将此地定名马兰村。部队进驻后不久，于 6 月 13 日接到总参通知：0673 部队对内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 训练基地”。随即基地建立起党委，常勇为第一书记，我为第二书记，张志善、任中咸、李天衷为党委委员；原勘察大队工作已结束，即行撤销，我旋即受命担任基地司令员。

万事开头难，现在可以说领导和机关有了，地皮有了，除此以外，需要的都还没有。在此不但要建立一支能执行特种任务的部队，还要建起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社会。基地所处地理位置是边、远、穷，又是戈壁滩，工作和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我们的政治环境却非常优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建核武器试验基地极为重视，对我们建场的有关事宜总是从快从优批办；新疆党、政、军、建设兵团对基地大力支援；全国各有关单位给予我们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当然，基地的官兵乃至每一位工作人员也为基地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经过几年的努力，基地初见规模。这时的马兰村已建起了水厂、机械厂、发电厂、拖拉机修配厂和机关部队营

房、招待所、礼堂、幼儿园等保障生活的设施，修建了水库和农场，绿化了营区，架设了由酒泉经乌鲁木齐至试验场区的通讯线路，建立了多个气象台站。我们调来了4个工兵团、1个汽车团、1个防化团；组建了21研究所，所长张超，政委秦国才，还有教授程开甲、董寿莘和10多位有科技成就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逐年入伍的大学生300余名，这些就是试验场上的科研主力军。

1962年1月3日，二机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上提出了争取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对此，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3年下半年，我们接到了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的任务。目标时限有了，基地振奋了，紧张了，忙碌了。如果说，过去做过的事还算不难做（尽管很艰苦），今后的工作却是我们不懂的，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无处不在。不懂就学，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听科技学术报告，参加核武器原理讲座，学习操作有关核试验测量设备，掌握自动控制和核安全及其防护等方面的知识。为了完成试验任务，当时我们真是步步有艰难。不但是我们这些外行人如此，就是我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同样有着更深层次的艰难——中国毕竟没有现成的核试验经验；再者，试验所需要的技术器材哪个厂家生产？哪里去买？性能、规格、型号都要求很严的必备的标准部件什么厂家能加工生产？说不出的难处真是很多很多。

核试验基地在核武器研制中居何地位呢？它是从研制

到生产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中间环节；是核武器从工厂到实战装备的纽带。核武器初始的试验是核部件爆炸试验，成功之后才有核炸弹、核炮弹、核鱼雷、核水雷、核地雷等诸种核武器的试验。为发展核技术要进行原理性的技术试验，武器种类不同试验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核武器试验场与常规武器试验场有很大区别。核武器杀伤范围大，光辐射、冲击波作用距离远，特别是放射性尘埃在空气中、高空大气层中、土壤中和水中持久地存在，对人、动物造成伤害和放射性疾病。消除核爆炸产生的后果是很难的。

核试验基地在核武器试验中又担任什么任务并如何进行保障服务呢？概括地说就是：1、进行核爆炸的理论计算，得出必要的数椐；2、引爆核部件；3、测量核爆炸的当量、光冲量、冲击波压力、核辐射剂量，取得可靠的数椐；4、记录爆炸景像；5、自动控制各种仪器、仪表；6、通讯保障；7、气象保障；8、工程保障；9、核侦察、防护、洗消；10、运输保障；11、后勤保障；12、政治教育，保卫、保密检查、监督。这些活动主要在戈壁滩上进行。戈壁滩地表温度白天有时高达60~70摄氏度，鸡蛋埋下去都能熟。防化兵战士穿着防护服训练两小时，就能从胶靴中倒出五六公斤汗水。戈壁滩风速高，戴着防护面具迎风不能呼吸，一个战士就因风窒息而死。在试验场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已有的组织指挥经验，创造性地制定了《核武器试验法》，以适应大规模科学试验的要求。在程开甲同志主持制定的《国家第一种试验性产品试验初步技术方

案》中，提出了 45 个科研项目和 96 个科研课题，这就是试验场开展各项技术工作的依据。实践证明，这一方案是适用的，有效的，成功的。

当时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也是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核武器试验由他管理。张副总长对基地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国进行首次核爆炸前夕的 1964 年 6 月，他亲临基地试验场区检查工程进度，8 月间再抵场区检查技术安装情况，9 月第三次来场区主持试验，直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才离开场区。

在张副总长 8 月间第二次来基地时，由他宣布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的“中共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组成名单：张爱萍为书记，刘西尧为副书记，成军、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毕庆堂、朱卿云（兼秘书长）、张志善、程开甲等 11 人为常委。我还陪同张副总长检查了试验场区的主控站。主控站距预定核爆爆心 19 公里，有埋设在地下的引爆电缆、控制电缆、通讯电缆等通向爆心。在场区无论是进行空中还是地面核试验，都可由这一主控站实行控制。当看了主控站人员的模拟演练，并听了主持设计控制系统技术方案的 21 所研究室主任忻贤杰的汇报后，张副总长作了指示，我则就主控站的操作规程表示了意见。

1964 年 9 月 23 日，周恩来总理同贺龙、陈毅两位老师在北京召集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对核试验事宜作了最后的布置。毛泽东主席也很快批示同意在 10 月到 11 月间

进行我国首次核试验。张爱萍与刘西尧同志旋即于9月27日再抵场区，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决定。10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68名委员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正式成立。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刘西尧任副主任委员，成军、张震寰、张蕴钰（兼秘书长）、朱先亚、程开甲、毕庆堂、朱卿云等任委员。此外，还有一些不到试验现场的委员，都是为研制和试验核武器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

10月初，核爆装置的部件安全运抵马兰，被运到离预定安放核爆装置的钢塔有150米的地下装配室中。按照预定试爆时间表，核试验第九作业队队长李觉请示批准将核爆装置于14日18时从装配室启运，19时吊装上塔。“试委”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再次强调了安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提出，接起爆雷管时由我上塔和技术专家们在一起。此时由我受权管理主控站的钥匙，我带着钥匙上塔，直到核爆装置安装完毕、人员全部撤出后，我才把钥匙交回主控站，此时才可以下达试验命令，启动控制设备。张副总长经过考虑，决定由我和李觉、朱卿云一同去铁塔监控核爆装置的安装；张震寰和基地副政委邓易殊去主控站。一切准备就绪，人们又担心起天气来了。负责气象预测工作的是中国科学院的顾震潮教授、总参气象局的贺格非局长、基地气象处的韩云升处长，还有设在爆心地区已坚持5年不间断地收集气象资料的阳平里气象站。核试验对气象条件的最佳选择是碧空无云，能见度50公里以上，以便于远

近照像站的摄影；高度 500 米以下要求西风，因场区工作人员都在西面；3000 米以上合成风向要求向西南，以保证高空放射性尘埃不降落在北京；高空风速大有利于放射云扩散；更不能降雨，以免放射性尘埃落在一个地区。预测全部满足试验条件的好天气是不容易的。当时我国的气象台站数量少，设备落后。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气象预测人员还是选到了满足核试验条件的好天气。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深深怀念顾震潮这位科学家，他在戈壁滩上夜以继日地工作的感人形象，至今犹如在我眼前。不幸的是他因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人民做出的贡献定将永远镌刻在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

1964 年 10 月 16 日，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当天早晨 6 时 30 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接插上起爆雷管，由方正知、陈常宜两位专家担任这一工作，至 10 时工作完毕。由我和李觉同志在塔上陪同方、陈进行最后一次检查，确认无误后，我们于 10 时 30 分准备下塔，下塔前我将墙上贴了数月的那份操作规程取下，签上日期标记——1964、10、16、10：30，以留纪念。然后，我们 4 人乘吊篮下塔，李觉同志在塔下合上通主控站的电闸。在警卫班撤出后，我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采同志才最后离开。乘车回到主控站，我将启动原子弹爆炸的钥匙亲手交给张震寰同志，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在此期间，由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英负责指挥的现场人员也都展开了紧张的行动。10 时前

所有人员已撤到安全线以外指定地点；准备进入爆炸区的核侦察分队的人员和装甲车辆也已展开至出发位置。我于14时许回到基地指挥所，14时30分，张爱萍副总长向主控站下达开始试验的命令。取样飞机进入指定空域。主控站发出K1指令……发出K2指令……进入自动程序……进入倒计时9、8、7、6、5、4、3、2、1，起爆！强烈闪光3秒钟，蘑菇云开始升起，继而听到两声巨响，7分钟后蘑菇云上升到7000~8000公尺。此时，张爱萍同志兴奋地拿起话机向千里之外的北京，向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大声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首次核爆炸取得成功，试验获得完满成果。力学、光学、核测量三大项38个题目、测试仪器53种1129台套，全部取得了理想的数据；飞机、炮射伞也都取得足够数量的核分析样品。一阵惊雷震九天，自此，中国成为有核国家，核俱乐部五分天下而有其一。毛泽东主席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点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时光荏苒，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距今已经28年了。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今天的地位，是和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核俱乐部分不开的——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我国核技术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们，更不应忘记那些为了铸造祖国的核盾牌而献身的英烈们。

彭德怀在三线*

《彭德怀传》传记组

1965年11月28日，35次列车一声长鸣，从北京站开出，驶向成都。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身穿染成黑色的军呢大衣，端坐在这次列车的一节车厢内。两天后的11月30日，彭德怀抵达成都，开始在大三线这一新的岗位从事新的工作。

终于又重新工作了，彭德怀心中积聚了6年的工作热忱迸发出来，他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在国防重地大三线，为加速发展我国的军工事业做出贡献。

刚一到成都永兴巷七号住地，彭德怀就对接待他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说：“明天就开始工作。”杨沛说：“一路辛苦，休息几天吧！”彭德怀说：“我已经休息多年了。”

从第二天开始，大三线各局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大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指示，逐个向新上任的副主任彭德怀汇报情况。彭德怀对照挂图仔细记录、询问，最后发现，汇报者对他所关心的军工生产建设情况谈

* 本文节选自《彭德怀传》第38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得很少，或避而不谈。

两个月前，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和他谈工作分配时，他表示不愿到三线去，说：“工业生产我是外行，到西南去能做什么？！”彭真说：“军工生产你不是很熟悉吗？”彭真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和左权曾亲自筹划建立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成为我军第一代军事工业。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接替了兵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此后7年中，兵工生产从常规到尖端，从原材料到成品，从军用到军民两用，也都由彭德怀主持开会作计划，研究布局，批准产品定型。为了解有关情况，彭德怀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重要军工厂。就在被罢官前，还研究过在成都、西安增建飞机工厂的计划。他当之无愧地是新中国军事工业包括尖端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还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形。

彭德怀并不知晓这些，他仍然认真地听汇报。在汇报中，建委第一、第二副主任建议彭德怀分管煤炭和天然气供应等后勤工作。彭德怀明白了，作为“大三线”工作的核心——军工生产看来要对他“保密”了。他心头一阵不悦，没有表态，谈话无法再继续，他分管哪项工作也就最终没能确定下来。以后，建委不再提这件事。他和李井泉谈话，李不提分工问题，他也不再问。

安顿下来后，彭德怀开始翻阅他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当看到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那天）《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于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他看着看着一下把报纸摔在桌上，盛怒难当，脱口斥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思索了一会，又冷冷一笑，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听完汇报，尽管没有给他具体分工，他的热情还是很高，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不快也抛到脑后了，他很快开始下到工厂矿山参观、做调查。

自12月12日起彭德怀离开成都开始第一次外出调查，在抵达重庆参加完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后，他转道去内江、自贡和威远了解了天然气和碳黑的生产情况。

1966年元旦刚过，政治风暴卷压而来，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指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反党分子”——彭德怀作为目标。在这之前，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对三线建委来说，不是第三副主任彭德怀来了，而是“海瑞”来了，对待彭德怀的种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1966年一二月间于成都锦江饭店举行的三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上，彭德怀就是这样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怀

着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情参加的。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对三线建设则充满了希望。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 1958 年至 1960 年那样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即起程第二次外出调查，去渡口了解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情况。沿途他视察了成昆铁路的建设现场、西昌专区、石棉县石棉矿，还特地去了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并重访了他曾率红军攻打过的会理县城。

2 月 30 日，彭德怀到达渡口。渡口原是金沙江畔一个只有 7 户人家的小村，当时正在兴建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彭德怀在山上山下仔细参观，走得汗流浹背，看得振奋不已，连说真是好地方，毛主席决断正确。

在参观建设中的宝顶山煤矿时，彭德怀更难抑制感情。曾身受掘洞挖煤之苦的彭德怀十分熟悉这些“乌金”，他一再嘱咐陪同参观的渡口市委领导人说：“巷道支撑一定不能马虎，要绝对保证工人生产安全。”

渡口市火热的建设景象使彭德怀这个不写诗的人也诗兴大发，他并未把写的诗给别人看，只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他当日的满腔豪情：“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力无穷，众志成城心向党。”

不想短短的渡口之行，惹出了麻烦。

3月25日，彭德怀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深深缅怀当年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当听说还有一位曾为红军撑过船的老船工帅仕高仍健在时，他十分高兴，特地看望他，并以当年老红军的身分感谢他。彭德怀详细询问帅仕高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当听出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便在临别时送给老船工10元钱。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批判”彭德怀“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那位老船工也无辜受累。这使对老船工倾注了无限感激之情的彭大将军无法忍受，他大声斥责那些“批判”者：“人家是拼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

3月28日，彭德怀参观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场，牧场地处高山区，彭德怀为了解彝民的生活，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彭德怀一打听，去了10个人，一共付了两元饭钱。彭德怀说，那是人家的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写了一封信给畜牧场的干部：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两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

3月28日

这件事，连同他在其它一些场合的一些表现：如对当时建造每平方米造价150元，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的高级招待所不以为然；对许多县市专区和工矿企业竞相修建高级招待所，特别是四川省用西昌建设下马的钱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锦江饭店表示不满等等，都被指责为“借此吹嘘他是一向主张艰苦朴素”。

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

就是这次川南之行，使他了却了一桩萦怀已久的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德怀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珙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箸减食，痛悼不已。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视察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

《五一六通知》)。

在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谈会变成了批判彭德怀的会议。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一个个出来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3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已被“打倒”的彭真的关系，还要彭德怀就1959年庐山会议时被加上的莫须有的“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作出交代。对此，彭德怀胸怀坦荡地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要快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说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不得不暂时收场，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被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小组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

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后，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卷地而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迅速覆盖了中华大地。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会全上贴出了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开始遭到“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仍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被红卫兵认了出来，以后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怕红卫兵找我算帐？！”“算旧帐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

当时，彭德怀是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注视着“文化大革命”，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的。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也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应该说，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心是深信不疑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常有红卫兵闯进彭德怀居住的成都永兴巷七号的院子里来。开始是请他讲历史事件、红军长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等，他均热情作答。有些人提出些责难，他也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历史。

然而，红卫兵运动却朝着与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要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1966年12月，在江青、威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揪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一一作答。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因为这些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遂派了两个人回京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威本禹听了汇报后，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说：“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并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12月23日晨5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七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七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綦魁英叫起来，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红卫兵说：“现在就走。”

《红旗》红卫兵也是奉威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威本禹怕《东方红》再次“临阵”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总之，是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加以迫害。

《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又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结果，引起了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激烈争吵。双方冲突了一阵后，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联合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威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入川，准备在成都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押解彭德怀回京途中再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12月26日，威本禹写信报告江青：“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心知“揪彭”一幕是威本禹策划的，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得指示几点：不得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来京；只许

坐火车，途中确保安全；到京后由北京卫戍区接走彭德怀负责安排食宿。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揪彭兵团”，还要求向他们说明：周恩来“亲自关心这件事”。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几名战士的护卫下上了34次特快列车的一节专挂车厢。满身灰尘、爬满了“大串连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彭德怀就这样离开了他在西南三线的新的工作岗位。

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5日，彭德怀在大三线度过了1年又25天。

陈树湘传略

朱光梅

从苦难中觉醒

陈树湘，原名树春，字子凤，1905年1月30日（清光绪三十年腊月二十九）生于湖南省长沙福临铺一个贫苦的佃农家里。其父陈建业家祖祖辈辈务农。陈树湘5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8岁那年，因为家贫无以谋生，陈树湘的父亲不得不将他不满5岁的妹妹给人当了童养媳，陈树湘也被迫去给一家地主当了小长工，白天放牛割草，晚上睡在牛栏里看庄屋。小小年纪的陈树湘倒是颇有心计，白天他经常把牛牵上山，自己就和放牛娃们到一家私塾学馆窗外偷听先生讲课。时间久了，陈树湘不仅也学会认识一些字，而且发现有钱人家的孩子并不喜欢读书，一心贪玩；而穷人家的孩子想读书，但没钱没粮迈不进学堂的大门坎。少有壮志的陈树湘，已在心灵深处开始萌发对不平等世道的愤怒与仇恨。

1914年秋，因天旱农民颗粒无收。为逃荒躲债，陈树湘随父流落到长沙街头。后由陈姓族亲介绍在长沙小吴门

外落脚种菜。

1919年5月2日，湖南人民在新民学会的推动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日爱国运动。爱国学生连日在街头巷尾散发《请救山东人性命》和《请看我国之危险》等爱国传单，号召人民起来同卖国的政府进行斗争。湖南学联还组织了10几个演讲团，在街头巷尾作反日爱国演讲，陈树湘经常是卖完了菜就听爱国学生的演讲。当时是演讲者声泪俱下，陈树湘等也听得掩面而泣。有时夜不归家，他还站在街头看学生们演《鸦片战争》、《哀我台湾》等各种新剧，这使他从苦难中慢慢觉醒。从此，陈树湘开始关心政治了，关心时局了。湖南学联在长沙组织“五七国耻纪念游行示威大会”时，他赶去参加；学生们在长沙街头进行抵制日货活动，他也跑到城里为学生们帮忙。

站在党的旗帜下

1921年10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着手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办公地址设在长沙城东郊清水塘22号，与陈树湘家只有一岭之隔，他是首先受到毛泽东启蒙教育的第一批菜农。那时，陈树湘虽只有16岁，但已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八的大小伙子，深受毛泽东夫妇的喜爱。他经常过岭为毛家送菜挑水。陈树湘在这里先后结识了何叔衡、李维汉、周以栗、滕代远、郭亮、夏曦、夏明翰、毛泽覃等中共早期

党员，他们都帮他学过文化，帮他读过通俗革命读物，如《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士兵的生活》等等，这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有直接的影响。他开始从羡慕革命，到后来决心投身革命，并要为湖南的穷苦人翻身解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遂将原名树春改为树湘。1922年深秋，陈树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作出了开展农民运动的决议，特别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地农有”的口号。顿时，农民运动在长沙近郊蓬勃兴起，陈树湘也积极参加到这股革命洪流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挨家串联发动群众。

1925年，党派湘区省委委员滕代远到长沙近郊指导开展农民运动，逐步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与农民协会组织。此时的陈树湘报名参加了二里牌乡农民协会，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迅速成长起来。1925年7月，经周以栗、滕代远介绍，陈树湘在一家农舍里宣誓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抵长沙猴子石，各地农协积极配合支援北伐军作战，陈树湘等一批农协骨干更是一马当先，配合以叶挺为先锋的北伐军第四军和第八军直捣长沙城。战斗中，守敌叶开鑫弃城逃走，陈树湘等利用敌人溃败之机，夺得敌人枪支10余支，建立起一支以梭镖大刀为主辅以少数钢枪的农民自卫武装。陈树湘决心在党的旗帜下，拿起枪杆为穷人打天下。

秋收起义上井冈

正当革命形势大发展的时候，蒋介石 1927 年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反动军阀许克祥也于 5 月 21 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许多革命机关被捣毁，大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白色恐怖顿时笼罩了湖南全省各地。清乡队、侦缉队、铲共义勇队遍布城乡，铲共法院天天贴出枪杀共产党人的布告。清乡委员会下令通缉与追捕一批革命领导人和积极分子，陈树湘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大屠杀，陈树湘跑到东乡组织农民，参加了郭亮指挥的“十万农军围长沙”的斗争。但由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阻挠，农军又缺乏枪支弹药，所以由陈树湘组织和率领的农军一部到了东屯渡又散掉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陈树湘与杨立三、赖传珠、张令彬、刘荣辉和鄢辉等一批农军战友采取夜行昼伏的方法秘密到达武昌都府堤。

经历了“马日事变”的失败，陈树湘深深懂得了枪杆子的重要。当毛泽东和他们谈话并征求去向意见时，陈树湘坚决要求化名到国民党的部队中去当兵和带兵，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遂经周以栗介绍到张发奎的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新兵营当兵。这个新兵营当时驻扎在武昌黄土坡，全营官兵的素质很好，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大都是“马日事变”后被迫从湖南各地跑到武汉来参军的，

开始有 4 个连队，共约 500 人枪。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接到南昌来电，要立即开赴南昌参加新的行动。叶挺部第二十四师新兵营改编为警卫团三营。陈树湘所在的三连，改编为警卫团九连。出发前，陈树湘升任为三排排长。7 月 20 日，全团乘船顺江东下。但团领导不久就获悉有一支反动军队正在九江布防，不好通过，旋即决定在黄石港离船登岸，从陆地步行去南昌。当他们到达江西的奉新时，才知南昌“八一”起义部队已向南撤。于是，又转向西进到达江西的修水县城休整待命。

9 月初，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警卫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受命主攻长寿街的敌人，再进攻平江县城。然而，敌众我寡，部队出师不利，九连战至最后全连只剩下 30 几个人，干部只剩连长和三排长陈树湘，士气也十分低落。部队经过短暂整顿，当夜向湘赣两省交界的浏阳、铜鼓地区开进，后到达文家市与第三团部队会师。第二天，整个起义部队 1000 多人在里仁学校大坪里集合，听了毛泽东的动员报告，大家顿时精神焕发，失败的情绪一扫而光。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出发，又进入江西，接连在芦溪和莲花打了两仗。随即向井冈山进军。

部队在三湾进行了改编，随后进至水口、大汾，遭到靖卫团肖家璧、李世连的袭击。毛泽东率一部经黄坳、荆竹山先上了井冈山。待陈树湘随部队登上井冈山时已是 1927 年 12 月了。

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陈树湘此时已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三营，营长伍中豪，陈树湘升任为七连连长。部队在砦市整训期间，毛泽东、朱德经常来部队讲课，陈树湘也得以经常亲耳聆听毛泽东、朱德的教诲。

1928年7月，红四军党委决定，抽调一批军政骨干，组建红四军特务连，陈树湘被任命为特务连长，赖传珠任党代表。这时，正是湘敌两个师侵占宁冈县城，开始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之际。红四军决定乘湘敌进入江西，后方空虚，直捣湘军在酃县的巢穴，迫使敌人回援。陈树湘率特务连，随大部队参加了这一战事行动。10月，红四军特务连扩编为特务营，由毕占云任营长，陈树湘任党代表。他积极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同时，经常带着分队深入到宁冈、遂川、永新等地做群众工作和扩充红军工作。

征战在赣南闽西

1928年12月，湘粤赣三省敌人联合组织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红四军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主力组成进军部队，打到外线去，在赣南和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

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陈树湘等带领特务营紧随军部前进。这期间，几乎每日行军八九十里，甚至百余里。但

陈树湘不仅勇于战斗，而且还用其杰出的政治鼓动工作，使特务营全营上下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硬是把一个个困难顶了过去。

红四军进至福建武平东流后，又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境内行动。在大柏地取得歼敌1个师的胜利后，我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旋即与江西地方红军两个独立团会师。几天后，红四军经广昌东向福建边境前进，在福建长汀的四都又打了一场恶仗，消灭了盘踞闽西的土著军阀郭凤鸣的混成旅。随后，红四军乘胜进占长汀县城。在长汀，陈树湘第一次为全营官兵领发了统一制式的夏装。军部在这里还整编了部队，把二十八团主力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三十二团改编为第三纵队；陈树湘等率领的军直特务营和赖传珠等率领的军直独立营，以及二十八团三营改编为第二纵队。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政治委员罗荣桓，陈树湘升任为第四支队政治委员。

红四军在长汀附近休整了20多天后，毛泽东、朱德决定利用蒋桂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率主力转回江西行动，在赣南广大地区展开发动群众的工作。但对闽西地方武装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和朱德也十分关注，决定留下一批军政骨干，训练各地暴动的赤卫队，组建新的红军独立团队。为此，毛泽东亲自找陈树湘和一部分领导谈话，深刻阐述了留下工作的重要意义，鼓励他们依靠地方党组织，联系群众，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1930年1月，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陈树湘留在长汀

任（长）汀连（城）独立团团团长。他牢记毛泽东临行前的教导，率部游击在长汀、清流、连城一线，有时集中兵力扫荡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与筹集粮款；有时分兵以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主张，“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其时，长汀一带红色地方武装大为发展，各县都有一个或两三个独立团。有革命武装做依托，各县先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红色政权。

1931年，福建省军区在永定成立，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下设3个分区和3个独立师，即七、八、九师，陈树湘被任命为独立第七师师长。5月，独立第七师编入野战部队红十二军。1932年春，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入赣作战，陈树湘又调任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九师师长。5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由谭震林主持在上杭县石圳一带将3个独立师（即八、九、十师）改编为野战部队红十九军，由叶剑英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下辖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师，陈树湘被命为红五十四师师长。

1933年6月，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赣南紧张进行。为了支援江西红军作战，驻守在福建的红十九军缩编组建为新的红三十四师，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周子昆任师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同时将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师缩编成3个野战团，即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团。陈树湘由五十四师师长改任一〇一团团长，全团4个营，共约2000人。不久，红三十四师奉中革军委命令，配合红三军团（又称东方军）在闽西北开辟新战场，在中央苏区的外线打击敌

人。7月初，陈树湘率一〇一团由汀州进入宁化与清流之间集结参战。首仗攻打泉上土堡，由红五师正面攻击，红三十四师奉命支援。战斗刚打响，获悉敌卢兴邦的三〇九团从清流出来增援泉上守敌，彭德怀、滕代远立即命令陈树湘率团进至雾阁地区设伏，切断清流与泉上敌人的联络。当陈树湘率团进入设伏阵地不到半天，援敌三〇九团就来上钩了。经过1小时激战，全歼援敌。这时红五师等部也发起了总攻击，歼敌1个团，毙敌300余人，其中团长1人，并俘敌14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和食盐，还挖出银元1万多块。

首战告捷，盘踞在清流县城内的卢兴邦见大势不妙，率残部弃城向永安撤退。陈树湘又奉命率团奔赴秋口，截击从清流城内撤出的敌人，将卢部残敌打了回去。接着，陈树湘转战至马屋附近，又将从连城出来增援清流的敌十九路军七十八师1个团击溃，乘胜夺取占堡，有力配合了红四师攻占清流县城，受到彭德怀、滕代远的表彰。接着，陈树湘又奉命奔袭四堡。由于敌人已被红军打成惊弓之鸟，驻扎在四堡的敌军两个团，不待红军开火，就连夜撤回连城。

接着，红三军团组织发起连城朋口战斗。陈树湘率一〇一团参加了战斗。此役歼敌1个旅部又3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获枪支7000多支。红军接连取得泉上、朋口大捷后，解放了清流、明溪、连城等广大地区，恢复了上（杭）新（泉）连（城）各县苏区，开拓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区，与原来的

苏区连成一片。

保卫苏区的岁月

1933年9月，蒋介石又调动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方针，震惊于黎川一城的失守，不顾红三军团和陈树湘所在的红三十四师等部在闽北正是消灭敌刘和鼎部、发展福建苏区的大好时机，而令他们北返赣南。陈树湘等率部从沙县撤回到泰宁地区集中，奉命随三军团向黎川以北硝石的敌人发动毫无成果的进攻。恰在这时，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并同共产党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镇压十九路军。至1933年底，蒋介石入闽部队已逼进南平，矛头直指福州。为对濒于危局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表示支援，红三军团回师泰宁。在红三军团到达前，以驻守泰宁的红十九师为基础，成立了以寻怀洲、肖劲光为首的红七军团，陈树湘所在的红三十四师隶属红七军团指挥。

1934年1月初，当红三军团从建宁下泰宁时，红三十四师仍奉命配合红三军团作战，连克将乐、归化等县城，并解放了沙县外围的富江、夏茂等镇。接着，又克复沙县县城，红三十四师奉命驻守沙县县城。这时又一场恶战已战云密布。蒋介石打垮了十九路军后，倾注全力，分兵4路，

向中央苏区继续实行疯狂的“围剿”。驻守在沙县的陈树湘所在部队，遭到敌东路总指挥蒋鼎文部的猛烈围攻。由于陈树湘预先发动了群众，新编了地方独立团队，所以组织了有力的抵抗，大量杀伤与消灭了来犯敌人。

1934年2月，红三十四师奉命撤出沙县县城，开往宁化、清流、归化一带消灭民团，打击土匪，筹集粮食，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准备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但错误的指挥者，却要他们实行“短促突击”，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于是部队长途奔袭，从闽北的邵武、光泽，进入江西的资溪、金溪，参加浒湾地区的战斗。行前，公布命令，彭绍辉接替周子昆任师长，程翠林任政委，袁良惠任参谋长，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此时，红三十四师已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好部队。这次北上，主要是奉命增援红一、五军团的作战。由于守敌顽强，加上敌从南昌来的增援部队已到了抚州，战斗相持数天，浒湾未能攻克，红军主动撤退。红三十四师又从黎川城东南下团村设防，担任阻击敌汤恩伯纵队向南进攻的任务。由于红军在错误路线指挥下，在战术上采取阵地战、正规战，抛弃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的方针，采取以堡垒对堡垒，以主力对主力，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等作战方式，因此红三十四师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陈树湘和全师官兵坚守阵地作战六七天，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师长、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在战斗中都负了伤。部队撤出战斗，又进入福建

泰宁地区补充兵员，休整待命。

1934年3月中旬，广昌失守，红三十四师奉命坚守泰宁。战斗打响前，军委任命陈树湘为师长，王光道为参谋长，蔡中任政治部主任。陈树湘就任后，随即在泰宁县城召开全师团以上主要干部会议，会上对死守泰宁还是派部队主动出击，争论得十分激烈。大多数干部主张主动出击，反对死守，可是上级否定他们的正确主张，命令陈树湘率部死守泰宁。于是部队恶战了1天1夜，虽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导致泰宁失守。陈树湘奉命率部退至梅口，重新组织防御。

梅口，地处福建泰宁与建宁之间，是通往中央苏区腹地宁都与瑞金的大门。1934年4月初，敌周浑元部一个纵队又逼近梅口。在敌人发动进攻前，陈树湘召集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分析了梅口的地理民情，进行了作战部署。他还亲自到当地政府作动员，群众在地方干部的带领下，军民一齐动手，仅用1天多的时间，就在梅口沿河滩挖了许多战壕掩体。当敌第八十八师进攻时，陈树湘率领全师官兵以密集的火力阻击强行渡河的敌人。敌虽多次组织冲锋，但被一次一次打退。全师在梅口坚持了7天6夜，大大迟缓和了敌人前进的计划。

1934年4月18日，陈树湘又率红三十四师从梅口撤出战斗，奉命到达建宁接替红十五师的防务，主要任务是防御由黎川南下、泰宁西进的敌人。部队一直坚持到5月初才主动撤出建宁县境。

1934年5月5日，陈树湘奉命率师后撤至江西石城的驿前地区设防。在此地陈树湘率全师打退了敌蒋鼎文1个纵队的进攻，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他们在此坚持战斗了7天7夜，才奉命与兄弟部队换防，随后开往高虎垴的西侧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1934年6月底，陈树湘率三十四师赶到高虎垴西侧的香炉寨。此时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已在此坚持阻击敌人1个月了，三十四师的增援无疑给坚持战斗的部队带来巨大鼓舞。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来到三十四师的阵地前，拍着陈树湘的肩膀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现在要你率全师以英勇机智的战斗作风，乘胜突袭到敌人的侧翼里去，破坏敌人的后方，保障我们正面的攻击。”陈树湘心领神会，他派出奇兵，沿着高虎垴西侧的一片松林，孤军突到敌人的侧后15里，集中一切火力猛袭，加上兄弟部队正面攻击，使敌人一下溃退10里。这一仗使敌人伤亡惨重。战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地撤了陈诚前线总指挥的职。

1934年7月底，陈树湘奉命率三十四师奔赴宁都城北的会同设防。8月5日，陈树湘又奉命率师奔赴兴国城北老营盘支援红五军团作战。9月初，在高兴圩加入阻击敌周浑元、薛岳两纵队的战斗序列。这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陈树湘师扼守墩丘以东防线，并令其在北侧进行运动防御战斗。不久，朱德又电令陈树湘在长迳口以东，拿出一个主力营出击桐林东北高地，然后全师扼守兰田和新田一线，和敌人进行艰苦的阵地战。由于中央苏区整个形势日

趋恶化，红三十四师在此和敌人打得异常激烈和艰苦。

1934年10月6日，陈树湘奉命率红三十四师撤退至兴国城以南的社富设防。不久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十四师随红五军团接替红一军团的防卫阵地，利用纵深重叠工事，节节抵抗，想方设法迟缓继续向南推进的敌人，保证兄弟部队在于都地区的隐蔽与集结。

铁流后卫阻强敌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在王明路线的错误指挥下，虽经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顽强地坚持了1年又1个月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但终于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告失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五、八、九等5个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18日，陈树湘率红三十四师遵照中央和军委的命令，最后撤离兴国进入于都，并在鲤鱼坝设防，掩护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和5支主力军团渡过于都河。在主力全部过河后，他们才于19日深夜在瑟瑟秋风中，最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苏区人民，离开了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一踏上长征征途，陈树湘率红三十四师就肩负起全军后卫的艰巨任务。由于当时“追剿”之敌紧紧跟在我军后

面，战斗十分频繁。毛泽东曾风趣地说：长征初期采取的战术是打狗战术，红三十四师边打边走，走在后头。全师指战员也自誉是长征中的打狗队。作为“打狗队长”的陈树湘师长，比其他师、团指挥员更为紧张，一直是兵不卸甲，马不离鞍，哪儿出现了敌人的追兵，他率领的红三十四师就迎上去展开堵击战斗。

1934年10月下旬，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猛扑湘粤，锐不可挡。红军主力分3路向汝城、仁化推进。10月28日，红一军团从左取聂都，奔袭城口，红三军团从右连下集尤和壕头，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和仁化城口之间通过。粤敌叶肇部第二师和陈章旅闻讯后分别从南雄、吉村驰赴仁化长江口汇合，向城口挺进；湘敌钟光仁旅也配合粤敌第二师从北向南压来，妄图截断中路的中央军委机关纵队的通路。陈树湘指挥红三十四师立即从南北两面展开，猛烈袭击长江口粤敌和汝城南湘军各1个前锋团，掩护机关和部队向延寿文明司前进。接着，陈树湘又率红三十四师在汝城县西南的延寿、岭秀、靶子场、珊瑚岗一带，同陈伯钧率领的红十三师阻击追敌。在杀伤敌人一部后，再主动撤出延寿向宜章前进。

1934年11月初，红军在连续突破敌人两道封锁线之后，继续分兵3路西进。11月14日，各路红军胜利地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并在宜章休整数日，宣传群众，扩充红军，尔后分路向临武、兰山等地前进。当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从临武出发，以200里急行军速度，迅速抢占了

道县城后，敌周浑元的4个师追了上来，进至宁远和道县边界的天堂圩、柑子园附近。陈树湘果敢指挥红三十四师迅速抢占几块高地，和红一师坚决顶住敌人，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陈树湘沉着地指挥全师凭借有利地形，节节抗击，迟滞了敌军的行动，又一次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摆脱了敌人，并于25日在道县、江华间顺利地渡过潇水。

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后，红三十四师在道县城南设防，拆除浮桥，隐蔽船只，迟滞敌军行动。但敌军从潇水上游白马渡抢劫民船和砍树制作木筏，也渡过了潇水。陈树湘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纵队安全西征，他指挥全师又在道县城南葫芦岩、岭江渡与敌展开了激战。

浴血奋战湘江畔

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为阻止红军前进，他又调集40万大军在湘江沿岸300里长的地段精心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湘江天险，迫使红军在此决战，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

当红军主力军团进至湘桂边境时，陈树湘已深感局势的严峻。要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势必要有一场血溅尸飞的恶战，拼他个你死我活。中革军委在战斗部署上，仍然选中陈树湘率领的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的总后卫，走在最后头，负责“打狗”。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

长刘伯承匆匆来到仙子脚，召集正在潇水西岸岭江渡、葫芦岩一带阻击敌人的红三十四师的师团干部举行紧急会议，并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刘伯承拍着陈树湘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在敌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把整个殿后任务交给你们师，这个担子很重啊！你们既要有完成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的决心，又要有万一被敌截断而孤军作战的准备。”接着，董振堂强调说：“红三十四师是个有光荣传统的好部队，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三十四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陈树湘代表全师干部表示决心：“请军团首长放心，并望转告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红三十四师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争光。”

红三十四师受领任务后，陈树湘与政委程翠林向各团干部布置了作战任务。决定由一〇〇团先行，急进灌阳，在枫树脚接替红六师阻止桂敌北犯；陈树湘带师部，并协助一〇一团居中指挥行动；程翠林协助一〇二团跟进。待掩护八、九两军团通过苏江、沧江后，全师大踏步地迅速西进，在文市、水车一线接红五师的防务，阻击尾追之敌周浑元、李云杰等部，保证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机关安全渡过湘江。

为了突破敌人精心设计的第四道封锁线，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最壮烈的湘江战役，终于在26日拂晓正式展开了。红三十四师与尾随追击之敌李云杰、李韞珩部及国民党地方保安旅团频频接火。27日，陈树湘率全师经蒋家岭、

雷口关急速进入灌阳，在水车至文市一线布防，阻击追敌。此时，陈树湘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连夜与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分别到各团的阵地上检查兵力火器设置及工事掩体构筑情况，并向指战员作宣传鼓动工作。

28日，天刚放亮，敌人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空中几十架飞机轮番侦察、轰炸，追敌也分多路扑了上来。由于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速度十分缓慢，担负长征红军总后卫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处境也就更为险恶。在南有桂敌夏威的部队推，东有两李的部队追，北有薛岳、周浑元、罗卓英、王均等中央军几路纵队挤压的情况下，红三十四师的阻击战异常激烈。面对10几倍于己的敌人，陈树湘镇定自若，毫无惧色，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指挥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紧紧地从三面奋力顶住敌人，顽强地堵击数万敌人的进攻，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鏖战还在继续。硝烟滚滚，杀声震天。陈树湘和他率领的红三十四师指战员们都深深懂得，阻击战多坚持1分钟，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江就少一分危险。于是，他们用鲜血与皮肉筑起一道如钢似铁的长城，拦截堵击象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前后鏖战了4天5夜，一直坚持到30日凌晨，为中央和军委两个机关纵队赢得了宝贵的渡江时间，直到掩护红军最后一支部队——红八军团顺利渡过湘江，陈树湘和他率领的红三十四师才最终完成了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的后卫掩护任务。

掩护任务完成了，但红三十四师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全师 6000 多人已不足千人。30 日清晨，陈树湘下令全师上下转入为自己过江作准备工作。他们开始收缩部队，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疏散安置受重伤的战友。接着先头分队赶往江边迅速架好了浮桥。当部队刚开始西渡时，就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和地面敌人的重重围攻，浮桥被炸毁了，部队又伤亡了 200 余人。陈树湘指挥部队火速突出重围，沿湘江东岸北去，经燕头、大塘、苗源，到达全州南边的洪水青。

1934 年 12 月 1 日上午，红军在湘江的主要渡口——界首已被桂敌占领。当日下午，主要的徒涉点——凤凰咀，亦落于湘敌之手。至此，在北起东安、南至兴安的湘江沿岸的渡口全被敌人封锁。敌东岸有 4 个师，西岸有两个师。这一天，陈树湘率红三十四师翻过海拔 1900 米的宝盖山，到达全州的箭杆青，再经安和出凤凰，试图再往湘江边上的凤凰咀徒涉渡江。哪知这一企图被敌发觉，遂遭遇桂敌四十三师、四十四师的猛烈阻击。陈树湘焦急万分，预感到这次可能是争取渡江的唯一机会，于是他操起一支步枪，亲率部队冲锋。由于是孤军作战，加之连日的疲劳饥饿，部队虽几番殊死搏斗，亦未能打败敌人，夺得江边的徒涉点。特别使陈树湘难过的是部队又伤亡 100 多人。与他一起经过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友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和两位团长都在此战斗中牺牲。此时，全师所剩只七八百人枪，又被湘江东岸的敌人冲散。陈树湘眼看过江追赶主力部队已不可能，只得强忍悲痛和怒火，下令参谋长王光道

带领师部机关和部队 300 余人，向东折回全州、灌阳之间的岭脚暂避。

在此艰苦的转战中，红三十四师余部上下十分疲惫与饥饿，又常与湘桂两省的敌保安旅和民团等地方武装频频接火，人枪不断减少。12月3日，在罗塘和梓木塘遭民团唐炳煌部的袭击；5日在洪水青又遭伍明勋、易生玉等部的袭击，战斗一整天，又伤亡一批久经战火磨炼的干部战士，直到黄昏才借夜色分别突围，到达龙母霸集中，但此地无大山，不便久留与休整。向何处去？望着满身硝烟尘土、忍受饥饿疲劳和伤痛折磨的战友们，迎着凛冽刺骨的寒风，陈树湘感到肩上的压力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沉重。今后如何行动？怎样才能摆脱孤军无援的困境，为部队保存下有生力量？他想起了董振堂和刘伯承交待作战任务时的讲话，旋即亲自起草电文请示中革军委。不久得到回电，要红三十四师迅速退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去。陈树湘心头一亮，连夜召集师团干部和党员开会，宣布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工农解放留尽最后一滴血。接着，他和参谋长制订了突围方案。

正当红三十四师准备突围时，桂敌四十三师一部又发起了进攻。面对疯狂的敌人，陈树湘满腔怒火，指挥部队集中兵力火力进行了猛烈反击。敌人一时被打得晕头转向，急忙后撤。这次胜利，鼓舞了战员的信心，但毕竟是孤军作战，陈树湘当即命令：“乘胜立即突围，不能错失时机。”

这时，红三十四师所剩人枪已不足700。陈树湘决定兵分两路突围，向湘南前进。一路系师直分队和一〇一团、一〇二团余部，共约400人，由陈树湘率领从江塘经永安关进入湘南道县的大岩村；一路系一〇〇团余部，大约200多人，由团长韩伟、二营长侯德奎指挥，掩护师部突围，然后从八工田、柳木青方向撤走。但一〇〇团在到达大江源时遭地方民团武装的袭击。经一场恶战，全团仅剩30多人，后失散。陈树湘得此恶讯，悲愤不已。

12月9日，红三十四师的另一路近400人在师长陈树湘、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经德里、大营到达道县瑶族聚居的空树岩村。在这里，陈树湘发动指战员写标语，向群众演讲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动员青年瑶民参加红军队伍。这时广西地方民团已从灌阳方向逼近。为了保存力量，陈树湘率部队沿都庞岭山麓向南退却。当行至永明（今江永）的大溪源时，湘敌何键部成铁侠旅及道县保安团尾追而来。陈树湘率部且战且退，退至小坪附近，敌唐继候部又闻讯赶来截击，红三十四师与敌在上木岭激战半日后，转向江华、永明边境一带，在大宝腹又与敌遭遇接火。陈树湘巧妙地指挥部队边战斗边转移，直到深夜才甩掉敌人，抵达上江圩，得到短暂的休息与整顿。

断肠就义留青史

1934年12月12日，陈树湘率领红三十四师余部进至

桥头铺。当日晨，他们计划在马山附近抢渡牯子江。陈树湘仔细地观察着河面升起的白雾，两岸的密林里显得异常寂静。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陈树湘，判定这里可能有敌人设伏，是个危险地方，于是命令指战员们继续作好战斗准备。果然不出所料，当木船行至江心时，两岸突然枪声大作，中了敌江华县保安团的埋伏，部队伤亡惨重。陈树湘指挥木船奋力抢渡，快接近岸边时，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腹部。很快小船靠岸，陈树湘坚强地紧了紧皮带压迫住伤口，战士们迅速扎起一副简易的担架，把他按在担架上抬着就走，由江华的界牌再进入道县。敌道县保安团闻讯，又尾追了上来。

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急速前进，山路崎岖，上岭下坡，担架颠簸得十分厉害。鲜血已浸透了陈树湘的衣服。望着师长苍白的脸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指战员们又心疼又着急。这时敌情严重，为了减少伤亡，陈树湘命令部队沿途尽量减少与敌接触。

当部队到达驷马桥的早禾田时，在左侧的山头上又突然响起了枪声，一股地方反动武装——道县义勇总队扑了过来。参谋长王光道立即指挥部队边打边走，在到达清水塘时，红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击退了敌人。这时陈树湘立即对指战员作出指示：“敌人还会反扑的，可能会出现种种意料不到的情况，大家要各自为战，冲出去，到前面的牛栏洞山区汇合。”果然，刚布置完毕，敌江华、宁远、道县3个保安团便蜂拥而至，红军战士且战且走。几个抬担架的，

奔跑行走很不方便，也不安全。陈树湘见此情景，再三挣扎着要下来，战士们说什么也不同意。当部队退到富竹湾时，路边馒头岭上又响起了枪声，另一股地方反动武装又向我军进行阻击。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十分严重，陈树湘当机立断，命令1个班抢占馒头岭对面山头打掩护，其余指战员迅速冲过敌人的火力网。战士们立即作好冲击准备。陈树湘怕拖累大家说什么也不走了，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抬着我，能冲得过敌人的封锁线吗？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革命力量，死了我一个陈树湘算不了什么，你们赶紧冲出去，不要管我！”“师长！师长！”指战员们心如刀割，一个个端着枪，谁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可敬可爱的英雄师长。大家不由分说，强行把他放上担架，由两个大个子战士抬着就走。这时，馒头岭对面的山头被我军占领，向馒头岭上的敌人猛烈射击。战士们见时机已到，奋力向前冲去。

眼看就要冲过敌人的火力网，突然，抬担架的两个战士被子弹击中，陈树湘滚在田沟里，两个警卫员马上扑上来保护，陈树湘推开他们，喊了一声：“打，掩护同志们！”接着便举枪向敌人连连射击。枪声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同志们在王光道参谋长率领下安全脱险了。这时陈师长在两个警卫员的搀扶下，撤退到路边的一座破庙里，继续向敌人射击。可是，当敌人不断涌来的时候，他们的子弹却打完了。陈树湘叫警卫员扶着，走出庙门。他不动声色，象一尊巨人屹立在庙堂前的草地上。

坐镇在驷马桥正生药店的敌保安团营长何湘，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立刻叫人把陈树湘抬到药店里来。陈树湘大义凛然，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嗤之以鼻。何湘黔驴技穷，没有办法，只好叫人抬着陈树湘，送往道县城保安团司令部，向他的上司邀功请赏。

上午8时许，一队敌保安兵押送陈树湘行至道县石马桥时，陈树湘为了保持革命气节，使人格不受敌人的侮辱，在路上乘敌不备，毅然从伤口处掏出肠子，忍着无以言状的剧痛，把它绞断而英勇就义。这位英雄的红军师长，这位如高山屹立挡住千军万马之敌的红军师长，这位宁愿化作舟桥让主力红军从自己身上平安渡过湘江的红军师长，就这样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时年仅29岁。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为工农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庄严誓言，并用生命谱写了长征史诗中一曲最动人心魄、震撼河山的悲壮乐章。

更 正

《中共党史资料》43辑第228页倒数第2行“北京市公安局”应为“上海市公安局”，特此更正。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 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分歧

王 德 京

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至1927年上半年期间，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和组织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中途叛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遭到失败。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关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问题上，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中心是国共合作问题，争论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本文仅就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作一粗浅的介绍。

一、分歧的产生和发展

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争论并不很明显。尽管托洛茨基自己说过，他在1923年就“坚决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而且在1923年春，他“再次提出过一个正式的建议，让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

党”，^①但是，当时并未引起严重争论。托洛茨基集中反对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是在中山舰事件以后，尤其是在“四一二”政变以后。这是由于从1926年夏开始，联共（布）党内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主流派同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斗争趋于尖锐化，他们在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成为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一个重大步骤。在以蒋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威逼和压力下，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回国，中共党员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当时被认为是左派领袖的汪精卫也出走欧洲。随后，蒋介石又迫使中共接受了“整理党务案”。从此，蒋介石取得了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受到削弱。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保持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联盟而对蒋介石采取的妥协让步政策，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引起了意见分歧。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提出了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也写信给联共（布）中央，要求对中山舰事件后的策略方针进行解释。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受到公开的批评，斯大林也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指出退出国民党的

^① 彭述之：《托洛茨基论中国》导言，转引自刘志强：《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及影响》，见《中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72页。

意见是错误的，但是，这一意见却得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的支持。于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问题的争论，便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为对立两方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展开了。是年秋，托洛茨基提出“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的主张。1927年3月，托洛茨基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指出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上海后，资产阶级将会急剧右转，共产党将会在这种转变当中遭受失败，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不能再延搁一日，并且提出组织苏维埃以取代国民党的主张。但这种主张仍为斯大林等主流派所拒绝。

“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进一步发展。由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对国民党右派蒋介石过分信任和依靠，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当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共产党人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大批优秀革命者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面对这一血的教训，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的领导者斯大林，没有冷静地去思考过去政策上的失误，而是急忙地去为过去的政策进行辩护。“四一二”政变后的第9天，斯大林发表《中国革命问题》（即给宣传员的提纲）一文，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①坚持对武汉国民党继续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并提出“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页。

党”的口号。5月9日和13日，斯大林又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进一步阐述了以上思想。

对于斯大林的观点，托洛茨基立即予以反驳。5月7日，他写了《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一文，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全面提出了与斯大林相对立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革命四月的失败，不但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①现在对武汉国民党的政策，“是重复过去的错误”，^②必定还要遭到失败。他明确提出，必须成立苏维埃，与武汉政府对峙。随后，托洛茨基又写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和《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问题》两文，再次阐明退出国民党和组织苏维埃的观点。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达到高潮。双方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甚至互相攻击。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指责联共（布）中央禁止季诺维也夫出席会议和拒绝公开他们的提纲是非法的。同时，全盘否定布哈林提交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他还在会议期间，于5月19日、27日和28日连续写了《还不是觉悟时期吗？》、《觉悟与矫正的时期到了》和《汉口与莫斯科》等文章，尖锐批评斯大林对武汉国民党的政策。斯大林则于5月24日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他在论述中国革命的任

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集第26页、54页。

务和性质后，继续坚持“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①的政策，提出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认为托洛茨基的批评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②

会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日趋严重，武汉政府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虽然比过去的政策有所进步，但仍然对武汉政府抱有幻想，未能挽救危急的形势。托洛茨基等于7月2日写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一文，系统地提出了反对派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大革命最后失败。托洛茨基便宣布：“整个斯大林中国路线已公开破产。”^③对此，斯大林分别于7月28日和8月1日发表了文章和演说，论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是符合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认为“反对派离开了列宁主义的策略，其政策是‘过右的’冒险主义”。^④由于联共（布）党内两派斗争的日益激化，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终于被开除出党。后来，季诺维也夫被处决，托洛茨基则于1928年1月被流放至阿拉木图，1929年1月被驱逐出境，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遇刺身亡。

二、分歧的主要内容

①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7页、259页。

③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苏维埃的口号》，转引自杨云若、邱路：《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问题的争论》，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④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25页。

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分歧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共产党人应否留在国民党内以及何时组织苏维埃的问题。围绕这一争论焦点，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估计问题

斯大林在和反对派论战的时候，曾经正确地指出，必须“把帝国主义国家（即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即受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加以严格的区别。”^①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不也触犯到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革命的因素。”^②这些观点无疑是符合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但是，斯大林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时候，对它的妥协性一面估计得很不够。1925年5月，他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一文中提出：“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③在这里，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产生了妥协派，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妥协派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则是错误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在一定的时期中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1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3—124页。

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但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斯大林关于资产阶级妥协派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的论断，后来一直成为他处理同国民党右派关系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对右派只联合不斗争的右倾政策。直至“四一二”政变前一周，当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已明显暴露时，斯大林还坚持这一观点。当斯大林这种对国民党右派一厢情愿的幻想，被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打得粉碎后，他却仍然为一这政策辩护。他在“四一二”政变后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说：“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①他把“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②概括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四一二”政变之前）的总政策，并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路线”。^③但事实证明，这种对右派只联合不斗争的政策，并不能保持国民党的统一，而是导致了分裂；也不是右派为革命所利用，而是右派利用了革命群众，在丰满了自己的羽翼之后，叛变了革命。

托洛茨基批评了斯大林的右倾错误，指出其“利用右派”的结果，是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消灭和残杀工农。但托洛茨基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抹煞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他说：“以为殖民地的受压

①②③.《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页、204页、201页。

迫，必然要发生一个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了解就是留恋于孟什维克主义的基本错误。”^①托洛茨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反动，甚至会比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迅速地将阶级斗争变成国内战争以屠杀工农。所以，他根本反对联合资产阶级，认为无产阶级只能“在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和农民中作夺取群众的争斗。”^②这显然是一种极左的观点。

2、关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

国民党的性质是比较复杂的，改组以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但有许多地主、买办、官僚政客混入其中。改组以后，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吸收了大量工农和青年知识分子，同时，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从这些方面来看，改组后的国民党也可以说已经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是，国民党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一些地主、买办、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也仍然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相当的地位。这是国民党右派的社会基础。

斯大林对国民党内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是认识不足的。1925年5月，他提出了国民党是工农政党的论点。他说：“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

^{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集第36—37页、19页。

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① 并认为，国民党就是这种统一的工农政党的形式。^② 后来，尽管斯大林于1927年5月，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声明：“我在1925年谈国民党是工农联盟的政党的时候”，“所指的不是一般人民革命政党（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现在，而是它们的将来”，^③ 但在实际上，他这种说法已被作为对国民党当时状况的正确估量而加以宣传，并在1926年2至3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得到确认。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准确地说，主要是它的左翼）按其社会成分，按其基本骨干和思想体系，是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一个例子”，“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及其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特殊形式”。^④ 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⑤ 根据会议《提纲》的第10条，这里的“城市民主派”是指城市小资产阶级。可见，在关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上，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所通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3—124页。

② 见《六大以前》第99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3页。

④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7年第6期第29页。

⑤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36页。

过的提纲和决议，都贯彻了斯大林 1925 年 5 月的讲话精神。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对斯大林 1925 年关于国民党性质的结论作了部分的修改，该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同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农民、同城市小资产阶级、部分地也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各种力量的这一联合，从政治上表现为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相应改组。”^①但是，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认为，广东国民党政权是未来工农民主政权的萌芽，广东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②这表明，斯大林实际上仍然是把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都看成是代表工农利益的。

如果说斯大林对广东时期国民党性质的阶级分析是被误解了的话，那么，他对武汉国民党性质的认识则是明白无误的。“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明确指出，武汉国民党事实上就是工农联盟的政党。他说：“国民党所应当依靠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联盟，这个联盟从国民党分裂和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以后在武汉开始形成，1925 年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报告中所谈到的就是这个联盟。”^③

斯大林对国民党性质的错误认识，大大美化了国民党，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第 277 页。

②③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325 页、第 9 卷第 224 页。

夸大了它的革命作用。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视国民党改组以后资产阶级在国民党中仍占优势的事实，片面地认为共产党一切都应该通过国民党去“对于革命运动进行实际领导”。^① 尽管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对 1925 年的提法作了很大的改变，他在《时事问题简评》（1927 年 7 月 28 日）一文中说：“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上，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② 并说：“这些阶级的代表是和共产党人一起在一个叫做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内共同进行工作的。”^③ 但这为时已晚，“工农政党”之说，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了。

托洛茨基批判了斯大林关于“工农政党”的论点。他认为这种观点“乃是在党的根本问题上及阶级关系上，……整个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问题”，^④ “是故意特别为那些需要农民或工人帮助的资产阶级政党造出的面具”，^⑤ 实际是隐蔽资产阶级，“在有利于他的时机到来时，使其容易准备上海事变。”^⑥ 但是，托洛茨基又走向另一极端，认为国民党是敌人的工具。他说：“国民党实质上已成了帮助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工具”，^⑦ “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一根皮带，用以奴役革命民众。”^⑧ 这样，托洛茨基不仅否认

①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124 页。

②③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305 页、306 页。

④⑤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 2 集第 79 页、82 页、85 页。

⑦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 1 集第 29 页。

⑧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 1 集第 23 页。

了国民党曾经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的政党，而且还否定了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帮助，否定了国民党改组以后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种“左”的观点，对革命同样也是有害的。

3、关于党内合作形式问题

斯大林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认为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都必须同国民党保持党内合作的形式，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① 斯大林的这一论点，把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看成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还把党内合作的形式固定化起来。这与列宁的思想是不符合的，列宁认为共产党人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联合是有条件的。列宁说：“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② 斯大林还忽略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除了联合的一面外，还有斗争的一面，必须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9—28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4页。

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由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的。共产党人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如果不和它进行斗争，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

至于合作的形式问题，党内合作只是统一战线的一种形式，它既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能笼统地说是最好的形式。采用哪种形式，应根据当时的条件而定。在共产党刚刚成立、力量还不够强大，国民党不同意党外联合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迅速打开革命局面，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工农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反动活动越来越嚣张，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从处处限制发展到打击、破坏和镇压。这时，共产党就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或中断合作关系，或另寻其它合作形式。而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把党内合作形式固定化起来，那么，当资产阶级向工农群众发动进攻时，为了拉住资产阶级，避免合作破裂，无产阶级势必作出无原则的迁就和让步，其结果只能是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种同资产阶级只联合不斗争的方针，只能是向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妥协。

托洛茨基明确地批评了斯大林把党内合作固定化的做法，他说，依着这种做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离，只是在资产阶级自己把无产阶级抛却，解除他的武装，拳

打脚踢的时候才可以的”。^①这个批评是击中要害的。但是，托洛茨基不仅仅是反对把国共党内合作形式固定化，而是根本反对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他认为这是“将无产阶级政党与大资产阶级放在一个为大资产阶级占领导地位的圈栏内的政策。”^②这种政策，使中共“服从了将军队和政权都握在自己手中的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国民党”。^③因此，托洛茨基一直反对国共党内合作，特别是中山舰事件后，他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虽然在“四一二”政变后，他也曾一度表示同意共产党人留在武汉国民党内，但他的这一态度显然与一段时期内反对派的内部意见不统一有关。当时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人认为，共产党人应暂时留在国民党内，托洛茨基为了保持反对派内部的一致作了妥协。因而他的这种态度持续时间极为短暂，马日事变后，他又表示，中共必须立即退出国民党。托洛茨基从全面否定国民党出发，因而也全面否定党内合作的政策，这当然也是错误的。

托洛茨基不仅坚决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而且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他认为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是用民族斗争“取消了阶级斗争的法则”。^④在托洛茨基看来，由于“经济上政治上中国资产阶级与外资相连”，所以，被压迫的劳苦群众反帝斗争的兴起，“正

①②③ 《中国革命问题》第1集第39页、36页、40页。

④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集第212页。

是推动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公开的军事上的结合。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但不能减轻工农与资产阶级间的冲突，而且适得其反，更加剧了阶级的冲突以至于流血的国内战争。”^① 这种观点完全抹煞了在民族压迫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这就根本否定了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革命理论。列宁说：“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暂时的联盟，但不要同他们融为一体，无产阶级运动即使处在萌芽状态，也要绝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② 托洛茨基则在片面强调无产阶级独立性的同时，根本拒绝与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联盟，这就越过了真理的界限，变成了谬误。

4、关于政权问题

根据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共产主义”^③的思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提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斯大林提出，中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并认为广东政权就是这种政权的萌芽，而武汉政权则“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④ 并提出了“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⑤的口号。在这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论点，无疑是具有重

①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集第30页。

②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5页、336页。

④⑤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页、204页。

大意义的。但是，他对广东政权和武汉政权的性质的认识是错误的。实际上，不论是广东政府还是武汉政府，其领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手中。武汉政府虽委任了两名共产党员部长，但迟迟不能到任。在工农运动高涨时，武汉政府竟发布了一系列限制和镇压工农群众运动的反动训令，这就完全背叛了孙中山“扶助工农”的主张。

由于对国民党政权性质的错误认识，斯大林对广东和武汉政权都极为信任和依靠，幻想通过它们来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武装。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说：“在新解放的省份里将成立广东政权这种类型的新政权”，共产党人应加入新政权机关，“通过这个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也说：“农村一切武装力量归革命政府机关管辖”。^②甚至当武汉政府的反动面目明显暴露的时候，共产国际在给中国党的紧急指示中，仍然认为工农武装应为武汉政府控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也还认为土地革命应由武汉政府来发动。由于把对工农运动和建立与发展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致使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力量，也没有在群众中建立牢固的基础。当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时候，共产党束手无策，毫无抵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1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81页。

抗力量，使革命蒙受巨大损失。

托洛茨基认为，“称国民政府为工农政府”，“这个定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①他提出了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在“四一二”政变前夕，当托洛茨基察觉到资产阶级叛变的危险时，便提出了组织苏维埃的问题。他说：“只有依苏维埃路线而凝结的阶级力量，可以进而适应革命的新阶段，而不去适应昨日遗传下来的组织和政治关系，犹如国民党。”^②托洛茨基注意到军队中潜伏的危险性，特别提到在军队中组织苏维埃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军之大部分未经训练，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在军官中占大优势，革命之明日因此有很大危险。我以为舍兵士代表与工人代表亲密结合外，别无他途可抵抗此种危险。”^③

“四一二”政变后，托洛茨基针对斯大林的“一切政权归国民党”的政策，提出了苏维埃与武汉政权并存的口号，强调苏维埃对组织工农武装的重要性。他说：“武装工农是极重大，同时也是极困难的任務”，“只有苏维埃才是能在事实上武装工农群众和领导武装群众的一种组织。”^④

马日事变后，托洛茨基认为，这次事变“是武汉‘左派’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叛变与破产”，^⑤“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领导路线，无论如何应该结束”，^⑥必须“立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组织城市乡村的工农兵苏维埃”，^⑦“经过苏维埃反

①②③④⑤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集第19页、21页、22页、49页、105页、137页。

⑦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集第138页。

对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军阀，高利贷者及豪绅等。”^①托洛茨基提出组织苏维埃，并经过苏维埃机关，进行“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工作”，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阶段。但是，托洛茨基重视工农武装，强调革命应该主要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三、分歧产生的原因

从上述分歧的内容可以看出，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种极端左倾的观点。斯大林则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右的错误。他们产生“左”的和右的错误的的原因，都是对中国的国情，主要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

托洛茨基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则是根本错误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却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否认封建经济在中国占优势。他还断言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并称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依据海关来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②因此，“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上，关税是根本的问题”。^③这是把中国的反帝斗争限制在仅仅是争取关税自主的范围之内。由于托洛茨基夸

^{①②③}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集第139页、62页、125页。

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降低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严重任务，因而夸大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托洛茨基完全抹煞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把民族资产阶级也作为革命对象，主张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要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这是他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则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说：“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主要形式”，^①帝国主义是支持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②“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③“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④这些理论，对于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斯大林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分析也是有错误的。如前所述，他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一面过分夸大，而对其妥协性的一面却认识不够。他更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会变化的，如蒋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后，其立场已开始转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但斯大林还认为他是中派，对他的篡权阴谋和反共活动，没有给予应有的揭露和还击。他对国民党性质的分析也是错误的。总之，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只团结，不斗争，以退让求团结。斯

①②③④《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0—261页。

大林也没有处理好两个联盟的关系。实际上，他是把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放在第一位，从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依靠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身上，而不去重点发展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这是斯大林产生右倾错误的根本原因。

深入研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将给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并正确实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其基本理论和策略都是错误的，说明他根本抛弃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要无产阶级丢掉统一战线这一战胜敌人的法宝，其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孤立无援而遭受失败。斯大林坚持国共合作，维护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但在实行当中却违背了其中的某些正确原则，也使革命受到了损失。总而言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至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实践中所犯的错误，也给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就是在正确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系统理论，并纯熟地指导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且，使这一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 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

杜 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中共党员陈翰笙为首的我国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利用合法身分，组织农村经济调查团，对我国农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配合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是党在白区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对中国农村作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以说明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这是当时革命形势和社会现实向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

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90%，自 1840 年以来，中国社会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就作出了这一判断。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再次分析了中国社会现状，重申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定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现阶段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农村中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由此，大会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两个决议。

当时，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毛泽东率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对中国农村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先后写出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论文和调查报告，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找到了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内逐步形成和推行了一条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路线。到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已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余省300多个县建立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虽然这些根据地从全国范围来看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地区，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被压迫的贫苦农民政治上翻了身，当了农村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较快得到了改善。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

然而，1930年年中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1930年5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会上通过的《土地暂行法》对土地分配、生产经营、土地买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给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带来很大损失。1932年，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提出了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继续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王明的左倾路线在根据地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它动摇了中农的土地所有权，把许多富裕中农划为富农，并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搅乱了阶级阵线，危害了社会秩序，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受到严重干扰。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左倾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排除干扰作出了艰巨的努力，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继续深入发展。

与革命根据地内土地革命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农村正面临破产的危机。由于封建地主地租剥削的日益加重，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赋税，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导致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输出减退，价格下跌；农村现金收入减少，金融枯竭；农村荒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收获量日趋下降等。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在1927年至1929年这3年，平均每年流亡东北的难民达16万以上。1929年至1932年，陕、豫、黔、甘、川、晋6省竟饿死农民达1620

万人之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农民暴动此伏彼起。

国民党政府面临农村经济破产局面，不得不提出一些措施试图加以挽回。例如在生产技术上，在一些地区设立所谓农业试验区，力求改进农业生产，改善农业园艺作物、农作物品种等；在经营上，1930年6月公布了《土地法》，鼓励土地所有者自营耕作经营，对出租土地规定租额；在金融上，到农村开展农贷和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活动；1930年又颁布了所谓《农会法》，企图将地主和贫苦农民组织在其“御用”农会中，以调和阶级矛盾，对抗农民的革命。这些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是地主、豪绅利益的代表者，因此，这些措施根本无法实施，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半途而废。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种政权、两种政治经济制度相对峙的形势下，围绕农村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30年，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的关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就涉及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托派严灵峰从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的命题出发，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不但推进了和扩大了中国经济中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断的发展，并且也推动了和加紧了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①因而，封建剥削不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者批驳了这种反动观点。吴黎平在《中国土地

^① 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载《动力》第1卷第2期。

问题》一文中指出：“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①“这种剥削关系，是建筑在土地关系之上的。土地问题一日不得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的解放，一日没有希望。所以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②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由于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泛，因此在农村社会性质方面，还存在不少遗留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排除中共党内左倾路线对农村土地革命的干扰，揭露国民党挽救农村经济破产措施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批驳托派文人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歪曲，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是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基本出发点。

(二)

1929年2月，陈翰笙应国民党元老、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邀请，任设在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兼社会学组组长。大规模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由此开始筹备。

主持和组织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对陈翰笙本人来说，也

^{①②}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载《新思潮》第5期。

是酝酿已久的一个愿望。

1925年，陈翰笙由李大钊、于树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陈翰笙在俄专教师格里涅维奇的指导下，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为《资本论》中的逻辑力量所折服，立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现状。

1927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约陈翰笙在住所长谈了一个通宵。蔡和森向陈翰笙详细介绍了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情况，并建议他注意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历史和现状。这引起了陈翰笙的极大兴趣。不久，陈翰笙赴莫斯科，他要求研究农民问题，被安排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

当时，担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部长的马季亚尔正在写《中国农村经济》一书。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也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式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农村。陈翰笙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陈翰笙当时不甚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材料来驳倒马季亚尔。陈翰笙由此感到，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无法正确认定革命的方针路线。因而他萌生了回国对中国社会作一番全面调查研究的动机。

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先后聘请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等一批有能力、有气魄、热心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这些青年普遍追求真理，倾向革命，有些在受聘前已是中共党员。

关于进行农村调查的重要性，陈翰笙曾有如下表述：“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①

那么，如何有选择地进行调查呢？陈翰笙指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够彻底地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于挽救中国今日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设计。”^②

确定研究重点在江南、河北、岭南三地进行实地调查，是陈翰笙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在对农村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初步考察和研究后作出的。在理论上，他们曾收集资料，分析过国内外各个时代、各种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在实地调查方面，他们首先通过调查黑龙江流

①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见《陈翰笙文集》第43页。

② 陈翰笙：《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见《陈翰笙文集》第73页。

域的农民与地主，初步揭示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点。1929年夏，陈翰笙又组团前往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了流亡“关外”的闯关东的难民。通过对难民的人数与结构、难民在故乡的状况、难民在途中、难民到东北后对东北农村影响的调查，从较广的范围内揭示了中国农村经济走向破产的现状，并为深入的实地调查积累了经验。

经过半年的筹备，陈翰笙决定大规模的调查先在长江流域的江南进行，而在江南又选定从他的家乡无锡开始。

陈翰笙所以把无锡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无锡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发达、民族资本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当时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的工商业虽然更发达，但大量的—是外国资本市场。而当时无锡属民族资本的新式工业，仅棉纱、缫丝、染织、铜铁机器翻砂、织袜、酿米、肥皂等7个行业的工厂就达193家，资本达984.1万元。在农业方面，灌溉机器的使用也较普遍，全县制造灌溉机器的工场有50多家，18匹马力的灌溉机器也已有2000多架。无锡耕地的零碎和田权复杂也是一种特征。农户每家耕田通常只有3亩至5亩，并且常常分散在四五处地方，每处田亩只有几分大小。农民要得到充分的土地来耕种差不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田权方面，有永业权、暂业权、永耕权、暂耕权、永属权、暂属权等10多种之多。借贷、押当、起会、放帐等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在无锡农村中具有雄厚的势力，十分之八九的农户差不多都负有债务。当时因为战事

和农村骚动的影响，乡村资本愈益趋向城市，农户借贷更加困难。

参加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的成员有 45 人。调查员大多数是生长在无锡或邻近各县的，其中 1/3 为国立北京大学、劳动大学、上海法政专门学校研究农业或社会经济的毕业生或肄业生；1/3 为该县高级中学的的肄业生；其余 1/3 为该县小学教员。大学生一般兼任各组指导，小学教员兼任各组交际，中学生则担任实际的调查。调查团在无锡城中设立总办事处，由文书、会计、交通、交际等职务构成，下设 4 个调查组，分别由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刘瑞生担任组长，组内又设交际、文书、会计、调查员等。

为了使调查达到预期的目的，调查团人员学习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部分章节，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农村的生产关系。对于调查的具体内容、方法等事先都经过详细的研究和讨论。

调查团从 1929 年 7 月至 10 月，对无锡县 22 个自然村的 1204 户农户进行了挨户调查，将每户情况记入一个预先设计的本子，其中包括人口、生产、消费、捐税、田产等等。22 个自然村挨户调查结束后，又调查了另外 55 个村的概况和 8 个市镇的工商业。

在无锡农村调查期间，国际著名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曾在陈翰笙的陪同下，专程到无锡作为期两周的采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目睹了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开始懂得在中国巨富与赤贫并存的原因。通过这次采访她开

始感到，不再对亚洲的社会与经济现实幼稚无知了。

继无锡农村调查之后，陈翰笙又主持组团于1930年5月至8月在河北保定进行农村经济调查。保定地处黄河流域，是自耕农最多、而工商业不十分发达的典型地区。这次调查在总结无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调查团由68人组成，办事处设在保定清苑城内。调查员分组状况和无锡相仿，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组长不兼调查员。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石凯福、项世澄、张锡昌等参加了这次调查。

由于保定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很大，而村户田权尚无甚分化，这和无锡不同，因此，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第一、二种各自独立，第三、四种为补充性质。调查团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中进行了详细调查。

无锡、保定两地的调查资料，由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等7人整理。在整理过程中，他们又对税捐、田租、币价以及工商业等与农村经济直接有关的情况，追溯到近20年来的演变，继续补充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写成了研究报告。报告用客观的材料表明在无锡和保定，阶级对立是尖锐的，压在贫苦农民头上的剥削形式主要有地租、高利贷、雇工、捐税和商业剥削。土地的占有极不平

衡，在无锡，占农户户数 5.7% 的地主，占有土地 40.5%；占户数 5.8% 的富农，占有土地 19.9%；中农占户数 20.4%，占土地 21.9%；而占户数 68.1% 的贫农，仅占有土地 17.7%。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地主据此对贫苦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同时发现无锡还有占地千亩以上的大地主。这就粉碎了“江南无封建”、“江南无地主”的谬论。

无锡、保定两地的农村经济调查均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的名义组团实施。但是，经过调查形成的研究报告触怒了中央研究院的一些人，他们怀疑此事系共产党所为，故将研究报告扣压不予发表。1933 年 4 月，社会科学研究所也被迫迁往南京。研究所迁到南京仅两个月，便发生了进步人士、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刺杀的严重事件。所内人员也纷纷遭到排挤，钱俊瑞被第一个开除，薛暮桥、张稼夫、张锡昌、王寅生、陈洪进等也先后被迫离开了研究所。既然实施农村调查的计划已无法继续进行，陈翰笙便向蔡元培提出辞职。蔡元培谅解陈翰笙的处境，同意辞职，但仍给他通讯研究员的身份，实际上支持他继续将农村调查工作做下去。

以陈翰笙为首的一批农村经济调查人员离开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并没有中止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在农村经济调查团的基础上，陈翰笙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农村调查和研究工作便在另一种条件下继续开展起来。

陈翰笙曾于1930年10月经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王昆仑介绍，受聘担任孙科在上海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特约研究员。这时陈翰笙便借这一名义提出了到广东进行农村调查的要求和计划，并于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实施。调查团由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派人组成，曾参加过河北、无锡农村调查的孙冶方、王寅生、薛暮桥等又成为这一调查团的成员。在调查团筹备工作期间，宋庆龄得知陈翰笙将主持去广东调查的消息后，十分支持，建议调查工作从孙中山先生的家乡中山县开始，还写了介绍信让陈翰笙去见中山县县长唐绍仪。宋庆龄的支持使调查工作十分顺利。在3个半月的时间内，调查团对中山、梅县、潮安、惠阳、顺德、台山、高要、广宁、英德、翁源、曲江、乐昌、茂名、廉江、合浦、灵山等16个县进行了系统调查，然后又用1个半月时间，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的1209户农户进行了挨户调查。同时又对广东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

在广东获得的调查资料表明，华南农业面临严重危机。这里，集团地主大于个体地主；田租、税捐和高利贷的压榨使广大贫苦农民无法生存，妇女耕作的普遍和男劳力的离乡使农业生产日趋退化。陈翰笙将广东调查的材料写成了《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于1934年出版。在英文本美国版的导言中，陈翰笙明确指出：“广东农村的贫困有它的地方特征，也还有帝国主义经济渗透农村的影响以及全国阶级矛盾增长的因素。……中国土地问题和农

业危机的实质在于彻底废除殖民主义剥削和封建主义剥削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成败。因为这两种剥削是中国农业上升到较高水平的根本障碍，消除障碍是绝对必要的。消除了障碍，全国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这种强烈要求不是地球上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①

以国民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名义组织的6省农村调查，也是陈翰笙等主持的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的组成部分。在当时农村经济急剧破产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遭到各方面的责难。于是在汪精卫提议下，于1933年4月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农村复兴”实质上是企图通过银行资本下乡，使流入城市找不到出路的大量资本重新流回农村，对广大农民进行高利盘剥。同时，汪精卫也想借此机会和宋子文争夺美国提供的一笔棉麦贷款。这当然无助于挽救农村经济的破产。农复会成立后，为装点门面，聘请了一批农业专家如邹秉文、邹树文、陈翰笙等担任委员。接着委请陈翰笙拟订规划，安排大规模农村调查。这对陈翰笙继续进行农村调查，扩大调查的范围不啻是个好机会。于是，陈翰笙先介绍农研会发起者孙晓村到农村复兴委员会担任专员，具体负责农村调查工作。王寅生、张锡昌、刘瑞生、勾适生等以前的农调人员也应聘参加了这一工作。这次调查按一省组织一个调查团，在了解该省一般情形的基

^① 转引自《世界历史》1985年第10期所载陈洪进文章《陈翰笙的史学思想》。

基础上，再把该省分成若干区，每区选择几个县，每县选择若干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分成若干组，每组承担一县，并吸收当地知识分子，再组成若干小组，分头调查。一个阶段工作完成后，就地核实材料，交流经验，然后转移地区，继续调查。第一个阶段对浙江、江苏、河南、陕西4省进行了调查，第二阶段又对云南、广西进行了调查。6省调查在更广的范围上将农村的阶级对立状况充分揭露了出来。高额地租、苛捐杂税、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和高利贷这4把刀子搁在贫苦农民脖子上，使之无法生存。这再次表明了封建土地制度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是中国农村经济濒于破产的根本原因。孙晓村等还专门将农村苛捐杂税的材料编成《全国苛捐杂税调查》一书，并利用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名义在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1935年度财政会议上散发，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震动。6省调查的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研究各国生活水平的书，以了解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是该学会会员，他和王寅生、张锡昌等决心借此机会对中国烟农进行调查，研究国际资本与烟草生产地的联系。同年底，陈翰笙和王寅生、张锡昌等带调查组到山东潍县、河南许昌、安徽门台子烟叶产区进行调查。由于这次调查和广东调查是同时进行的，陈翰笙又于1934年冬在第三国际成员左尔格的动员下，离开中国，去日本东京为第三国际做工作，因此，烟草区的大量工作由王寅生、张锡昌等在

1934年、1935年两年完成。多次调查，使王寅生、张锡昌积累了丰富的农村调查经验，他们带员深入农村，发掘出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充分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同中国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权，从军阀官僚到土豪劣绅，直至买办高利贷者相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社会现实。这次调查的新收获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烟的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上中农和富农不依靠借贷，也不热心种烟。这就证明了商品作物的推广并不一定有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以上是以陈翰笙为首的农村经济调查团进行农村调查的主要经过。同时，一些参加过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人员和后来农研会的会员还进行了不少其它方面的农村调查。例如，1932年钱俊瑞等再次到无锡和江阴、宜兴等地作关于农村经济急剧破产原因的调查；1933年薛暮桥、刘瑞生受聘在广西师专教书期间，利用暑假组织学生一起对广西的南宁、柳州、梧州、桂林等地进行的农村实地调查；1935年孙晓村主持的对长江流域长沙、南昌、芜湖、南京、无锡、杭州、绍兴等米市进行的调查。这些调查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农村经济破产的现状和原因。

大规模的农村经济调查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刻影响。1933年8月，陈翰笙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上宣读了他经过几年来调查实践所写的总结性论著《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向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1、贫农耕地不足，土地占有不均，耕地分散；2、

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地主富农残酷剥削农民，农业生产力低下且受到极大摧残。这篇揭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问题，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主要原因的论著，在与会者中引起了轰动，被公认为是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性著作。

(三)

以陈翰笙为首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组织的规模空前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在我党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以下几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这项调查为中国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出了科学论证，使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取得了胜利。

1930年正当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进行之时，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也方兴未艾。托派代表人物任曙、严灵峰等在《动力》杂志上发表文章，侈言：“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并主张“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以王学文、潘东周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在《新思潮》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从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观点，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但是，由于当时讨论涉及的范围广泛和经实地调查得

来的第一手资料不足，论战被主要局限在理论上，有时只是在一些名词概念上做文章，还难以对作为都市经济依存基础的广大农村经济作出深入分析，因此留下了许多不足和空白。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城市工商业凋敝，造成畸形的资金内流，更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破产。思想理论界对农村社会性质认识的差异进一步尖锐化。因而在1934年开展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一是农村经济的研究方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二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趋向问题。其实质就是是否承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并由此如何去认定农民运动在整个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因此，在整个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过程中，“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总的论争的核心。”^①

1935年1月26日，托派文人王宜昌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48期上发表了《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挑起了新一轮论战，并得到托派文人王景波、张志澄以及国民党改组派分子邓飞黄等的支持。他们认为，农村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农村社会性质是由耕畜、机械、器具以及化学肥料等“技术条件”或“技术分配”决定的。他们从海关的统计数字出发，断定由于农村机械、化学肥料的运用，表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力

^①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见《何干之文集》第7页。

的进步，中国农村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农村的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了。

托派文人的文章一发表，即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参加论争的主要有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他们都是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调查团的直接参加者，因此，在论战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以前论战者不曾具备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农村》上发表了一大批农村实地调查报告，通过这些报告反映的材料和数据，客观地不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另一方面，他们撰文批判王宜昌等托派文人的观点。在薛暮桥（即余霖）的《中国农业生产关系底检讨》、《介绍并批评王宜昌先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底论著》、孙冶方的《财政资本底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钱俊瑞的《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任务》等文章中，对托派理论进行了深入批判。这些文章认为，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当然，研究生产关系要结合研究生产力，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但如果象王宜昌主张的单纯研究生产力，就是“把生产力摒绝于人和人底社会关系之外，而把社会底发展归结到社会和自然底外在的矛盾”，^①这当然无法正确认识农村社会性质。薛、孙、钱等认为，决定农村社会性质的是生

^① 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载《中国农村》第1卷第11期。

产关系。而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钱俊瑞还利用参加农村调查的亲身体验指出：“至于我们，至今还是赞同将农村社会的组成分子，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办法。因为至今日为止，只有这种办法才能全面地显出社会全体的机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把握今日农村中生产关系的核心（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①于是，他们用无锡、保定、广东、广西等地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农村土地的占有和租佃关系，揭示出农村中广泛存在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剥削关系。同时，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剥削和掠夺，明确指出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力都是封建剥削关系下的产物，帝国主义为了攫取超额利润，自然要保持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通过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在国民党统治区取得了支配地位。从此以后，只要“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经济。”^②

（二）这次调查在农村调查的方法和内容上有所创新、突破，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次大规模的农村经济调查之前 14 年间，一些大学

① 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载《中国农村》第 1 卷第 6 期。

②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见《何干之文集》第 8 页。

或青年会等曾在全国 15 个省内作过 50 多次农村调查。但这些调查往往由美国教授主持，用调查美国农村的方法进行，甚至调查结果都由美国出版。例如 1922 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请马伦（C·B·Malone）、戴乐仁（J·B·Tayler）等教授指导 9 所大学 61 个学生分头调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 240 个村的经济情况；1921 年至 1925 年，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卜凯（J·L·Buok）指导学生在中国 7 省 17 处调查 2866 个农家情况。他们把调查的对象主要放在生产力方面，不去了解社会结构本身。在农户分类上，他们用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半佃农、雇农等的经营形式来划分，掩盖了农村中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又如他们常常忽略了中国农村中田亩的实际大小，使农户的数据不能得到正确的计算。因此，调查的结果大大失去了科学的价值。

以陈翰笙为首的农村经济调查团则不同，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调查的着重点放在农村的生产关系方面。在选择调查地区上，他们把重点放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三大农作区中最具代表性的无锡、保定、广东三地；在农户分类上，他们依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农户所处的经济地位来划分；他们注重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例如在农户占有土地的计算上，首先弄清该地田亩的差异等基本情况；在调查作风上，他们不辞劳苦，长时间深入到农村自然村的具体农户中，确保获得第一手资料。

大规模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大面积的挨户调查，这在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史上是一个创举。当时，社会上有些人曾对此的作用和价值提出怀疑，陈翰笙在1930年《关于保定调查的一些认识》一文中作了答复：“我们认为可靠的材料和合理的整理所给与我们有组织知识，可以使我们明确中国农村经济的根本关系，就是使我们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性。这种建筑在根本关系上的特性，二三十年内不是十分容易更改的。虽然调查的时期觉得远些，只要可靠的调查，便有科学的价值。……大概研究工作的成本总是贵的，科学不是偶然的，人员亦不是勉强的，与其草率地得了一些浮浅知识，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去认识一切根本关系。”^①

这次农村经济调查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之后，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奔赴晋西北地区作农村调查，在调查前，张闻天亦曾参考研究了陈翰笙主持下的农村经济调查团所用过的一些方法和资料。1943年7月，薛暮桥在《斗争生活》第24、25期合刊上发表了《怎样改进调查研究工作》一文，向中共山东分局各级党委干部介绍了搞好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方法和意义，推动了当地调查研究工作的展开。这篇重要文章可以说是薛暮桥参加农村经济调查的总结、体会。其中的大

^① 陈翰笙：《关于保定调查的一些认识》，载《农村周报》第36期。

量经验和材料都来源于他在 30 年代的农村调查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8 年春，在 20 多年前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起，在当年参加农村调查的薛暮桥、孙冶方等人的主持下，成立了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小组，对当年受调查的村庄再次进行挨户调查，形成了《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和《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报告通过对两地解放前后农村经济情况的逐项对比，揭示出中国农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化。

30 年代农村经济调查给历史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资料财富。由于这项调查目的明确、方法正确、材料可靠，在我国理论界、史学界公认是阐明解放前中国农村社会状况的典型材料。这些材料在各种现代史、中共党史、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学著作中被广泛引用。

(三) 通过这次农村调查，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专家。

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是由陈翰笙主持组织的。在调查过程中，陈翰笙本人弥补了以前在农村经济知识方面的不足，终于成为国际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农村经济专家。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受聘参加农村调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逐步成长起来。

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的发祥地是无锡。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组团调查的过程中，从工作方面考虑，先后较多地聘用

了无锡籍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王寅生、张锡昌、薛暮桥、刘瑞生、秦柳方、孙冶方、钱俊瑞、廖凯声、姜君辰等，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也就是深为一些外国学者诧异的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大都操一口江南无锡口音的重要原因。

在逐步扩大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队伍的基础上，为了把工作继续下去，1933年8月，陈翰笙、吴觉农、王寅生、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张稼夫等还共同发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团结全国从事、关心、支持农村经济调查和研究的同志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于1934年10月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国内外拥有联系的会员达500多人，成为中国当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研究团体。其后有不少会员奔赴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作，相当一批会员都是通过农村经济研究会走上革命道路的。

1950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但是这支由农村经济调查团到农村经济研究会逐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队伍中的同志已分布在新中国的不少重要岗位上，继续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贡献。其中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成为新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这次农村经济调查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白区工作创造了成功的经验。

农村经济调查的发起组织者陈翰笙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始终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党的事业和党在白区贯彻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陈翰笙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通过种种途径应聘进所，研究所内很快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1929年所内中共地下支部的负责人是李苍江，他名义上被聘为搞剪报工作。当时这个支部共有10多个党员，属潘汉年领导。1931年4月，李苍江调动工作，支部书记就由直接参加农村经济调查的张稼夫接任。在参加农村经济调查团的人员中，有不少早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的虽然大革命失败后一时中断了党的组织关系，但仍为党的路线而自觉工作，并在以后接上了组织关系。孙冶方1925年入党，在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受陈翰笙所聘参加了经济调查活动；薛暮桥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党组织，曾在杭州参与领导铁路工人运动；秦柳方1927年入党，参与领导过无锡农民运动；姜君辰则是1926年入团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1933年8月，在农村经济调查团人员基础上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内亦建立了党的支部。农研会是在党的“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开展工作的。1934年“文总”的书记是胡乔木，组织委员是邓洁，宣传委员是钱俊瑞，“文总”领导“农研会”，由钱俊瑞担任联系工作。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在国统区则进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笼

罩全国。但是，为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服务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仍然能顺利进行，并在以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取得胜利，这和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争取各方进步人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时，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蔡元培和总干事杨杏佛都是国民党元老、社会著名人士。农村经济调查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不仅使调查工作合法化，而且经费也有所保证。由于有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的招牌，又是在法租界，社会科学研究所一度成了一个安全区，不少共产党员在这里活动和隐蔽过。正如陈翰笙所说：“我当时做地下革命工作，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那样的知人善任和兼容并包，我简直没有立足之地。”^①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后，为了发表以前的调查结果，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理论，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当时，由于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党在上海的刊物，包括一批进步刊物几乎全部被禁止出版。但《中国农村》却例外。刊物请蔡元培题词，由国民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孙晓村和冯和法为刊物代表人。并通过陈翰笙、吴觉农等在国民党内的关系办理了刊物登记。该刊编辑部的通讯地址巧妙地标明为“南京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转”。因此，使人误以为它是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机关

^①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第50页。

报。刊物出版后，由于该刊宣传的内容触怒了国民党当局，曾两次被查禁，但经过吴觉农在上海方面做工作，孙晓村通过王昆仑在南京方面做工作，利用国民党内部关系和各派系间的矛盾，结果均获得了解禁。正如钱俊瑞在谈及这一段工作时所说：“农研会的工作主要由党外人士出面，同我们一起来搞，党员则担负实际工作，不大露面。这在当时上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使我们的工作便于开展。”^①这无疑是为党的白区工作创造了一条成功的经验。

^① 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第22页。

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完成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李 孝 民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在相持阶段“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这次全会批判并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同时决定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1938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知：“以胡服^①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统归中原局指导。”^②不久，又决定“陇海路南的部队及地方党，无论在指挥上、建制上一概归拨中原局管理。”^③上述决定为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下，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并肩战斗，同日伪军进行了生死搏斗。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和磨擦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经

① 即刘少奇。

②③ 《新四军文献》第117、118页。

过两年奋斗，胜利地完成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一复杂而又艰苦的战斗历程，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本文将就此作出介绍。

一、新四军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为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作了重要准备

（一）新四军的初步战略展开及其艰险处境

1938年，新四军4个支队在江南、江北艰难地进行战略展开，分别在皖南、苏南和皖中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实行划地为牢的限制政策，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3块东西不超过100公里，南北不超过50至60公里的狭小地区，还规定新四军“非有命令，不得越境活动”。因此，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只能在镇江、句容、溧水、高淳、南京、江宁、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南陵等11个县境内活动，第四支队也被限制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4个县境内活动。而且，以上地区均位于日伪统治中心的周围，故面临着复杂的三角斗争。加之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地向敌后发展，因此，新四军发展十分艰难，处境也十分危险。

（二）刘少奇进入中原敌后对津浦路西的部署

1939年1月，中央派刘少奇到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向中原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明确地提出党在华中的任务是深入战区和敌后，恢

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4月，因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刘少奇返回延安。这一次刘少奇到中原地区只有3个月。当时虽提出要深入战区和敌后，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向津浦路西发展的部署未能及时展开。因为“当时估计，敌人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会全部成为敌占区。因此，当时我们一方面布置武汉附近及豫东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而没有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津浦路、淮南路以东广大敌后地区”。^①在此后“虽然李先念已经初步发展了武汉附近的游击战争，彭雪枫、吴芝圃发展了豫东的游击战争，而津浦路、淮南路以东仍是没有大注意开展游击战争”。^②

（三）周恩来对新四军发展方向和方针的确定

1939年2月，负责领导长江以南党的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统一战线工作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莅临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督促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切实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3月，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指出“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

^{①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5页。

负。”“中心的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①周恩来强调指出，这就是新四军所处的环境，要认识这个环境以及肩负的重要任务。据此，周恩来提出了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确定发展方向的3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根据上述原则，周恩来征得项英同意，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对此重大战略决策，项英虽然表面上没有反对，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仍然坚持其固守皖南、幻想南进的错误主张。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则立即执行了北上东进的方针。

（四）新四军各部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

1939年2月，陈毅令第一支队二团在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游击队配合下，向北挺进扬中，消灭了盘踞该地的伪军1个团，并以一部进至扬州以东的大桥地区。同时，陈毅对江北泰州的国民党军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二李”对我军进入江北的谅解和初步合作。到4月，我军就控制了扬中和大桥沿江地区，成功地建立了北渡的“跳板”和“桥头堡”。5月，陈毅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同时顶住了项英的压力，果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2页。

断地派六团叶飞部向东挺进，至无锡、江阴，与当地游击队合编，沿用其“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即“江抗”）的番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该部于5月下旬首战黄土塘告捷，毙伤敌近百人；接着夜袭浒墅关，造成宁沪铁路停车3天；尔后又夜袭虹桥机场，直逼上海近郊，连战皆胜，震惊中外，使日军受到极大威胁。此后“江抗”与当地人民武装相配合，共同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游击根据地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山）游击根据地。夏季，第一、二支队又开辟了太（湖）滬（湖）地区。东进的胜利，发展了江南抗日阵地，扩大了部队，改善了武器装备，提高了共产党、新四军的声望。11月，陈毅令第二支队四团的陶勇率领该团一部，帮助李明扬运送弹药北渡长江。该部渡江后即与挺进纵队一部合并为新四军苏皖支队，活动于扬州以西的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不久，叶飞率领老六团大部渡江与挺进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以叶飞、管文蔚分任正、副司令。至此，新四军已有两支主力部队进入江北，形成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北上东进的有利态势。11月上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指挥第一、第二支队，挺进纵队，“江抗”和苏南地方武装，加强了抗日斗争的领导。

在江北，由于项英错误主张的影响，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缓慢。对此，中共中央于1939年4月21日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

枢纽，关系抗战前途甚大。”^①并要求项英利用蒋介石批准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指在皖东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机会作发展的布置。中央还具体要求：“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和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②中央还认为上述任务“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挺）、陈（毅）、袁（国平）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③针对项英的犹豫和放不开手脚，中央强调指出：“新四军在江南者现尚仅万余人，而发展前途又受大限制，许多大员仅指挥数千人，实不符合其才能之发展的方针，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形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而项英对中央上述指示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主张：江北“在军事上，向北、向东发展，以津浦路为中心积极行动，控制该路，另一部控制淮南路”。“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④针对项英这一错误主张，4月24日，中央再电东南局、中原局，严肃地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

①②③《新四军文献》第126页。

④《新四军文献》第397页。

务。因此，固然不应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一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主要努力去做。”军事上的目的则是在“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的战斗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因控制两条铁路，对我们工作无大帮助，也控制不了）。”^①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长叶挺到庐江，着手成立江北指挥部，该指挥部以张云逸兼任指挥，罗炳辉任副指挥，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为贯彻执行中央向皖东发展的一系列指示，还更换了第四支队的领导，中央“派徐海东同志去皖东整理四支队，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②江北部队经过整编整训，即奔赴津浦路两侧与日伪军作战。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至12月中旬，第四支队又粉碎了日军2000余人的大“扫荡”，大大发展了皖东敌后抗日斗争，进一步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

在皖南，由于项英强调所谓精兵主义，限制了部队的发展。但是，第三支队英勇作战，粉碎了日军为确保长江交通，对皖南铜陵、繁昌一带进行的1000人到3000人的反复“扫荡”，同日军5次争夺繁昌县城，保卫了繁昌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疯狂的气焰，巩固了皖南的阵地。

①②《新四军文献》第399、401页。

在豫皖苏边，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于1939年1月在亳县以北歼灭伪军300余人，2月在杞县瓦岗又击退敌2000余人的进攻。5月，进军淮上地区（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蒙凤公路以东地区），开展蚌埠、凤台、蒙城、怀远地区的游击战争。11月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共9个团，1.2万余人，初步打开了豫皖苏边的抗战局面。

在皖东北，1939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苏皖边地区，6月该支队在灵璧以北张家集击退日军千余人进攻后，主力进至津浦路西。与此同时，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初步开辟了邳（县）铜（山）睢（宁）地区。7月，中共苏皖省委书记张爱萍率部分干部进入皖东北，与上述两个支队联系，至此，我党我军在皖东取得了有利阵地。

（五）李先念部开辟鄂豫边区

在鄂豫边，1939年初，中共中央、中原局委派李先念为司令员，率领鄂豫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6月19日，刘少奇指示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下的新四军部队。鄂中党组织决定整编和统一豫南和鄂中的武装，组成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深入敌后，广泛出击。8月，在大别山北麓罗山朱堂店，歼灭日军近百，首战告捷。10月，又严惩了“扫荡”京山新街镇的日伪军300余人。不久，将云梦、孝感、应城我军控制区域连成一片，确立了新四军

在鄂中敌后的抗战阵地。1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鄂东、豫南、鄂中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新的鄂豫边区党委，3个地区党领导的武装组成鄂豫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

这样，新四军各部在1939年这一年，先后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深入到敌后，独立自主地投入到民族抗战中去，在有力打击日伪军的同时，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5个省，长江、黄河、淮河、汉水之间和津浦铁路两侧的广大区域内完成了战略展开，从而为我党我军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完成作了重要准备。

二、确定苏北为战略发展方向，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从北、西、南三面向苏北发展，为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的完成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

（一）刘少奇开辟苏北以发展华中的战略规划

1939年秋，中共中央判断日军已经没有向西发动战略进攻的趋势，华中又急待加强统一领导，因此，决定中原局进入皖东。9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一批军政干部由延安出发到河南，10月中旬东进苏皖边地区，12月初到达淮南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此时，正值国内形势逆转，投降、倒退、分裂的危险空前严重。1939年3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时决定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到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时已演变成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在华中，由于国民党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与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积极执行军事

限共政策，以“冬季反攻”为名义，命令所部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压迫新四军。因而，我党在华中及皖南薄弱的武装力量有被亲日派反共派包围、孤立和击溃的危险。

面对严峻的形势，刘少奇一方面大力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使广大干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另一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敌友我的情况，制定战略规划，确定战略发展方向，以利于迅速改变各小块根据地分散、孤立的局面，加速建立我党掌握的大块抗日根据地，从而加快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为提高华中干部的认识，将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路线上来，从1939年12月至次年2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3次中原局会议，在领导骨干中明确了：大力向东发展，完成中央提出的江北新四军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一直发展到海边为止的任务；同时，大力加强根据地建设和发展人民武装，在广大干部思想上明确“打日本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政权是人民的，只要人民承认，我们的政权就能存在”，“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发展武装，多多益善”。从而，消除了项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右倾错误的影响。同时，在干部中树立了坚决反磨擦的思想，敢于争取反磨擦胜利，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和进攻。从而，纠正了对顽固派的怯弱心理，精神上得到解放。

为了确定我军在华中的战略发展方向，刘少奇在进入华中途中，就向曾经在苏北、皖北工作过的同志询问和了

解情况，酝酿成向远离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淮北、豫东、淮南、皖中及鄂豫皖地区）的苏北敌后发展的方案。1939年11月初，刘少奇到达皖北涡阳县新兴集，对彭雪枫部进行了考察了解，认为彭雪枫部基干部队7个团7000余人，已开始走向正规化，部队的各种制度与组织已经建立；部队情绪、纪律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与群众的关系也好，具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及艰苦奋斗作风，已具有老部队的各种优点，而且常能作战，已获得许多胜利。刘少奇认为“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无须军部及延安供给。只要有干部，在年内扩大雪枫部两万人至三万人完全可能做到。”^① 11月11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抽调彭雪枫部的主力部队和豫皖苏省委干部，在一二个月后过津浦路东发展，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9日中央复电刘少奇、项英等，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并指示：“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② 并强调新四军军部为此目的应该指导江北指挥部张云逸等同志，使他们明确了解上述任务。

12月上旬，刘少奇又在详细研究了调查了解到的实

① 《新四军文献》第497页。

② 《新四军文献》第133页。

况,并在全面分析敌友我力量对比及其消长趋向的基础上,经与邓子恢、张云逸商量,于19日正式向中央提出了以苏北为战略发展方向发展华中的建议。刘少奇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建立相当完满的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时机,目前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从整个华中分析,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汉口附近汉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的地区(已令他在半年内发展至两万人枪);豫东即彭雪枫部活动地区(尚有发展三四万人枪的可能);江苏北部地区,我无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去活动,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大约韩德勤的基本地区是在淮阴、盐城以南”,“在淮阴以北韩德勤之部队似不多,而在直贯苏北的两条公路上又有敌人”。加之“山东纵队已到皖东北”,“灵璧、泗县、宿县及洪泽湖边,已建立相当基础”。因此,刘少奇提出苏北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那么,从何处向苏北发展呢?刘少奇在进入皖东时就认为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观念甚微弱。因而,刘少奇在向中央的建议中,提出目前依靠皖东四、五支队活动地区向苏北发展有以下的困难:(1)韩德勤已有6个团在盱眙、天长一带堵滞我们,如我东进,韩部亦可向东跟随;(2)安徽李品仙在皖东限制、压迫我们,以致我不能在皖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与后方;(3)如四、五支队扫敌东进至苏北,则后方难联络,皖东即会失去,苏北地区不熟,不一定能立足,太冒险。因此,刘少奇认为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

枫、张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并可与山东联系。刘少奇还在向中央建议中提出了向苏北发展的具体部署：

(1) 以江北第七、第八两个团和无为游击队（均合法的）在皖东津浦路两侧活动，江南六团只到扬州、六合活动，任务是准备与加强皖东原来基础，与江南、淮北建立联系。

(2) 以江北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五团渡过淮河，在皖东北整理后配合彭雪枫部向苏北大发展。

(3) 在淮阴以北发展，立定脚根后，即可向南发展，即可配合七、八两团及江南部队向东、北发展。同时，刘少奇与徐海东、罗炳辉、邓子恢等同志率中原局及江北指挥部一部分干部去淮北。反映在刘少奇上述建议中的战略部署，在政治上也是一个有理有利的方案。由于豫皖苏边和皖东，都面对日伪而背靠顽军，向西将受到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的限制，也容易引起中间派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苏北大部分地区在日军占领之下，韩德勤身兼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及江苏省主席二任于一身，却龟缩在兴化，不抗日以守土保民，且与日伪妥协共处，欺压人民，排斥异己。因此我向苏北敌后挺进有理有利。在军事上，先集中主力于淮北，建立前进基地，然后向南，配合皖东及江北部队向东、向北发展，形成我军从3个方向挺进苏北的态势，这不但有利于我党我军既定战略目的之实现，也有利于我军的进一步发展。

（二）项英的非议及中央对其错误倾向的批评

但是，刘少奇关于向苏北发展的建议，却遭到项英的

非议。12月22日项英致电刘少奇和中央，提出整个部署应从江南、江北全局出发，不能只从局部考虑，并要中央和军委对新四军应有全部计划，不能作“左”的布置。23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说：“在将来任何情况上，是以独立开展南方局面，以与北方配合，这在政治上策略上均应如此。”针对项英上述意见，中共中央于27日复电刘少奇和项英说：“在华中方面，以淮北之皖苏地区为发展方向，从四、五支队酌派部队过淮河是很对的，中原局宜靠近彭雪枫部；在淮河以南地区则在巩固原有武装及阵地外，绝不放松一切机会去求发展。因此，应从江南酌派部队及干部去增强之，以便胡服能从四、五支队抽四个团过淮河。”同时还指出“在江南方面处境是困难的”，要求“立即在部队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提高警惕性，以防局部的突然事变”；“军部各机关缩减非战斗员的成分，加强其防御能力”；“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东南局地方工作应着重皖、浙、赣三省边区”。中央特别针对项英强调指出：“这样，才能使在将来极不利局面下，有江北及皖、浙、赣三省边界的两条退路。你们应坚决执行这一计划。”针对项英所谓不能作“左”的布置等语，中央则详尽地指示了应付磨擦的方针，说明淮北、淮南应采取不同办法，并恳切地指出：“在江南方面，过去采取慎重态度是必要的，但不应向战区多作报告，不应向他们经常请示，许多问题应相应不理。如遇武装冲突，有利时则反

击之，不利时则应转移被攻击之部队至有利地区，再讲对付。”^① 尽管中央电令如此明确，项英却仍然固执己见，而且继续发展其错误主张。1940年1月初，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项英说：“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因此，南方应有一支军队坚持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因而项英不同意由皖南派部队北上。面对中央的明确电令，这次会议只是决定：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的同时，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1月14日项英将上述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同时，电告刘少奇“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一切工作须按全国情形来布置，不能限一方面，也不能各自打算，你的指示确难遵行。”拒绝了得到中央同意的、刘少奇的抽调江南主力部队向北发展的要求。

针对项英坚持上述错误主张的作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0年1月18日召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东南局的发展方针，并决定向东南局和中原局发电重申新四军的发展方针。19日王稼祥为中央起草了这份电报，并于当日发给项英并转东南局各同志。电文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来到新四军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

^① 《新四军文献》第139至140页。

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两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中央还再次向项英指出了反磨擦的意义，说“在全国未公开投降以前，即现在的抗日反共局面继续下去的形势下面，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发展当然会引起磨擦，但只有发展力量，给磨擦者以反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坚持阵地和克服投降危险。”中央指出：“皖南既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可以同意，而由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因此不同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同时明确要求“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①中央上述一系列指示，不仅充分肯定了刘少奇关于以苏北为战略发展方向以发展华中的建议，而且明确批评了项英向南发展以及对反磨擦斗争的右倾情绪，同时严肃地告诫项英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但是项英仍未及时醒悟。

（三）在刘少奇主持下皖东和皖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在发展苏北的战略部署即将付诸实施之际，华中地区

^① 《新四军文献》第141页。

风云突变。首先，1939年底，日军以2000兵力对皖东进行“扫荡”，虽然被新四军第四支队粉碎，取得了包括著名的周家岗战斗（毙伤俘日军160余名）在内的江北反“扫荡”的胜利，但江北的4个团却因此而不能北渡淮河。其次，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将磨擦中心移到华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于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国民党中央顽固势力更指示安徽李品仙和江苏韩德勤，要他们将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联系。预期于六月中旬，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并具体要求李品仙部“进出于津浦淮南两路中间地区，驱逐该地区内之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推进至洪泽湖以南地区”。^①在李、韩两部加紧反共磨擦急欲把新四军赶出皖东抗日阵地之际，坚持皖东阵地便成为我党我军当务之急。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不得不审时度势，把向苏北发展的出发点重新改放在皖东，在反顽斗争中，坚持和建设皖东根据地，使其成为向苏北发展的坚强基地。1940年3月，桂系李品仙部及蒋介石嫡系韩德勤部及反共地方武装，先后向我津浦路西、路东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企图东西夹击，将新四军消灭或赶出皖东。遵照中央在华中武装磨擦中的军事策略，即“以淮河、淮

^① 见国民政府军令部《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转引自《叶飞回忆录》第149页。

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系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于3月上旬集中主力于路西阻止桂系部队的进攻，然后再挥戈东向击破韩德勤部对路东的进攻。3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在第八、第十团以及陶勇的苏皖支队配合下，在定远、大桥等地，经9天反磨擦自卫战斗，歼灭反共地方武装国民党军第十二游击纵队颜仁毅部的大部和第十游击纵队李本一部的小部共2000余人，攻克了定远县城，粉碎了桂系李品仙部企图摧毁我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计划。3月20日夜，韩德勤部趁我第五支队赴路西作战，路东地区空虚之机，集中其主力独立第六旅等部共8个团，约1万余人，进攻我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地半塔集，我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千余人坚守待援。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鉴此情况，决定我主力迅速移往路东，首先稳定并巩固路东。江南指挥部领导人陈毅于22日获悉韩德勤部进攻半塔集后，也立即电令叶飞率挺进纵队主力从吴家桥驻地火速日夜兼程前往增援。叶飞率部西渡运河，与路西赶来增援的陶勇苏皖支队，以及回援的第五支队主力，东西夹击，前后经历11天英勇奋战，终于粉碎了韩德勤部的猖狂进攻，并乘胜攻占盱眙城。半塔集之役大大加强了我反顽斗争的胜利信心和勇气，锻炼了部队战斗力，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验。4月10日，刘少奇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韩部

溃退如此之快，主要是政治原因，他想伐无名，不能提出讨伐新四军与共产党口号，干部士兵均不愿打，屡次叫部队冲锋亦无人来冲”。同时，刘少奇还对形势作出了如下估计：“韩德勤部在我全体官兵英勇反攻之下，已全部退过淮河北岸，我已扼守淮河各要点，本地顽固武装已大部退走，淮南运河以西、津浦路东之顽固武装已不多，再加肃清，即冲开了建立民主根据地之大道。”^①

在反顽斗争取得胜利以后，皖东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首先，在党政建设方面，将安徽省委撤销，分别成立了津浦路东、路西两个省委和联防办事处、联防司令部，继而先后委派了定远、滁县、凤阳、全椒、和县、嘉山、来安、天长、盱眙、六合等县的县长，并陆续成立区、乡政府和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吸收开明士绅和部分原在旧政府工作的进步分子参加各级政权的工作。第二，在发动群众方面，组织农会，大搞减租减息运动，根据皖东具体情况，提出“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在劳动人民的政治优势得以树立，群众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之后，农、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抗日自卫队等人民武装更是迅速发展起来，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扬。第三，在军事建设方面，刘少奇提出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方针，主力以营为单位派往各县扩充部队，帮助建立地方

^① 《新四军文献》第427页。

武装，成立县大队、区中队。此外，根据地的民主政权还制订并公布了惩治汉奸以及财贸税收、征收公粮等法令，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等。经过几个月努力，皖东成为华中敌后第一块具有相当规模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路西、路东的部队发展到 2.5 万余人，政权区域内的人口也超过 200 万人。我党已成功地建立起向苏北发展的坚强基地。

在皖东根据地建设的同时，刘少奇也十分关注皖东北根据地的工作。1939 年 12 月，陇海路南、津浦路东皖东北及苏北地区“经中央划归中原局管理，且指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党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① 1940 年 3 月 28 日，刘少奇就建立皖东北根据地问题给张爱萍等写了一封十分详尽的信。信中说：“目前，苏皖地区党与八路军、新四军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之苏皖地区）成为我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汉奸的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刘少奇在肯定皖东北领导同志执行党的总路线，已经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针对建立政权、发展武装、打击顽固派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领导同盟者等不够坚决的缺点，强调指出：“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之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半年内须达到三万人枪以上，并须注意部队的巩

^① 《新四军文献》第 522 页。

固与整训。必须坚决的建立政权，派遣最好的干部（如省委、县委的委员等）去作县长、区长。必须建立广大的自卫军。必须建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救国会，工人、青年、妇女等救国会。必须发展党，建立强大的有领导能力的党部。必须实行各种进步的抗日政策，以便能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决部队的给养及斗争中的各种任务。”^① 本着这一精神，苏皖区党委从多方面切实努力，迅速树立起我党我军的优势。4月底，苏皖区党委将我党掌握的安徽省第六专署武装编入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此前，皖东北军政促进委员会还召开了各界代表大会，确定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基本政策，誓与日伪斗争到底。5月初，刘少奇为加快皖东北建设，部署东进任务，到第四总队驻地洪泽湖西半城地区检查工作。日伪军得知后向该地奔袭“扫荡”，我军迅速转移，使敌扑空。但是，韩德勤却乘机集中6个团进犯苏皖边金锁镇等地。在此紧急情况下，刘少奇指挥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苏鲁豫支队、第四总队一部进行自卫反击，经13天战斗，将韩德勤部逐回泗阳、宿迁县境。从而，隔断了苏皖两省顽固派的联系，使韩德勤更为孤立。皖东、皖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稳定，建立了从北、从西两面进入苏北的前进阵地，也打开了华中新四军同华北八路军联系的通道。

^① 《新四军文献》第523页。

(四) 刘少奇对打击韩德勤的设想

从南面向苏北的发展的任务，在刘少奇的战略部署中，是由江南六团即叶飞团担负的。半塔集反顽自卫战以后，刘少奇专门同奉陈毅之命前来增援的叶飞谈话，详尽地分析了华中的局势，提出了解决苏北问题、把新四军和八路军打成一片、建立华中根据地的问题。刘少奇说：国民党“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他们在那里光收税，不抗日，也不让你新四军进来抗日”。“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我们不能主动去打韩德勤。我们只能进行斗争，否则我们在政治上被动，得不到全国各界的同情”。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了一个反动的愚蠢的政策，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的重心是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起而自卫，消灭他们”。“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因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蚌自彼开，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①刘少奇这次谈话，就是要叶飞率部担负在韩德勤部攻击我军时，坚守

^① 《叶飞回忆录》第158至159页。

阵地反击韩之进犯的任务。叶飞不畏艰险地痛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五）陈毅坚持苏南和发展苏北的筹划

身为江南指挥部总指挥的陈毅，此时也在进一步筹划向苏北发展。1940年1月，他指派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第四团渡江北上，向吴家桥地区周围发展。陶勇也率部同第五支队在六合会师，粉碎了日伪军2000人对津浦路的“扫荡”，控制了天（长）扬（州）公路。陈毅则第二次进入泰州，同李明扬进一步商谈合作。“二李”对陈毅待以上宾之礼，并商定时机助我东进。这些都为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陈毅担负着坚持苏南、江南和发展苏北的两项重任。由于江南指挥部主力陶勇、叶飞两部先后增援定远和半塔集的反顽自卫战，以后为了巩固战果，又被刘少奇暂留皖东。挺纵只有两个营由管文蔚率领留在吴家桥地区。而负责江南全面工作的项英，株守皖南，不仅不能增援苏南部队，而且多次要调回已在江北的陶勇、叶飞两部，以求与顽固派“缓和”。这就使陈毅深感缺乏战略突击力量，以致东进苏北的宏图难以实现。

1940年3月，顾祝同调集5个师、1个旅以及18个保安团的兵力，部署在皖南贵池、青阳、绩溪、宁国、宣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同时，还加强了苏南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一线的兵力，企图切断皖南和苏南的联系，造成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和相机“进剿”位于苏南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的态势。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我不论

是坚持苏南，还是发展苏北，都必须集中兵力，加强领导，以击退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磨擦和进攻。为此，陈毅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请求中共中央调回叶飞部，以发展苏北。另一方面，陈毅多次向中央和东南局的项英建议，将新四军军部东移，以加强领导，集中兵力，坚持苏南。4月21日，陈毅、粟裕（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罗忠毅（江南指挥部参谋长）、邓振询（中共苏皖区委书记）等又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坚持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意义，我们历来同意军分会之主张。目前弱点是在兵力不足，饷不够，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作可以开展局面”；“苏南为解决人、枪、款良好地区。皖南则地形好，为向苏浙赣发展战略要点。但是，目前坚持力量不够，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在苏南，两年来因领导力弱未能充分发展，若皖南部队东移，三个月即可发展力量一倍至两倍，即发生事变亦可胜利击退顽固势力。”^①4月28日，陈毅再次致电毛泽东、王稼祥，进一步陈述“新四军江南部队皖南苏南力量相等，合则两利，分则两面孤单，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军部东移，领导力量增强，干部加多，且可控制主力在手中以应付事变，并提高质量，故为比较稳当政策，请裁决指遵。”^②

① 《新四军文献》第157页。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第16册第212页。

陈毅在东南局领导下，身为东南局成员之一，因此，在向中央、向项英的建议中，反复地、多方面地说明军部东移，集中力量，以坚持苏南和发展苏南，其中虽然也涉及南进问题，但由于此前中央曾谈到皖南军部在极不利局面下有两路退路，即江北及皖浙赣三省边界（1939年12月27日电，1940年1月19日电），因此必须在南进问题上表示一下态度，但这并不表明陈毅也有南进的主张。同时，陈毅在坚持苏南、发展苏南的建议中，是与发展苏北相联系的。在4月21日致中央电中，陈毅还认为“苏南共二十六个县，淞沪地区现为伪军区域，有我地方党，人枪款均可充分解决，增两个团即可于两个月内发展一万五千，为将来淞沪杭公路向浙西发展的力量，另一方面可渡江至（苏北）海门、启东打击韩德勤。”陈毅之将新四军军部东移，集中兵力以坚持苏南和应付事变的建议，虽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但是项英仍以种种借口不予采纳。早在4月9日，项英就致电毛泽东说：“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注：即陈毅为司令的第一支队）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①此后，项英就醉心于同国民党顾祝同的谈判，对陈毅的多次建议更不认真对待，只幻想与顾祝同“缓和”以“稳定江南”。因此，陈毅所致力的集中兵力和加强领导的努力，直到4月底均无

^① 《新四军文献》第153页。

结果。

(六) 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陈毅向苏北突破

5月4日以后，形势却有了根本好转。首先，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向东南局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这一指示针对项英强调江南特殊而不敢发展，借口统一战线而不敢斗争的错误，进行了未指名的批评。并强调：“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五四指示”是在发展华中的关键时刻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指示，它极为严肃地批评了项英的错误，极为有力地支持了执行中央正确路线、方针的同志，大大缩小了项英错误的影响，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陈毅立即在苏南布置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召集团、县以上负责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但是，项英却对五四指示不满，接连3次致电中央要求将他撤职。

在五四指示下达的同一天，中央还电告项英、陈毅：中央“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移至苏南”，同时指示“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

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①

也是5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刘少奇，称：“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②

中共中央、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指示，解决了陈毅期望解决的迫切问题，极大地坚定了陈毅实现北渡而后东进以突破苏北战略计划的决心。但是，坚持苏南的困难，仍然使陈毅十分为难。5月17日，陈毅向中央报告：顾祝同、冷欣在南陵、当涂、高淳、宜兴一线计驻4个师16个团，现又从江西调1个师来广德，其企图对我之意已属显然。故要求调回陶勇和管文蔚、叶飞两个团至苏南，以应付顽固派之进攻。19日陈毅向中央报告有关苏南工作的布置时，再次提出“目前困难，在全部兵力调第一线打网式散开发展（非如此不能陆续膨胀），手边却无兵力。因此，我们指挥部溧阳县直属队千余，对于局变不能应付，若调集两团以上兵力在手中，则第一线又不能散开大量争取。我们一

① 《新四军文献》第163页。

② 《叶飞回忆录》第163页。

面缩小后方，加强苏南游击战争，一面以游击方式应付顽方。目前在战略上亦不宜轻易北撤让出溧阳北部致失掉联络。无论向南、向北、向东，我们要求中央批准将苏北张、叶两部仍以南调一部应急，同时请中央即电项英东移，宜饬大行李及重要资材东进，不要再迟缓，要根本放弃挺进皖东南的下策（此节请中央考虑速复）。”^① 5月26日中央复电项英、陈毅：“苏北管（文蔚）、叶（飞）、张（道庸——即陶勇）、梁（灵光）四部中主力，仍应留在苏北发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具体布置由项、陈决定”；“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② 6月初，顽固派“进剿”日紧。6月10日，陈毅得悉冷欣部第六十三师开高淳，与第四十师形成对我军之大包围，并公开进行反新四军宣传，遂紧急向中央报告，称：江南指挥部决定率部北移溧水地区，逐渐转入敌后游击。6月15日，陈毅在率部北移途中，闻知顽固派将在江北郭村同我磨擦，又急电中央：“苏南冷欣挑衅甚紧，如应付不好，必武力相加”；“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③ 陈毅在军情紧急的形势下，果断地决定向苏北突破，不仅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包围消灭我苏南部队的阴谋，加快了我发展苏北的步伐，而且仍然

① 《新四军文献》第312页。

② 《新四军文献》第313页。

③ 《抗日战争时事探索》第45页。

坚持了苏南的阵地。7月上旬，留在苏南的一部分部队，在茅山地区重新组织了江南指挥部，以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指挥，下辖4个团，约3000人，继续坚持抗日斗争。这充分表现了陈毅深刻地领会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坚决地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正确路线、方针，从实际出发，为全局着想，善于克服困难，化不利险境为顺利坦途的卓越才能。

至此，华中地区我军以苏北为战略发展方向，自三面包围苏北的态势基本形成，完成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有利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三、在八路军南下部队、新四军江北部队的战略配合下，陈毅率部与韩德勤部决战于黄桥，粉碎顽固派的进攻，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取得发展华中的决定性胜利

（一）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战略部署

调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以发展华中，这一部署最早在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中就已提出。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时也曾要求中央调八路军一部南下支援华中。对此，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14日电告刘少奇“八路军现尚不能立刻派部队到华中，但在准备中”。但中央发此电后的两天，毛泽东即指示彭德怀：“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正派队向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困难了。故提议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

打成一片。”^①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增援华中。同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援助新四军的决定，具体部署由朱德、彭德怀作决定。10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达指示，赋予“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立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并具体要求以4万至5万人的兵力，分三期到达皖东、淮河附近和扬州附近。此后，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1万余人即开始由苏鲁边南下，其一部当年5月即到达皖东北，并参加了由刘少奇指挥的皖东北的反顽战斗。接着，第三四四旅在刘震率领下，也过黄河，越陇海路南下，于6月20日到达新兴集与彭雪枫部会合。

在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从战略上配合新四军的形势下，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江北新四军先后取得了定远和半塔集反顽自卫战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阵地，并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将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切断以分割消灭的阴谋。但是，“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②他想将新四军调至黄河以北，划黄河以北给我，把我送入敌人手上，堵塞归路，将我军困死、饿

① 《新四军文献》第675页。

② 《新四军文献》第683页。

死。针对蒋介石的这一企图，毛泽东于5月5日致电彭德怀，指出“第一，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全国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蚌自彼开，故我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兵力南下。”^①毛泽东还具体指示，八路军第三四四旅、苏鲁豫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第一步以盐城、宝应、蚌埠、蒙城为界。如韩、李来攻，则消灭之；如韩、李愿让该线以北为我防区，则暂时妥协之。”“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②并责成第三四四旅、苏鲁豫支队、新四军第四、五、六支队及陈毅之叶飞部，“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③毛泽东上述电示被称为五五电示，它进一步阐明了发展苏北与发展华中的关系，确定了发展华中的领导核心，也进一步划定了实现发展华中战略任务时有待

①②《新四军文献》第683—684页。

③《新四军文献》第675页。

发展的广大地域。五五电示还强调：不论是同日本占领军的斗争，还是反顽斗争和应付突然事变，华北我军都必须进入华中而打成一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作出的发展华中、巩固华北的具体指示，就再次明确了我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组织措施。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发展华中的领导，提高全党对发展华中重要意义的认识，动员全党力量加快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它对提高全党警惕性，做好防止突然事变的准备，准备打退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制止其对日本的妥协、投降活动，坚持团结抗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刘少奇开辟苏北的新部署

在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以及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的有利形势下，我向苏北发展的条件日渐成熟。1940年6月6日，刘少奇对发展华中作出了具体部署。刘少奇认为，蒋介石已令3个师增援李品仙，估计会向皖东新四军四、五支队进攻，暂时不会到皖北。我四、五支队为保持皖东阵地，恐不能抽兵向东发展。韩德勤决心反我军，如到运河以东活动，必须与韩决战。叶飞部与韩部的武装冲突很难推延，我必须开向东增援叶飞。据此，刘少奇确定“目前我应首先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大体上解决苏北之任务，以后集中主力向西解决皖东、皖

东北问题。”^① 为此，可具体部署为：八路军南下部队的大部，即第三四四旅两个团、苏鲁豫支队的两个团共4个团进至津浦路皖东北地区，配合陇海南进支队“向苏北发展，首先占领盐城、宝应以南地区，并在必要时配合叶飞支队及四、五支队向盐城、宝应以南发展，解决苏北问题。”^② 第三四四旅另一个团归彭雪枫指挥，并补充扩大成为主力向西鹿邑、柘城、太康、淮阳敌占区发展，与睢（县）杞（县）太（康）独立团联系，确实占领黄河以东之豫皖苏建立根据地，暂时不向南发展。这一战略部署，把从北、西、南三面向苏北发展，集中各部（八路军南下部队、新四军江北部队、江南部队）打击韩德勤，进行决战的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刘少奇这一战略部署，开始没有被彭雪枫、黄克诚所理解和接受。7月1日，彭雪枫起草了一份电报略谓：“与敌伪顽长期斗争，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须有山地作依托；黄部应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等等。”^③ 彭起草电报时恰逢黄克诚率部刚刚到达豫皖苏，黄尚不明了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义，以为仍受八路军总部指挥和北方局直接指挥，且觉得彭雪枫所起草的电报内容与他原来的看法比较一致，因而同意彭起草的电报“以彭黄

①②《新四军文献》第168、169页。

③ 参见《黄克诚回忆录》上册第281页。

联名电复中原局”。^①对此，刘少奇耐心地予以解释说：目前我之发展是向东向苏北发展，才能争取在华中站稳脚跟，树立优势。向伏牛山、大别山发展，虽是山地却是国民党军所在驻地的山地，而不是敌后山地，这为全国政治所不许。因此，除同意一部分兵力发展淮上地区和鹿邑、亳县地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扩大根据地以外，仍然令第二纵队过津浦路到皖东北，创立根据地，并作好东进准备。毛泽东也就黄克诚请示指挥关系的电报回复黄“服从中原局胡服指示”。黄克诚在明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后，便决心遵照中原局指示东进。

（三）郭村战斗前后

5月17日，叶飞率部回到挺进纵队驻地吴家桥地区，恰遇日军“扫荡”。在奋力粉碎“扫荡”以后，挺纵转移到“二李”防区郭村休整。此后即在郭村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武装等，这为“二李”所不容，害怕挺纵久住不走，多次催离。叶飞曾致电刘少奇、陈毅请示。5月22日，刘少奇回复叶飞：“你们目前的任务是独立支持两个月时间并努力扩大你们自己，加强自己的武力，在政治上吸引广大的同情者，造成我们在政治上的优势。至[于]武装冲突，则尽可能排远些，而且我们不要先下手与韩部冲突，要等韩部进攻你们时，即武装抗拒之，并消灭其一部。”^②但是，陈毅对此

^① 参见《黄克诚回忆录》上册第281页。

^② 《新四军文献》第625页。

持不同主张。5月28日陈毅复电管文蔚、叶飞并报中央、中原局，指出“苏北形势特点是我在敌伪、顽军、两李三面包围之中，我方力量较弱，尚未准备完成，如采取三面进攻，则必然失败”；“目前应充分准备应付局部突然事变，能争取两李共同反韩则最好。”^①6月下旬，李长江竟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3天内退出郭村，战事已不可避免。叶飞等再电刘少奇、陈毅请示，刘少奇复电“你们要选择适当的地形位置，能够固定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②而此时，陈毅已电告中央决定移师苏北，部队正在北移途中。因此，陈毅除急电在皖东的陶勇苏皖支队火速东援外，并紧急复电叶飞等，“指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尽量避免与两李冲突，不能避免也要尽量拖，以待江南主力打退冷欣进攻北渡长江，抑制战端；中策是如果避免冲突或拖延不了，要打，退到吴家桥打，那里背靠长江，可以机动；下策是在郭村打，易受四面包围，态势不利。”^③挺纵叶飞等同志研究后，还是认为在郭村迎战有利。对此，陈毅第三次致电叶飞等，要求“切不可在郭村御敌，吴家桥若不好守，万不得已时则暂时退回江南，与江南部队会合，然后卷土重来。”^④叶飞等同志仍未被说服，决心独立负责。在此情况

① 《抗日战争史事探索》第45页。

② 《叶飞回忆录》第177页。

③④ 《叶飞回忆录》第178、179页。

下，陈毅电告叶飞：6月28日便衣渡江，候我到再议。而正是28日，李长江按韩德勤“将江都、泰县境内各匪军一鼓而歼灭之”的反共磨擦命令，悍然向挺纵发动大规模进攻，挺纵被迫奋起自卫。6月29日，刘少奇来电：“八路军五纵队因日寇‘扫荡’不能如期赶到，新四军五支队也因大刀会所阻，无法增援。”^①这使叶飞陷入困境。幸好陶勇率苏皖支队，日夜兼程200里，此时已到达郭村以西，当夜又进入郭村，增强了防御力量。加之，“二李”部队中一部起义，战局大变，攻守易势。挺纵前后经8天奋战，终于粉碎了李长江的进攻，夺得了胜利。陈毅于7月3日赶到郭村，面对胜利之师，虽然有所批评，但是还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了挺纵：“孤军英勇，领导坚强，是胜利的核心。军民团结，友军起义，是胜利的保证。”^②为了发展胜利，陈毅针对“二李”这一中间势力时时动摇的特点，决定在对其给以适当反击，予以惩戒之后，趁热打铁地按“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及“灭敌、反顽、联李”的既定斗争方针和策略，在“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以推动抗战的宗旨下，与“二李”经过谈判，并退回“二李”部分人枪，从而成功地争取了“二李”，巩固了同“二李”的统战关系，明确取得了如韩德勤进攻我军，“二李”将保持中立的许诺。

6月1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的第二团、新六团等部，在句容东南西塔山地区，对尾追和堵截我军北进的冷欣部

①②《叶飞回忆录》第188、197页。

第四十师、第六十三师进行了反击，击溃其两个团。7月8日，苏南主力北渡到达江都塘头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终于造成我军争取苏北发展的良好环境。

（四）陈毅北渡而后东进黄桥建立抗日根据地

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成功，开始了同韩德勤正面交锋的阶段。蒋介石、韩德勤是绝不会让新四军在苏北立足的，必欲赶走或消灭而后快。江南指挥部所属主力部队，在沿江狭长的地区不可能立足，也不可能发展。因此，必须正确地选择和迅速地建设根据地，以利我军发展。当时有过3种议论：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进取黄桥。陈毅等在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和敌我态势后，于7月14日向中央报告，主张东进黄桥，并确定东进口号为“团结抗战，反韩打顽”。为适应完成东进任务的需要，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了苏北指挥部，辖3个纵队，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由叶飞、王必成、陶勇分任第一、二、三纵队司令。

7月20日，刘少奇等致电中共中央并转陈毅，再次说明必须取得苏北，为整个华中建立一个总的巩固的根据地的必要性。同时，提出了具体作战计划，即陈毅部暂不去黄桥，在原地待韩德勤、李明扬部集中部队向我进攻，我军则以逸待劳，严阵以待，在原地准备独立坚持两个星期至1个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国舆论和苏北群众证明“蚌自彼开”，在军事上等待与配合强大的增援部队到来，共同决战，击溃韩德勤、李明扬部主力。陈毅接到此电以后，与

粟裕等作了郑重的研究，认为刘少奇的战略思想完全符合中央的战略方针，但具体作战计划有待商榷，因为实际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郭村战斗以后，经过我方工作，李明扬已许诺中立，韩德勤、李明扬不可能联合攻我。同时，固守原地（郭村、吴家桥地区），西有日军，东有“二李”，北有韩顽，南是长江，不能作为决战战场。如韩顽进犯，相持时久，援兵不至，“二李”和日军见有利可图，趁火打劫，则我处境就十分危险。因此，只有东进黄桥，把郭村、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更能促使其保持中立。鉴此，苏北指挥部仍然决定东进泰兴县黄桥镇。

7月25日，苏北指挥部率部挥戈东进，29日进占黄桥。随即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攻占靖江东北的西来庵日军据点和孤山伪军据点，并粉碎了日伪军的两次报复性“扫荡”。这同只收税、不抗日、欺压百姓的韩德勤部形成鲜明的对照。新四军的声威大振，所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而且热烈要求新四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伪。但与此同时，我军同韩德勤的斗争也随之加剧。7月29日陈毅向中央报告：“韩尚存八十九军、八个保安旅，可能集中大举进攻。我们一面歼顽部队，一面作群众工作，一面分途派代表做交朋友工作，力求与韩作和平谈判，将来相机直派队到如皋至海边创造第三根据地。”同时，要求“八路军及四、五支队应渡过运河，占领几个地区作游击坚持，

可为策应，以便利与韩谈判，并战争再爆发好直接援助。”^①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即已在7月20日的电示中判断：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可能性很大，因此，苏北已成为顽我双方必争之地，故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仍须增援陈毅，以求压下韩德勤之攻势，发展苏北。遵此电示，刘少奇于26日令苏鲁豫支队与第五支队开辟淮（安）宝（应）地区，并令黄克诚部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向苏北前进。

（五）陈毅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和大力争取政治优势

从8月开始，苏北指挥部即在黄桥地区大力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首先，成立了以陈同生为主任的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继之又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以管文蔚、陈同生分任正、副主任，成立泰县、泰兴、如皋、靖江4个县政府，由惠浴宇、陈同生、梁灵光、刘万里分任县长。随着行政组织的建立，也开始收税征粮以解决部队供应。同时，陆续颁布施政纲领，公布减租减息等改善人民生活的法令；成立起农抗会等群众组织，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进步人士，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等。总之，使各项抗日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第二，加紧进行反顽斗争的准备。苏北指挥部于8月20日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工作，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扫

^① 《新四军文献》第632页。

荡’、反磨擦的胜利。”^①本着这一指示精神，苏北指挥部所属之主力部队仅8月份1个月就扩充了新战士1200人，地方武装也扩充了五六百人。第三，建立和健全了中共各级党组织。9月中旬，根据中原局指示，成立了中共苏北区委员会，以陈毅、陈丕显分任正、副书记。同时，撤销了苏北特委和江北特委，成立了泰兴、如皋两个中心县委，大大加强了党对各级工作的领导。此外，还成立了苏北军政干校，大批吸收知识青年参加抗战。

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引起了顽固势力的忌恨。韩德勤视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为心腹之患，必欲摧毁而后安。8月23日至26日，韩德勤在东台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即先集中主力消灭或驱逐南面“兵力较少”（韩估计我苏北指挥部所辖之兵力不超过三五千入）的陈毅部，然后移兵北上，同兵力强大的北面黄克诚部及西面“兵力亦厚”的新四军四、五支队作战。31日，韩德勤据此下达了作战命令，以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守维（韩部嫡系第八十九军军长）、李长江为副总指挥，以李长江、陈泰运分任右、左两翼“进剿”军指挥官，向黄桥地区攻击前进。同一天，陈毅即得悉上述情况，急电告知中央、刘少奇等，要求“八路军部队应迅速南进，主力要在省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之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才能密切配

^① 《粟裕回忆录》第223页。

合我们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① 9月3日，刘少奇、邓子恢致电陈毅、粟裕，并报中央：“韩德勤已开始向你们进攻，这已给了我们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现决以九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②但因沿途洪水泛滥，加之韩德勤封锁水道，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及黄克诚部难以迅速完成上述任务。因此，刘少奇又急电建议陈毅“准备两星期至一个月的作战”，“在开始时，只进行防御战，不作大的出击，而在全国发出呼吁，以争取我之政治理由。”事实证明这种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全局出发，把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的斗争策略，不仅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在叶飞返回挺纵时，在郭村战斗前后，在东进黄桥前，直到即将与韩德勤决战前，刘少奇均再三强调上述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为陈毅所理解和接受，而且在具体情况下创造性地予以实践、充实和发展。9月3日，韩德勤开始进攻。由于陈毅艰苦和有效的统战工作，右翼李长江进展迟缓，而在左翼的韩德勤嫡系精锐独六旅等大胆冒进，攻占我之营溪。陈毅后发制人，进行反击，夺回营溪，全歼其1个多团。此后，韩德勤令保安九旅进驻粮道要地姜堰，封锁新四军的粮食通道。苏北指挥部为疏通粮道，解救民困，于13日攻击姜堰，14日

①②《新四军征途记事》第141、142页。

占领之。此时，陈毅再次发动士绅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趁机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企图置我于被动，再借机进攻。但新四军9月27日在姜堰召开军民代表会议，陈毅在会上宣布，为了团结抗日，新四军愿退出姜堰，并严正指出韩德勤如再进攻，我必将自卫。9月30日，新四军履行诺言，退出姜堰，给各界人士以极大感动，“二李”和陈泰运再次保证严守中立。但韩德勤却无理提出：“新四军一定要退出黄桥，开回江南，才可谈判”。各界人士得知后，无不愤慨。苏北上层人士威望很高的韩国钧老先生也怒斥韩德勤：“小子无义，天必殛之”。陈毅在以上活动中，把政治与军事、自卫原则和以退为进的策略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新四军处于完全有理的地位，军事上也集中了兵力，自卫反击已取得了有利的主动地位。

为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彻底地孤立韩德勤，陈毅继续大力争取地方实力派，争取大批苏北中上层人士，揭露韩德勤的罪恶及挑起内战、破坏抗战的阴谋。9月中旬，由韩国钧主持在海安召开了“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协商会议，会后，还由韩国钧领衔，有黄逸峰、朱履先、季方等知名人士和8县代表联署，发出致苏北各方军事长官、重庆政界人士、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的3封函电，要求国民党中央“疾电江苏省府息战停争，或派要员莅苏，挽救危局”。这前后3封函电，代表了苏北上中层人士的意愿，表明韩德勤已失去人心。同时，陈毅对“二李”等继续开展

联络工作，“二李”等也参加了苏北各界人士的驱韩运动，他们致电蒋介石：“苏北局势日非，措施未免有失当之处，恳即派大员来苏北坐镇。力求改善，挽救危局，否则将不堪闻问矣！”^① 陈毅还让李明扬接防税收财源丰厚的姜堰，送给陈泰运 100 多条步枪和数挺轻机枪，放回营溪战斗中俘虏的保安一旅的 700 多名官兵，并写信给该旅旅长，对之晓以大义，劝其中立。这些都使这些中间势力喜出望外。李明扬还给韩德勤发去电报，谓“新四军已退出姜堰，希主席迅饬所部停止进攻，退到海安、胡家集一带。”^② 这些就使顽我两方的黄桥决战，我方具有充分的政治理由，韩德勤则在政治上、军事上日益孤立，从而为我方夺取决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六）陈毅率部与韩德勤部决战于黄桥获胜

新四军的主动撤出姜堰，韩德勤竟视此为“匪胆已寒”，而他则“战略上已获先制之利”遂于 9 月 30 日密令彼部“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应不惜牺牲，达到目的”，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在此前后，日伪军亦先后向皖东的半塔集地区、淮宝地区、淮北区以北的高沟、杨口以及皖南等地，发起少则千人多则万人（其中日军即有两个师团）的多次大“扫荡”。为此，刘少奇电告毛泽东及陈毅说：“估计敌有于最近向我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扫荡’，以配合韩德勤再度向陈毅部进攻之可能，已电克诚立即准备。”

^{①②}《苏中抗日斗争》第 49、50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扫荡’中，我苏北主力向北转移困难，仍以向东南出阜宁击破韩顽为安全，其余皖东、皖东北部队均须独立作战。”同时，“请延安、军部、集总速电重庆，向国民党严重交涉，要求制止韩德勤、李品仙在敌人‘扫荡’下向我进攻。”^① 根据日伪、顽军情况的变化，中共中央、毛泽东等十分关切苏北即将出现的决战，对决战所要达到的目的及策略等，均作了重要指示。中央并电告刘少奇、陈毅等：“韩德勤受打击后定必谨慎，且据水网地区，加之日寇在韩攻陈毅〔时〕曾大举‘扫荡’路东，虽然无证据说明韩与日寇勾结，但至少日寇与韩是心心相印均不愿八路军、新四军取韩而代之，因此一鼓而干脆消灭韩德勤已很困难或不可能。”据此，提出“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应由陈毅部、黄克诚部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由克诚部发展阜宁、淮安、盐城以北地区，陈部发展泰县、如皋及其以东地区，不仅扩大主力并且应努力与地方党共同建立无数的小游击队，建立新政权，把这些地区抗日民主化。如此，方能击破韩德勤。”“如韩部确实大举进攻陈毅，而八路军及四、五支队又未遇敌之大举‘扫荡’时，自应增援之。”“对韩部中、下层及苏北各顽军与地方人士，应广泛开展联络工作，分化其团结，争取同盟者，孤立韩德勤。”^② 在对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多次指示仔细进行了研究后，陈毅、粟裕旋即回电

① 《新四军文献》第 639 页。

② 《新四军文献》第 640 页。

毛泽东等说：“韩之进攻企图已极明显，一周内大战必爆发。韩畏八路军，轻视新四军，先突破南线及退路，再向北与八路斗争”；“我们进驻黄桥，即从政治上扩大统一战线，李明扬可保证中立，并于大战爆发时约定他即通电指斥韩处置失当，要求重庆撤去韩，另委贤能。韩所部除八十九军、独六旅外，余均有人去联络，尤以地方士民反韩甚烈”；“在韩围攻我的现在，仍派人赴各方表明我之主张：‘对外抗战，对内和平’。争取政治资本，而使各方明了挑衅自韩开始，造成驱韩运动，使作战时我更有利，使战后我更有利，囊括苏北”；“部队已积极准备作战，以独立作战为原则，韩如三路或两路来，坚决各个击破之”；“八路五纵请积极向兴化、盐城推进，即可援助我们”。^①至此，陈毅、粟裕依靠西面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进入淮宝区；北面八路军第五纵队（9月初由苏鲁豫支队、新二旅、陇海南进支队与第六支队的第四总队合编而成）已进入淮海区的有力战略配合，决心独立与韩德勤进行决战，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及时地发出警告。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韩德勤现又大举压迫陈毅。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因此，我们部署方针：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不能坐

^① 《新四军文献》第635页。

视。”^①但是，韩德勤已得到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的授意，又已经过周密策划，且自恃兵多粮足，武器优良，悍然于10月3日向黄桥我军发动进攻。韩德勤还亲临前线，指挥其主力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第一一七师和独立第六旅等1.5万余人组成的中央纵队，以“二李”和陈泰运等部1.2万余人为右路纵队，再加上第一、五、六、九、十等5个保安旅约7000人，总共26个团、3万余人的兵力，从西、东南、东、北、东北5个方向，向黄桥地区大举进犯，企图占领黄桥，歼我主力。而我苏北指挥部所辖仅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作战部队只有5000余人。双方兵力为5：1；众寡悬殊。在这同时，我军还要防御可能配合进攻泰兴等地的日军，形势十分严峻。

同韩德勤的决战，关系到我完成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成败。因此，必须一举歼灭韩德勤的主力。而我军历来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役、战斗上以多胜少，但这次作战，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这就必须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创新的而又是必胜的作战方案和战法。当时，苏北指挥部提出了3种作战方案：一种是给韩军重大杀伤后，暂时撤出黄桥，乘顽军追击时，再集中兵力歼其一路；另一种是全力死守黄桥，待韩军进攻失败后再出击。这两个方案都有优点，但都不能达到歼其主力的目的。陈毅主张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

^① 《新四军文献》第641页。

击破的方案。经反复权衡，苏北指挥部决定采用这一方案。在战役指挥上，由陈毅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粟裕到黄桥前线负责指挥。以第一、二纵队，用于突击方向，第三纵队守卫黄桥。10月4日，攻城战开始，我守军成功地阻止了韩顽部队的多次猛攻。当日下午我以第一纵队为主要突击力量，首战韩顽精锐独六旅，只用3个小时激战，就将其全部歼灭，中将旅长翁达自杀。首战告捷，给顽军的士气以严重打击，也对其它杂牌军以强烈的威慑作用。独六旅被歼后，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所率第一一七师大部及军部等完全被暴露和孤立，在其增援第三十三师时，被我第一、第二纵队包围。5日夜，我对其发起攻击，一夜激战，大部被歼，李守维仓皇逃窜，溺毙于挖尺沟河中。6日，第二纵队追歼韩顽残部至营溪。至此，决战全胜，歼韩顽1.1万余人，韩德勤带着残部逃往兴化。我军则乘胜攻占海安并北进东台。

在决战前夕，苏北党组织曾派出朱克靖、黄逸峰到泰州，稳定“二李”，并警惕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及日伪方向对“二李”的诱骗。同时，对陈泰运部、各个保安旅，也都派人进行了必要的工作。这就有效地促使了韩顽进攻时左、右两纵队约1.9万人的兵力中立或不为韩顽出力，从而使我军集中了95%的兵力对付韩顽主力的进攻，并获得几乎将其全歼的战果。10月4日，根据中原局的电令，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东进南下，迅速突破韩顽设于盐城和废黄河的防线以后，一路攻城夺镇，歼灭保安第二、第

八、第十旅各一部，直达盐城，从战略上形成对韩顽南北夹击之势，有力地配合了黄桥决战。至10月10日，苏北指挥部所辖之新四军部队同黄克诚率领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

(七) 陈毅为创建华中根据地的努力

黄桥决战的胜利，对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胜利，迅速地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以大力开展抗日战争。为此，必须正确对待败退兴化的韩德勤。10月11日刘少奇报告中中共中央：八路军黄克诚部已占阜宁、盐城、益林、车桥等地，新四军陈毅部已占海安、东台。韩德勤向兴化退却，集结固守，待李品仙、顾祝同增援。拟令八路军、新四军乘胜继续向兴化前进，解决韩部后，召集各县党政军民大会，成立苏中、苏北而后成立苏皖行政公署，统一津浦路东西各根据地的行政。但是，此时韩德勤开始托苏北韩国钧、李明扬和陈泰运前来向我斡旋乞和，顾祝同为救韩德勤，也来电要求缓和。据此，毛泽东等于10月12日指示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指出：“省韩大败乞和，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理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部会合，而以主力占领兴化以北以东之广大地区（东台河以北归八路负责），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停止皖西进攻之师。而陈毅则不拒绝和议，一面整理扩大

部队，扩大根据地，示我全为自卫不为己甚。”^①两天以后，中共中央又致电指出：“暂时尚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黄（克诚）罗（炳辉）两部可以向南迫近兴化（离兴化四五十里停止），陈（毅）部亦可向西推进一步，目的在迫韩放弃反共方针，承认分区抗日（我们区域划大一点），停止李品仙东进之师，保存李（明扬）陈（泰运）及绅士们的统战关系，又与蒋（介石）顾（祝同）不致闹翻，故一举数得。”“应继续与各方代表谈判，其条件应包括停止李品仙向皖东进攻及对整个新四军停止压迫（由省韩负责向蒋、顾提议），如能召开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我四方和平会议是很好的。”^②10月14日，毛泽东还致电重庆的周恩来说，苏北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毛泽东请周恩来除对职业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同时也对黄炎培等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他们在苏北同我们合作，并经过他们争取更多的民族资本家。^③陈毅坚决地执行了上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10月中旬，陈毅到盐城与黄克诚会见后，下令前线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停止进攻兴化韩顽部队，就原地驻守，派代表与彼停战言和。21日，陈毅又向中央军委报告：请中央速告周恩来转告蒋介石、顾祝

① 《新四军文献》第185页。

② 《新四军文献》第186页。

③ 参见《周恩来年谱》第470页。

同，也一律停止进攻，开诚言和。22日，陈毅再次到海安，商得韩国均同意，由韩国均出面主持各方和平会议，并在海安用电话同李明扬、陈泰运商量，一致同意，由韩国均、李明扬两位联名请各方人士及12个县的代表，于30日在曲塘召开和平会议。李明扬、陈泰运还电告蒋介石、顾祝同，要其下令各部队停止军事磨擦，开诚言和。陈毅在这一期间表现了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他十分尊重韩国钧，并通过韩国钧挫败了李明扬帮助韩德勤向我索还东台，并强要代表到泰州其防地开会等活动。在陈毅的努力下，“曲塘和会”如期召开，但韩德勤的代表却不敢赴会，会议遂改名谈话会。在会上，韩国钧发言说：“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为事实。我84岁老头子不是共产党，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①李明扬也发了言，说：“一贯同情中共，主张调停，韩德勤之处置是错误的，只要求大家不再打。”^②会上，陈毅也义正词严地指出：“新四军、八路军不攻兴化，不派队去海门、启东，完全为了顾全大局，不采取报复手段，各方能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则八路军、新四军愿与各方合作，目前应制

①②《新四军文献》第651页。

止阴谋家扩大反共范围。”^①同时，陈毅提出目前应立即计划出兵抗敌，还说：“新四军顾全大局，和平已竭尽智能，此后内战责任应由对方担负。”^②由于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方共同努力，会议终于通过了有利于团结抗战，而不利于顽固派投降、分裂的四项临时办法和八项基本改造江苏局面的办法。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团结了中间势力，进一步揭露了韩德勤顽固派，使其更加孤立，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苏北进一步确立。

（八）刘少奇、陈毅会见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1月17日，刘少奇同陈毅会见。陈毅情不自禁地写下充满着胜利喜悦的诗篇：“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就在刘陈会见的前一天，刘少奇向中央正式提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即叶挺）/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③这一提议旋即获得中央同意，中央并决定“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同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④1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东南局和中原局，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成为华中局的建议，并决定由新成立的华中局领导

^{①②}《新四军文献》第651页。

^{③④}《新四军文献》第708、709页。

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至此，我党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胜利完成，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局领导下继续发展壮大。

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寇清平 王晓伟 李永忠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结合新疆民族问题实际，提出并成功地实现了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使昔日历经战乱、饱受穷困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走上了团结发展、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回顾新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今天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发展新疆的各项事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新疆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新疆和平解放后开始酝酿的。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时，已经注意调查和研究新疆的民族问题，探索和总结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了。1949年10月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其它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结合新疆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开始酝酿并正式提出新疆实施

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

1、新疆解决民族问题方针的确立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解放以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各族人民饱受战乱和穷困之苦。由于不堪反动统治的压迫，各族人民一再揭竿而起，反抗反动统治。各族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在黑暗中苦苦摸索，渴望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途径。是中国共产党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开始注意到边疆地区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并开始探索正确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途径和方法。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同时，也为解决新疆民族问题提供了成功的经验。随着新疆的和平解放，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制度被彻底摧毁，各族人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生存权利和自由平等的权利，这就为解决新疆民族问题奠定了基础。

1949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以包尔汉为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为副主席的新疆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12月17日，在彭德怀主持下，新疆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个政府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它的成立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多年的争取解放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民族压迫的旧制度已被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制度所代替，新疆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特别应当指出的是，

新疆省人民政府设立了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委员会，这是前所未有的，表明了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

2、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正式提出

1950年1月8日，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次会议批准，《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目前施政方针》颁布实施。《施政方针》规定新疆省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是：“坚决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新疆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倡导的大土耳其主义。各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和文字、保护并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禁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报复、仇杀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培养和提拔各民族中的干部，组织和教育各民族的人民。”这个施政方针是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结合新疆实际而制定的，并成为新疆省人民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施政方针》明确提出在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表明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已经正式开始酝酿。

1950年3月22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就民族工作有关事宜致电新疆省，要求调查、研究新疆境内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阶级、历史等情况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建立各民族自治区域政权机关的问题。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结合新疆的具体实际，新疆分

局发出了《关于春季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全疆各地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城乡的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以及人民的迫切要求，正确实行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施政方针，有步骤地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根据上述要求，新疆各县、区、乡相继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吸收各民族进步分子参政议政，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各族各界民主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全省各地还有针对性地展开社会调查，组织各民族的积极分子、骨干和民族上层人士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座谈讨论新疆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原则和办法。

1951年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规定》，要求各级政府认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培养训练少数民族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4月下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各级政府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认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适时地建立民族自治机构。同月，西北局民委举行会议，会议提出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当做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上述要求，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酝酿工作加快了进程。

3、宣传党的政策，统一干部思想

1951年3月，新疆分局和省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对全省的人口和民族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并结合年初下发

的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和西北局民委征询意见调查大纲，责成各地召集各族各界人士就新疆如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进行座谈，并为此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宣传要点。3月8日，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震致电毛泽东，报告了新疆讨论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问题和有关情况，并提出了新疆分局目前对民族工作的3项安排：1、积极培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需的干部；2、召开分局扩大会议，研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见；3、做好群众工作，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3月31日，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分别复电新疆分局，同意新疆分局的安排，并就召开以统一党内对民族政策的认识为内容的分局扩大会议的有关问题作了指示。中央强调指出：1、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因此省人民政府只能是民族民主联合政府；2、省内各民族聚居区必须分别实行自治。西北局在复电中要求新疆分局多启发当地民族干部讲意见，以他们自身的体会去认识党的民族政策，批判民族主义倾向。4月13日至19日，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直接指导下，新疆分局召开了以统一民族政策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分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认真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座谈和讨论了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问题。经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内容和原则，统一了各族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为积极宣传和准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分局扩大会议后，全省各地相继召开会议，传

达贯彻分局扩大会议的精神，统一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民族各界上层人士了解并掌握了党的民族政策，从而推动了全省民族区域自治的酝酿工作，保证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顺利健康地进行。

4、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各项准备工作的开展

在酝酿民族区域自治的同时，新疆分局和新疆省人民政府还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在驻新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新疆省人民政府施政方针所规定的各项任务：进行了旧政权的改造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陆续召开了各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明确了各族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增强了民族团结；进行了剿匪肃特，巩固了社会治安；大力整顿和恢复经济，初步扭转了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局面；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恢复和发展了农牧业生产；在农村推行合理负担，试行减租，部分地减轻了农民负担；结合各项工作，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上述工作的进行，为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自1951年5月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分局、新疆省人民政府又开始在全省农业区开展减租反霸工作。经过近1年的工作，打击并削弱了封建势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树立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各族人民中的威信，为解决新疆民族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5、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会的召开和新疆民族区域自治酝酿工作的结束

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代表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肯定了新疆解放近3年来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前一阶段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会议要求继续在党内外干部中进行系统的耐心细致的共产主义教育，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注意学习党的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并把党的政策、方针、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方式方法与新疆民族问题的实际结合起来，更快更好地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新疆第二届党代会对于统一党员干部在党的民族政策上的思想认识，提高各民族干部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水平，增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具有重要作用。

1952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新中国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一个带有基本法性质的法规。它的公布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进行。8月22日，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决议》。《决议》指出，新疆解放以来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今后要按照《实施纲要》的要求，在新疆全省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全省各族人民要为在新疆全面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而努力。

至此，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酝酿工作基本结束。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学习讨论，使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了解了党的民族政策，统一了党内外干部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认识，明确了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方针和内容，从而为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1952年9月至1953年11月，是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筹备阶段。在1年多的筹备工作中，主要解决了3个问题：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步骤和具体方针；广泛宣传 and 普及了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一了各族群众的思想认识；做好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开展了培训少数民族干部和进行社会调查的工作。

1、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筹备阶段任务的确定

1952年8月22日召开的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指出，为了更好地依据省内各民族不同的经济条件和历史关系等情况，在民族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准备，使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具备更完善的条件，在民族区域自治的筹备过程中要努力做好两项工作：第一，通过今冬明春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摧毁封建枷锁，使各民族劳动农民在政治上、经济

上获得进一步的解放；第二，在土改中培养大批各民族优秀干部，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与会代表经过广泛讨论，一致同意组成以包尔汉为主任的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专门负责进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筹备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查民族情况、研究如何具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时，应注意克服各族干部和人民群众思想中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为正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打下基础。

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极为重视和关心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顺利实施，要求新疆分局把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当作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一项重要工作去抓，要按照“慎重稳进，积极准备，逐步推行”的方针，认真计划，合理安排，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批转了《西北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在这一文件中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并要求新疆分局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计划，报中央和西北局批准后执行。9日，西北局再电新疆分局，要求分局积极做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抓好干部的理论 and 政策学习，做好思想准备工作。

1953年1月，新疆分局草拟了《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上报中央和西北局。旋即得到中央批复。中央要求：新疆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要注意民族团结，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不仅要照顾到各民族目前的聚居情况，而且还必须照顾将来的发展条件，以利于

各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在步骤上可采取“由小到大”，稳步推进。4月13日，党中央在给新疆分局《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计划草案的批示》中再次强调指出：“在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件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做好准备工作。要求做到全党动员，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以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正确实施。”“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有关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必须强调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维族在新疆如同汉族在全国一样，是其他各兄弟民族的主体民族。因此，必须使维族干部如同汉族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帮助和照顾各少数民族一样来团结、帮助和照顾新疆境内的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更进一步地加强和发展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

2、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工作的全面展开

根据党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在新疆分局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执行机构——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教育。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实行，有赖于各级干部和各族各界广大群众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正确认识。因此，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对提高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极为重视。1952年9月14日，省级机关和乌鲁木齐市各机关干部开始学习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政策。19日，新疆分局第四书记、省人民

政府副主席、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委会副主任赛福鼎在乌鲁木齐向各级干部 1 万余人作了有关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是为了搞民族分裂或民族独立，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各民族聚居地区为基础的，其目的是根据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发展各民族的经济，然后是求得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必须无情地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此后，全省各地利用召开座谈会、进行广播宣传、组织学习班和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对各族干部和群众广泛深入细致地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1953 年 6 月，新疆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经过认真的学习和热烈讨论，在统一了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解，提高了政策水平。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二，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和掌握新疆的具体情况是制定和实施新疆民族区域自治计划和办法的客观依据。为此，新疆分局和省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对新疆的社会和民族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全面掌握了有关新疆各民族分布，各民族聚居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和历史，以及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力求使民族区域自治

实施计划符合新疆的具体实际，反映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共同利益，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和发展。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于1953年6月召开了扩大的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在会上，包尔汉主席向全体委员报告了全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准备工作情况，并提出在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是：“新疆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他指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此方针下，有步骤地建立各级自治区。《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通过后，旋即上报中央审批。

第三，培养从事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干部。培养各民族自己的干部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条件。中共中央、西北局曾多次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作出指示。新疆分局亦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除了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外，还特别注意通过开展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减租反霸等运动，发现和培养民族干部。为了培养进行民族区域自治所需要的各民族干部，省人民政府干部学校还于1953年5月专门成立了民族区域自治部，并选拔了来自新疆各地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达斡尔、满等民族的在职干部和部分积极分子，以及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的民族上层人士284人进校学习。

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这些学员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结业后，他们分赴各地，协助当地政府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筹备工作，发挥了骨干作用，并迅速成长起来。大批专门从事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 and 成长，为新疆全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进行上述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同时，新疆农业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相继开展并陆续完成。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根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生产和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并且锻炼、提高和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所有这些都为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3、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工作的胜利完成

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新疆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组织各民族的领导干部及上层人士对本省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酝酿，反复讨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同时，还派出赴内地参观团，实地考察和了解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情况。为了摸索经验，1953年9月24日，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委会向乌苏、鄯善、霍城3县派出经过训练的284名各族干部，组成民族区域自治工作队，分别在蒙古族、回族、锡伯族等聚居的地区进行相当于区级或乡级的民族自治区的试建

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相继建立了相当于区级的乌苏县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自治区，相当于乡级的鄯善县东巴棚回族自治区和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自治区。民族自治区试建工作的成功，为省内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全面铺开取得了初步经验。

1953年11月20日，新疆省人民政府举行会议，通过了《新疆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和《新疆省相当于行署暨行署以下各级民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同时，修正通过了《新疆省相当于区一级的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及《新疆省相当于乡一级的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上述条例定于12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

经过新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及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委会1年多的努力工作，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条件日渐成熟。从1953年12月起，全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

(三)

1953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复了《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关于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办法》，同意新疆除建立全省以维吾尔族为主的自治区外，还可建立其他民族的各级区域自治单

位，其中行署级自治区1个，专署级自治区4个，县级自治区6个。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便在全省铺开，进入实施阶段。

按照《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关于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办法》的规定，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工作采取“自下而上，由小到大，逐级推行”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省铺开。

1、建立相当于区、乡级的民族自治区

自1953年11月至1954年7月，建立了7个相当于乡级的自治区，即：昭苏县群木扎尔特英额艾热克柯尔克孜族自治区、莎车县孜热甫下提塔吉克族自治区、叶城县阿托提阿巴提塔吉克族自治区、皮山县诺吾阿巴提塔吉克族自治区、特克斯县的塔温布勒克和霍吉尔特两个蒙古族自治区及阿勒泰县康布铁堡蒙古族自治区，连同在此之前建立的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自治区、鄯善县东巴栅回族自治区共9个。建立了相当于区级的自治区6个，即：昭苏县察汉乌苏蒙古族自治区、伊宁县愉群翁回族自治区、和硕县乌什塔拉回族自治区、特克斯县库克铁勒克柯尔克孜族自治区、塔城县瓜尔本设尔达斡尔族自治区、额敏县额玛勒鄂勒蒙古族自治区，连同在此之前建立的乌苏县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自治区共7个。以上区、乡级自治区后均改为民族乡。

2、建立县级民族自治区

1954年3月17日至25日，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区召

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包括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回族等7个民族组成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区。此后，在半年时间内，又相继建立了焉耆回族自治区、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区和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区。以上县级民族自治区后均改为自治县。

3、建立相当于专署级的民族自治区

在建立县级自治区的同时，专署级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工作也在加紧进行。6月23日，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区率先建立。7月中旬，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区和昌吉回族自治区相继建立。4个专署级自治区以后均改为自治州。

4、建立相当于行署级的民族自治区

经中央批准，新疆省人民政府决定在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专区成立相当于行署级的哈萨克族自治区。1954年4月20日至21日，省人民政府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有10个民族的代表及各方面人士12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正式宣布成立筹备委员会，着手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专区合并为相当于行署级的哈萨克族自治区的各项工作。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在听取了包尔汉主席的讲话和赛福鼎副主席的报告后，经过广泛讨论，充分协商，一致同意由各民族干部、代表人物51人组成“建立伊犁、塔城、阿勒泰哈萨克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自即日起，该筹委会即开

始负责成立行署级哈萨克族自治区的一切有关工作。在半年多时间里，伊、塔、阿3区按照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省人民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计划，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1954年11月22日至27日，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伊宁举行，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随后，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于1955年2月再改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5、建立省一级的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民族自治区

经过1年的工作，新疆共成立行署级及其以下各级民族自治区27个。各级民族自治区及自治机关的建立，使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参与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加强了各民族间与各民族内部的团结，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政府与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联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广大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全新疆范围内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民族自治区的条件已经具备。

1955年2月11日至19日，新疆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1955年应以成立省一级的维吾尔族自治区作为年内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并要求各有关方面积极认真地做好成立自治区的各项准备工作。4月10日，中共中央就建立新疆全省自治区致电新疆分局，要求务必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注意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思想倾向，进一步增强省内各民族的团结，进一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根据中央的要求，新

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在进行全省民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中，继续对各族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教育，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意义。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建立全省自治区的筹备工作进展迅速，至1955年9月，建立全省以维吾尔族为主的自治区的各项工作均已就绪。

1955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议案，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9月20日至30日，新疆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会通过了《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议的决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大会并根据选举办法的有关规定，经过各族代表充分酝酿协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以赛福鼎为主席，高锦纯、买买提明·伊敏诺夫、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为副主席，阿·艾沙等37人为委员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10月1日，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隆重集会，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董

董必武会并发表讲话。董必武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又一伟大胜利，是祖国各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国家按照宪法规定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和各民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大会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了致敬电。

至此，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基本结束。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历时6年，经过酝酿、筹备、实施3个阶段。新疆境内13个少数民族中，除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满等民族因人数过少、居住分散，不适宜建立自治单位外，其他少数民族均已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在建立各级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时，从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有利于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出发，在各自治机关的组成上均以本民族代表人物及本民族干部占多数，以使之充分行使管理本民族事务的自主权。同时，对散居的各少数民族，也适当吸收其代表人物参加属地自治机关的各项工作，以尊重和保障各散居少数民族享有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新疆各民族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各少数民族群众真正掌握了向往已久的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全新疆范围的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后，新疆民族工作的

重点逐渐转向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利用国家给予民族自治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极大地加强了新疆各民族的团结，极大地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政治稳定，从而也就大大促进了新疆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随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特别是1984年中国第一个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后，新疆依照这一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新疆实际和各民族共同利益日益发展的需要，制定并实施了数十个具体法规和具有法规效力的决定、决议，完善和健全了各级自治机关，切实保障各少数民族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加速了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and 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运用于新疆具体实际而创造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卓越政治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经历了无数磨难后，在党的领导下作出的正确历史选择。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正确政策。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工作也一定会进入一个新的水平，迈上更高的台阶。

从“一二九”到“八一三” 时期的上海地下党

〔日〕田中仁著 张晓峰译

华北事变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是中国政治由“抗日民族意识”向“抗日救亡”的转折时期，中国社会的各党派、各阶层在此时有过重要的转变。本文以阐述中共上海地下党在此时期寻找和探索民族革命的方向，并以救国会为核心，推动“抗日救亡”这一政治主题的形成作为线索，追溯和分析上海地下党与救国会的关系以及上海救国会运动在中国政治上的历史地位。

一、路线转换和“临委”的成立

（一）3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地下党组织

1933年初，中共中央遭到国民党破坏，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此后，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央执行局，领导白区地下党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6月和10月、1935年2月和7月遭到4次大破坏后，上海的中共党员仅剩200人左右，共青团员仅存

30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临时中央局停止了活动。当时上海共产党组织有5个系统，即：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共青团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全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武卫会）以及情报系统。各系统的党组织都与中央失去联系，相互之间亦无关联，各自独立地开展活动。

（二）共产国际七大与路线转换的探索

1932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苏联大使馆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了一个小书店，出售《国际新闻通讯》和《莫斯科日报》。“文委”从这里了解到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代表发言等情况，并翻译和油印了有关文件作为工作的指导文件。经历了国民党于1935年7月进行的大镇压之后，“文委”以周扬任书记，章汉夫、钱亦石、夏衍、吴敏等为成员重新建立。9月以后，“文委”根据新了解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报告，对其活动方式的转变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其他地下党系统也通过各自的渠道，了解到共产国际的方针，开始探索各自的路线转变。

“文委”系统：1935年10月上旬，“文委”领导下的左翼文艺总同盟（“文总”）组建新的党组（书记胡乔木，成员邓洁、王翰）。25日，“文委”常务委员会发表《关于新纲领发表的紧急通知》。11月上旬，“左联”收到萧三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为适应救亡运动的发展，12月“文委”及其领导下的“左联”、“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解散。此后，这些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到各个救国会中去工作。“一二

九”运动爆发后，“文委”联络沈钧儒、何香凝、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等社会名流人士，召开了救国会代表和“武卫会”、“全总”、“文总”及各联合会的联席会议。同时，由王翰和“左联”的何家槐建立了领导学生运动小组。

共青团系统：1936年1月，共青团江苏省委从《救国时报》上了解到团中央关于把共青团变为大众性抗日救国青年团主张后决定：1、坚持独立活动暂不扩大团员人数；2、团员以普通民众身分参加救国会的抗日救亡运动。

“全总”系统：1936年2月16日，“全总”白区执行局决定成立日商纱厂工作委员会（纱委），组织和发动了全市性的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

“武卫会”系统：1935年11月，“武卫会”党组织进行了调整（书记林里夫，成员：陈壁如、李建模、袁牧华）。为防备国民政府的镇压，该党组决定停止一切活动，只保持20到30名最可靠干部之间的单线联系，属于这个系统的大多数党员参加了救国会的活动。

总之，各个系统的党组织，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为依据，在组织与活动两方面进行了重新探索，并试图通过救国会运动来开展工作。

（三）“临委”的成立与救国会内的党组织

从1935年12月到次年2月，上海妇女界、文化界、职业界等各界救国会相继成立，展开了广泛的民众救亡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文委”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因为“文委”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而救

国会是由工人、店员、民族资产阶级、学生等不同的阶级、阶层所构成的有职业差别的民众组织。1936年2月，在救国会运动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文委”决定成立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以便领导救国会系统的党员。临委的成员是：书记邓洁，委员胡乔木、王翰、丁华、王新元、钱俊瑞。各救国会党组的构成为：1、文化界救国会（文教）：书记钱俊瑞，成员曹亮、王新元、钱亦石、孙克定等。2、妇女界救国会（妇救）：书记杜君慧，成员林立、张惠英。3、职业界救国会（职教）：核心小组林枫、顾准、王纪华、陆志仁、刘峰。4、国难教育社：书记丁华、郑伯克，成员张劲夫、王洞若、张敬人等。5、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书记钱俊瑞，成员王翰、石不烂、张劲夫、钱亦石等。据王翰回忆，“临委”和“文委”两者的关系不太明确，因为“文委”成员是以前的领导人，所以我们很尊重他们。但因为他们很忙，又有对救国会上层人士的工作，所以不干预“临委”的工作。

（四）冯雪峰、潘汉年来沪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以恢复上海地下党与陕北党中央之间的联系。其具体任务为：1、建立上海通讯设施；2、负责同各救国会领导人之间的联络；3、负责上海地下党各系统组织之间的联络与合作。冯向上海党组织传达了带来的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并指示在上海暂时不发展党员。7月，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派潘汉年与胡愈之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胡愈之在救国会

开展工作。潘汉年在上海停留数日后，又于8月8日到达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9月，潘再次回到上海并设立了中共上海办事处，其主要活动内容是：1、在上海开展统一战线工作；2、负责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络；3、在白区收集情报。

二、救国会和上海共产党

（一）救国会上层人士和共产党的关系

救国会在组织上分为公开部分和非公开部分。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属公开部分，这些人有威望和社会地位，他们公开举起救国旗帜不但能得到进步势力的支援，就是国民党也不能轻易破坏他们。而中共则通过救国会这个组织形式，可以把许多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集结在救国会之中。在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中，上海地下党与救国会上层人士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这一时期对救国会上层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党员是胡愈之、钱亦石、曹亮、王纪华、艾思奇、徐雪寒等。

（二）“上救”的成立和共产党

救国会发端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章乃器等10人小组一两周一次的“叙餐会”。当“一二九”北平学潮消息传到上海，他们于12日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明确表示了支持北平学生救国运动的态度。

不久，在上海相继成立了各种救国会及其联合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救）。与此同时，文化界救国会与其他各界救国会开始筹备成立“全救”。这一时期，“文委”为统一各兄弟组织的行动，召集了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救国会代表外，还有“武卫会”、“全总”、“文总”的代表。会议召集人是“文总”代表王纪华、王翰，文化界代表孙克定，教联代表雍文涛，这4人都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家。这次会议是在救国会上层人士和上海地下党的密切合作下举行的。接着，以这个合作为基础，地下党改组了“武卫会”、“全总”、“文总”等各个系统的党组织，使各个系统的成员投入到救国会运动之中。

（三）救国会的组织机构与共产党

1、干事会：“上救”和“全救”（1936年5月成立），都设有公开的理事会，日常工作则由非公开的干事会负责。胡子婴是“上救”的总干事，徐雪寒和朱楚辛是副总干事。“全救”总务部长王造时领导下的石不烂，组织部长下边的徐雪寒以及宣传部长下边的吴大琨，作为各部的总干事负责每天的具体工作。徐雪寒和石不烂是中共党员，吴大琨受钱俊瑞领导，是极接近中共的人物。以上情况说明，在“上救”和“全救”组织机构的非公开部分，中共党员占中枢地位。

2、行动指挥部：救国会行动指挥部是在组织1935年12月24日游行的过程中建立的，此后成为常设机构。为准备这次游行，章乃器召集了多次会议，最后决定成立行动

指挥部。王纪华（职救）和林立（妇救）担任行动总指挥，章乃器、邓洁、钱俊瑞、王翰等人设立后方指挥部指导这次游行。这次游行后，各救国会决定把行动指挥部常设化。这个组织是非公开的，由各救国会所派代表组成，其中陈家康（学联）、孙克定（文救）、林立（妇救）、郑伯克（国难教育社）、雍文涛和王纪华（职救）都是救国会内的共产党员。雍文涛担任总指挥，直接受邓洁领导。行动指挥部在每个纪念日都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中共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发挥了作用。

3、“职救”组织部：“职救”是救国会中最有群众基础和号召力的团体，其成员从高级职员到银行、钱庄职员、学生等十分广泛。“职救”成立时，会员有600余人，以后发展到1000余人，到游行时增加至近3000人，可见其号召力之大。在“职救”中活动的中共党员有10人左右。同时，“职救”中还有由积极分子组成的数十人的“职员联盟”。中共的核心小组，通过“职员联盟”成员掌握了“职救”的基层部分。据陆志仁回忆，在1936年5月至6月的“职救”组织部里，王明扬、杨修范、陈敏之、刘峰、陆志仁、杨子发6人，在沙千里部长领导下从事组织工作。在这些人中，除了杨子发以外，其他5人都是中共党员。这说明中共在“职救”组织机构中也发挥着中枢的作用。

4、《救亡情报》：该报作为“上救”机关报创刊于1936年5月。该报由“经理”徐雪寒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经“上救”宣传部长王造时审阅后发行。该报成为“全救”机

关报后，由宣传部长章乃器和总部干事吴大琨负责。因而，《救亡情报》的编辑发行，也与中共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从主持救国会日常工作的干事会，到负责指导、计划集会游行等实际活动的行动指挥部，以及在救国会中最有号召力的“职救”组织部和救国会机关报《救亡情报》的编辑部等，这些救国会组织的中枢部分，都有中共党员负责。由此可见，救国会是由上层人士负责的公开部分和中共党员掌握中枢的非公开部分所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

（四）救国会的活动和共产党

1、“学联”的成立：“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带来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学生动向也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公开组织的上海“学联”，成立于1936年5月27日，实际上此前已有“学联”组织，只因未能找到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代表者而不得不作为地下组织来活动。“一二九”以后，“文委”为指导在其影响下的学生运动，决定由王翰和何家槐组成专门小组集中指导学生运动，该小组的任务是筹备成立上海“学联”及全国“学联”。据史亚璋回忆，1936年春，王翰和胡乔木在复旦大学外的忆顿楼召集各方面人士，传达了合并本校的“武卫会”、“社联”、“左联”、共青团等组织，建立“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指示。同时他们还要求与会者以同样形式改造各学校的各个组织，这样，就为筹备成立上海“学联”做了准备。全国“学联”5月29日成立之前，北平“学联”为

获得上海各界对北平学生运动的支持和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也曾派遣陈翰伯、韦毓华、陈元、刘江陵、董毓华、黄敬、陆瑾等到上海联络。3月18日，上海“学联”接受北平“学联”建议，与北平“学联”代表共同组成全国“学联”筹备会，胡乔木是负责人之一。

2、“工救”的成立：1936年7月，共青团江苏省委决定把上海各方面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救”。共青团工委领导人袁超俊以“上救”常务干事的身分把上述决定转达给沈钧儒、沙千里，并得到他们的赞同。8月26日“工救”成立，袁超俊就任理事会主席。

3、“全救”的筹备：当时任“全救”中共党组书记的钱俊瑞对此作了如下记述：1936年初，在“文委”的领导下，我们得到沈钧儒的同意，开始筹备成立“全救”。同时，我们与北平派来的刘江陵和天津的黄敬商议，决定派人与全国各地取得联络。

4、刘少奇的言论及活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政策。为转变华北党的路线，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天津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兼北方局书记。刘于1936年春到达天津。另一方面，1935年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后，其中一部分人到北方局来避难，所以上海地下党与北方局之间存在着私人联系。“一二九”运动后，通过这些人的关系，两地党组织开始接触。接着，从华北来到上海的学生代表，向上海党组织说明了自己的党团身分，并给

上海党带来了北方局的文件。刘少奇主张应在上海成立“全救”和全国“学联”。他还就《生活日报》的目的及救国会运动的性质，向邹韬奋作了具体建议，这个建议被邹所接受。进而，他所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成为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文件。

5、关于《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这个文件是1936年7月15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签名发表的指导救国会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实际是由沈钧儒等救国会上层人士与潘汉年商定下完成的，潘汉年关于这个文件的观点是基于如何沿着国共之间秘密谈判的进程和展望今后的中国政治这一点上的。

三、“全救”的成立与政治形势的发展

（一）“全救”成立的政治意义

“全救”不但集中了城市的广泛阶层，而且形成了全国性网络。这说明“全救”的成立意味着在抗日时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的政治力量。“全救”与中共以外的政治势力之间联系，以及这个政治力量对中国政治产生的影响，直接推动了中国政治形势的转变。

据吴大琨和徐雪寒的回忆，“全救”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杨虎城、刘湘等人有一定的联系。“全救”与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接触是十分慎重和极保密的。“七君子”被捕之后，“全救”在章乃器家里首先销毁的文件之

一就是与西南、西北联系的秘密电报。此外，当时中共中央与西北及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对抗日救亡问题也有相互联系和协议，特别是中共和西北地方实力派形成了“西北大联合”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全救”、中共中央、西北和西南的地方实力派等各政治势力，在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转变上，步调是一致的。“全救”与南京方面的关系，突出表现在冯玉祥及宋子文之间的关系上。据孙晓村所述，沈钧儒曾由孙和千家驹陪同，访问过在南京的冯玉祥，向冯说明了救国会的主张与活动，冯表示完全同意救国会的方针和工作。另据章乃器述，宋子文从内心里同情救国会，曾通过宋庆龄多次向救国会赠款达数千元。从1935年秋到1936年冬，国共之间进行了合作抗日的秘密谈判，国民党方面，由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主持，以各种渠道与中共进行了谈判。以上说明，国民党权力中枢部分也开始向与政治转换期相适应的方向转化。

“全救”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等中国地方政治巨变中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1、章乃器在关于两广事变的社论中指出：广西的民众运动虽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理想，但至少我们之间有着相当的共同基础。在对青年的压制及思想束缚上，广西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是比较开明的；2、据徐彬如所述，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从秘密工作阶段转入了公开活动阶段；3、1937年3月31日的《救国时报》报道，在绥远由

于大敌当前，抗日救亡运动已能公开开展。新成立的绥远救国联合会，使工人、学生、文化等各救国团体的工作十分活跃。这些资料表明，一旦对抗日救亡形成共识，这个地区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就会得到很大发展。这种状况决不仅限于以上地区，而且适合于中国社会整体，带有普遍性。

（二）关于上海的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

上海工人运动有过曲折的过程。“一二九”后，纱厂总工会的工作重点转到日商纺织厂。1936年2月4日梅世钧事件所引发的各日商纱厂的罢工，因政治口号过多、要求过高而失败。16日，“全总”白区执行局决定成立“纱委”，由陈之一、郭光洲、张维桢、韩念龙、周林（都是中共党员）组成。该委成立后，于当年3月发动了5个日商纱厂工人在车间静坐示威的斗争，并决定让3000名救国会会员加入“全总”。这次斗争也失败，结果使此系统的救国会会员减少到70至80人。经过这几次失败，在“纱委”内部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6月，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带到了“纱委”后，“纱委”以这个文件为依据，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克服了宗派主义倾向。8月26日，“工救”成立，此后上海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便在“工救”的旗帜下开展起来。

此后，“纱委”进行了日商纱厂罢工斗争的准备工作。成立了由张维桢负责的罢工指挥部，周林负责在沪东发动罢工，郭光洲和韩念龙负责与“上救”之间的联络。11月

8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开始，很快就波及到全市所有日商纱厂。对这次罢工有3点值得注意：第一，救国会与这次罢工的关系。1936年8月成立了非公开的“工救”，在11月12日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上，由于罢工工人代表要求声援，救国会才组织了罢工斗争后援会。从表面上看在罢工发生前救国会没有参与，但实际上却非如此。因为：1、中共党员在救国会组织机构中占中枢部分；2、郭光洲、韩念龙曾与救国会联系；3、章乃器从救国会的经费里拿出7000元作为罢工费用；4、“七君子”被捕之后，在章乃器家里首先销毁的文件之一有支援罢工募金的凭据。第二，关于黄色工会的动向。中国劳动协会理事朱学范在1936年6月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动者大会之际，曾与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康生、李立三秘密会见，双方对抗日问题和加强工人的团结，取得了一致意见。罢工中黄色工会与红色工会虽没有组织上的配合，但在事实上实现了统一行动。第三，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推动下，青岛日商纱厂于11月19日举行了32000多人的同盟总罢工。这种情况表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由此以“全救”这个中国政治上的新势力的出现和与其相随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为前提（正如11月15日的《救国时报》社论所指出的，这次罢工拟发展为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已充分具备了“发展为全民抗日救国的伟大行动”的可能性。至此，国民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在实际上已无法继续推行。23日，救国会

“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对蒋介石来说，这是阻止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办法。

11月24日，日商纱厂联合会与罢工调停者杜月笙会见，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工人于27日复工。罢工的结束，一方面说明蒋介石逮捕“七君子”的强硬措施发生了作用，另一方面，以工人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由于得到了上海各界的广泛支持并可能波及到其它地区，从而迫使日商厂方的让步。这也说明这次罢工，对把抗日时期的中国政治进一步推向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国内和平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战的形成

(一) “七君子”事件与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

1936年9月，“临委”书记邓洁和委员丁华相继被捕。为了避难，胡乔木、王翰不得不隐蔽起来。此后，“临委”的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12月，冯雪峰开始筹备重建上海党组织和临时工作委员会。冯审查了每个党员，把有条件今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转归“三人小组”（王尧山、沙文汉、林枫）领导，其他党员分配到中共上海办事处从事公开活动，或转移到延安和其它地区。1937年初，上海地下党又成立了临时党委（书记李凡夫，委员胡乔木、徐雪寒、王翰等），但这个组织因李凡夫、胡乔木离开上海去延安，在同年五六月间就解散了。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不得不花大力进行组织的整顿和保护工作。加之，代表救国会公开部分的“七君子”被捕，严重冲击了救国会运动。“七君子”被捕后，行动指挥部也停止了活动，《救亡情报》被迫停刊。鉴于此，救国会内的党组织通过保存干部、检查每个人的关系，为即将到来的新阶段作准备。另一方面，救国会上层部分，以未被逮捕的宋庆龄、何香凝为中心，开展了营救“七君子”运动。但从救国会组织是公开部分和非公开部分的结合体来看，就不能不因为这两部分被割断而使救国会运动被迫陷于停滞状态。

从华北事变到西安事变这一阶段，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使其与坚持“安内攘外”政策的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从1936年11月的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经“七君子”事件到西安事变而达到顶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意味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步实现，“维持国内和平、实现对日作战”的政治态势成为此后中国政治的基本课题。对日作战的具体化问题，就成为国共谈判的主要议题。这个阶段，中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苏区代表大会和白区工作会议，实现了从苏维埃革命路线向抗日民族革命路线的转换，同时确定了新阶段苏区和白区工作方针。对于上海的地下党工作，中央决定派刘晓去负责。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同时，蒋介石也瓦解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成功

地控制了救国会的势力，并在国共谈判中相对地强化了自己的立场。但是，中国政治新态势的产生却使蒋介石处罚“七君子”和弹压抗日救亡运动失去了根据。

（二）七七事变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在中国政治的基本课题转变为抗战的具体化阶段所发生的卢沟桥事件，终于导致了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国共双方从7月中旬到9月下旬，在庐山和南京进行了3次谈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国民政府在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同时，为把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纳入其控制之下，在南京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机关等组成或参加的抗敌后援会，同样的组织在全国也相继成立。上海7月22日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但该会规定：“一切合法团体须加入本会采取一致行动，不得存在其他任何救国团体、单位”。虽然上海有原来的以救国会为主的民众性抗日救亡组织，但这个组织形式已不能有效地动员、集中一切抗日力量，所以把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广大群众迅速汇集到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组织之中就成为必要。为此，从7月下旬起，各界的救亡协会相继成立。鉴于官方的各界抗敌后援会想把所有民众救亡团体置于其控制之下。对此，上海中共党组织采取了灵活应付的方法，让各救亡协会会员以团体名义加入抗敌后援会，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各救亡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发端于1936

年上海救国会运动的民众救亡运动，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新阶段，以救亡协会的形式得以继续发展。

（三）江苏省委的重建

刘晓于1937年7月到达上海。他接收了冯雪峰等组成的“三人小组”和所属党员的组织关系。此后冯雪峰调到中共上海办事处，离开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刘晓领导的地下党系统和冯雪峰领导的办事处系统完全分开，成为各自独立的系统。7月上旬，中央又指示刘晓、冯雪峰等组成临时“三人团”，主持上海党的工作。上海地下党在8月中旬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工委）和群众运动委员会（群委）。“工委”由林枫（书记）、吴仲超、马纯古等组成；“群委”由王尧山（书记）、沙文汉、陈修良、王洞若、彭柏山组成，负责领导救亡协会系统的党团组织。此外，在职业界还建立了以顾准、雍文涛、陆志仁为成员的临时工作委员会。8月，中央把中共上海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作为中共在上海的公开窗口。办事处负责人是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为秘书长。办事处还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孙冶方），发行《内地通讯》、《民族公论》、《文献》等刊物，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1月12日，上海陷落。自此，上海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八路军办事处转入地下。同月，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沙文汉组成，刘晓任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沙文汉任宣传部长。此后至1938年1月，江苏省委设立了各个委员会。

小 结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丧失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危机之中。以共产国际七大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4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陕北党中央；第二，以莫斯科和巴黎为活动范围的中共代表团；第三，1935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停止活动后，在白区工作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北方局；第四，就是本文所要考察的上海地下党。上海地下党各组织在相互间组织关系中断的情况下，一方面找到与其他党组织的联系，另一方面分别摸索向抗日民族革命路线的转换。在共产国际七大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地下党对过去的政策和组织进行了反思，并探索了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进行联合，形成了以救国会为中心的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统一战线。

救国会运动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下，在求得与各派政治势力的联合中，所形成的符合中国政治新格局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以1936年11月间的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为顶点，导致了国民党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中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迎来了以“维持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日”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政治的新阶段。因此，1936年上海救国会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众抗日运动之先声。

(李良志审校)

黄埔军校沿革述略

刘志青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黄埔军校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军事院校。它诞生于革命风雷激荡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校不久，众多的黄埔学子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为打倒北洋军阀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黄埔军校历史上的光荣一页。军校正式名称曾几经变化，但因创办时校址在广州黄埔岛，因而人们一直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黄埔军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其校址几历播迁，人事也几经更迭。本文将就其沿革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创建时期与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

有关创建黄埔军校的酝酿可以上溯到1921年底。其时，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了帮助中国革命，曾派代表马林到中国来与孙中山建立联系。同年12月，马林由上海抵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双方经会谈达成了苏俄政府帮助国民党开办军校的共识。孙中山对马林提出的“创办军官学校，为

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①的建议特别表示欣赏。不过，限于当时条件，这一共识并未立即付诸行动。

1922年6月，向来为孙中山所信赖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甚至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陈炯明的倒行逆施令孙中山极为失望痛心。他认识到：在中国，单凭革命党而没有革命军的奋斗，革命难以成功；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有一个坚强的党和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他因此而下决心从此要以俄为师，在建设一个革命的国民党的同时，创建一支革命武装，并创办革命军校，以此来挽救中国的危亡。^②

1923年1月，苏联^③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在上海举行会谈。以俄为师建立革命武装和接受苏联对中国建立革命军队提供的援助是这次会谈的中心议题。其后，在孙中山授权下，廖仲恺在日本同越飞继续举行会谈，其中，由苏联帮助孙中山创办军校，亦是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府。8月，应苏联政府邀请，孙中山决定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俄国革命后的党务与政治军事的组织，以资参考。同时，还就苏联援助问题进行谈判。9月2日，这个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在此逗留两个多月后，于11月29日

①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社（台北）1976年版，中译本第5册第251页。

② 参见《孙中山选集》第54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苏俄于1922年12月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启程回国，12月15日抵达上海。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军各方面的热情接待，尤其是“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①是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从而使国民党加快了创建一所革命军校的步伐。

在“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的同时，国民党于1923年10月通过了一项《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接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又议决组织军官学校，初步拟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担任校长，指定廖仲恺、鲍罗廷等着手筹建。1924年1月，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命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长，校址选在广州市附近的黄埔岛。2月1日，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

经过半年之久的紧张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5月5日进校，6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是日，孙中山亲临大会发表演说，历数革命的艰辛及创办这个军校的必要性。黄埔军校以孙中山为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以上述3人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直隶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之

^① 《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下分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6个部。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与所有讲武堂所不同的是，黄埔军校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一是强调对学生进行革命理想教育，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二是有严明的纪律；三是突出重点学习，不尚空谈，快出人材，学以致用。

1924年8月1日，军校第二期学生进校。

同年10月10日，由帝国主义操纵的广东商团军为破坏广东的革命形势，扰乱革命秩序，开枪射击游行群众，当场打死二三十人，并煽动群众反对广州革命政权。当时，孙中山正率部驻扎韶关拟行北伐，广州兵力空虚。10月14日，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决定对商团实行镇压，黄埔军校师生遂成为这次行动的主力军。他们初试锋芒，英勇战斗。15日，商团军被缴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受到极大打击，黄埔军校则声名大振。

为了给毕业生提供带兵实习的机会，1924年11月20日，黄埔军校成立了教导第一团；12月26日，又成立了教导第二团。以上两团统称“校军”。

1924年12月12日，第三期学生进校。

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第一、第二教导团和第二期学生总队及部分粤军，自1925年2月1日开始东征。3月21日攻克陈炯明根据地兴宁城。正当部队乘胜追击时，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来，部队暂停进攻。此为第一次东征。在此期间，为了给参加东征而尚未毕业的

第二期学生补习功课，于1925年3月开办了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由何应钦任教育长兼代校长。后因校军奉命返广州，分校便同时结束。后来，第二次东征时，该分校恢复。1926年12月，潮州分校停办。分校开办期间，共训练学生两期，毕业728人。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与陈炯明勾结，对抗广东革命政权。1925年4月28日，黄埔军校校军改为“党军”，讨伐杨刘叛乱，至6月16日结束战斗。8月26日，党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辖第一、第二师，蒋介石兼军长。此时，陈炯明残部又企图西犯广州。9月28日，以第一军为主，再次东征，至11月大获全胜。两次东征及讨伐杨刘叛乱，黄埔师生为稳定广东革命局势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上战役战斗中，黄埔师生有531人阵亡，408人负伤。

经过两次东征及讨伐杨刘叛乱，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广东革命政权所属的几个国民革命军先后设立了自己的军官学校，以适应大量培养军事、政治军官的需要。1926年1月12日，广州国民政府军委会议决：在黄埔第四期学生在学之际，改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合并各军设立的军校，合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军委会，蒋介石担任校长。改组后的黄埔军校分军官班、军官预备班、入伍生班，校址仍在黄埔岛。学校更名意味着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1926年3月至8月1日期间入学的学生为第五期，8月1日以后入

学的为第六期。

鉴于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6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作出迅速北伐的建议。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师北伐。7月26日，蒋介石离校，校务移交方鼎英代教育长代理。

北伐战争开始之时，黄埔军校第一、第二、第三期学生已毕业，共2259人。除第三期学生28人随军担任特别任务外，所有毕业生全部分拨北伐各军（比较集中地在第一军）担任军中干部。在校的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五期入伍生炮兵团、工兵营、迫击炮连，校部无线通讯队、交通工程队、宪兵营等也一起随军北伐。在北伐中，黄埔师生冲锋陷阵，英勇顽强，受到军内外交口称赞。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在此之后，国民政府由广州陆续迁往武汉，并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以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学府，训练储备革命的军事政治人材。

1926年11月1日，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在北京和全国各省、市陆续招生。招生办法采取公开登报和秘密招考相结合；考生条件规定必须具备中学文化程度；报名后经过初试和复试以及体格检查，最后筛选录取。还决定特招女生队1个。1927年2月初，被录取的新生开始报到。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等人出席了大

会。全校学生及入伍生共 6000 余人。其中包括由广州黄埔本校迁来的第五期政治、炮兵、工兵科 3 个大队，武汉分校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队和 1 个女生大队。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黄埔军校一部分师生追随校长蒋介石而去，其他人则以武汉分校为中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武汉各报刊披露政变的消息后，武汉分校师生闻讯，进行了愤怒声讨。校园内很快贴满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反对独裁！”“严惩屠杀工人的蒋介石！”等标语。军校职员及学生中的一些反动分子，慑于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及校内进步力量的声讨，不敢有所动作，只好随声附和。但到 7 月 15 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实行“分共”后，武汉分校很快便行分化。7 月 18 日，汪精卫等人借口从黄埔来的第五期学员已经“肄业期满”，下令让他们毕业离校，分配到各军，遣走了包括炮兵、工兵、步兵在内的 7 个连 800 多人。7 月 19 日和 20 日，武汉分校第五期第一（步兵）、第二（骑兵）、第六（经理）大队共 1480 人，奉蒋介石命令开赴南京。8 月 15 日，由汉赴宁的军校师生及在宁的军校师生，由何应钦主持宣誓反共。武汉分校所剩学生，不久又有 1700 多人被编为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悉数驻扎于南湖营房。除以上者外，武汉分校师生员工所剩无几。他们或自行回乡谋生，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1927 年 2 月至 1928 年 5 月，长沙也设过分校。

从 1924 年 5 月至 1927 年 4 月，黄埔军校共毕业学生

4200 余人，其中大多数成了国民革命军的骨干。从粉碎广州商团叛乱到东征、平定杨刘叛乱，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到北伐直抵中原，到处都留下了黄埔学子的光辉战绩。即使国民革命失败后，黄埔师生仍有一批忠勇之士，义无反顾，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但是，“宁汉合流”后，黄埔军校发生了质变。

二、十年内战时期的黄埔军校

1927 年 3 月 23 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自立国民政府。为了搜罗和培养反革命鹰犬，蒋介石依然重视军校教育，尤其是想继续利用黄埔军校的招牌。所以，他在南京建立政府后的一件大事就是委任陈铭枢为筹备主任，电召广州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尽速赴南京参与迁校事宜。由于南京蒋介石与武汉汪精卫的矛盾，迁校事宜一直拖到“宁汉合流”之后才议定。

1927 年 10 月 10 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刘士毅担任迁校筹备主任。11 月 5 日，军委会改校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8 年 1 月 4 日，蒋介石在短暂的下野后复职，仍兼任校长。3 月 6 日，第六期学生在南京举行开学典礼。第六期和第七期学生，因迁校南京而分为两地施教，入学和毕业时间皆略有差异。第六期黄埔部分分步、炮、工各科，1929 年 2 月 24 日毕业，及格者 718 人；第六期南京部分，1929 年 5 月 15 日毕业，共 3634 人。第七期黄埔部分，1930 年 9 月 26 日毕业，共 666 人；第七期南京部分，1929 年 12 月 28 日毕业，共 852 人。

1928年5月15日，军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1929年9月10日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

自第八期起，学生修业期限改为3年。第一年为入伍教育，让学生担任士兵勤务，以期毕业后能适应军中生活。第二、第三年为理论教育。在各个教育阶段，学生所学科目分学科、术科两种。学科包括陆军礼节、思想教育、步兵操典、步兵射击教范、野战筑城教范、通信教范、卫生学、战术学、地形学、兵器学、炮兵学、航空学、瓦斯学、战车学、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史、各国革命史、中国政治经济概况、人生哲学、外交史、法学概论、物理、化学、数学、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术科包括单兵教练、班教练、排教练、体操、射击、工兵勤务。学生除接受学科、术科学习外，都轮流服役，兼任各种勤务，诸如采办给养、监厨、营房及宿舍的整理、传令、卫戍等等。

第八期学生第一总队1930年5月12日开学，1933年5月20日毕业，计505人；第二总队1930年10月15日开学，1933年11月25日毕业，计1240人。两队毕业人数合计1745人。第九期学生1931年3月6日开学，1934年5月8日毕业，计654人。第十期学生编为两个总队，1933年7月15日开学。第一总队于1936年6月16日毕业，计940人；第二总队于1937年毕业，计621人。两队共毕业1561人。第十一期，1934年录取700人，编为入伍生第一团；后又录取预备生700余人，补习1年后编为第二团，先

后于1937年8月28日、10月25日毕业。第十二期，1935年9月28日开学，抗战开始后西迁九江，1938年1月6日再迁武昌，应抗战需要，同月20日提前毕业，计740人。第十三期招生工作于1936年8月在南京进行，共招生1580余人。抗战爆发后，学生由南京出发，经九江、武汉、长沙，再步行数千里，于1938年5月到达四川铜梁，继续接受正式教育，同年9月16日毕业，计1412人。

军官学校在南京开办期间，除正规班外，还开办过一些短训班。此外，还在南昌、广州、洛阳、成都、昆明、武汉等地设过分校。军校在南京时期共开办8期，即第六期至第十三期，为时10年。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埔军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鉴于抗日战争爆发的急迫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于7月26日下令黄埔军校举校西迁。至于迁往何地，当时尚无定论。8月，军校从南京迁出，辗转九江、武汉、四川铜梁，历时16个月，1938年11月到达成都后方才稳定下来。

迁校期间，因抗日前线需要军官，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期学生均先后提前毕业于西迁途中。而沿途又新招了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期。军校抵达成都时，新招的3期各保留1个总队，共计3个总队。

军校西迁成都后，教育方案有所改变：1、教育期限分为长期、短期两种。短期以军事学术科及步兵战斗为主；长期则重在诸兵种联合作战，入伍阶段注重数理化补习，正

规教育阶段要求掌握 1 门外语。2、实施三级教育。甲级教育：招收大专院校毕业生，修业 6 个月后到部队锻炼，然后再回校学习；乙级教育：招收大专院校肄业生，修业 1 年后到部队锻炼，然后再回校接受后期教育；丙级教育：招收高中毕业生，入伍 6 个月，修业一年半，是为正规教育。3、改进教育方法，注重理论与行动配合，即教、学、做三者结合。施行沙盘教育、实弹演习、劳动服务；参加筑路、架桥、修渠工作；实行教官、部队长、幕僚等轮换制度。

抗战期间，除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期是在西迁途中招生的外，到成都后还招收了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期，前后共 8 期，约 3 万人。其中，只有第十四期至第十八期毕业于抗战期间，且受抗战局势的影响，学生毕业时间都有提前。

抗日战争期间，各分校继续开办，它们是：第一分校，原洛阳分校。1933 年 8 月成立，1938 年 1 月迁陕西南郑，1938 年 3 月改称第一分校，1944 年底撤销。第二分校，原武汉分校。最早成立于 1927 年 2 月，后两度停办，1936 年 1 月再办，1937 年 10 月迁湖南邵阳，称第二分校。1938 年 3 月迁湖南武岗，1944 年迁会同，1945 年 5 月撤销。第三分校，原成都分校。1935 年 10 月 1 日成立，1938 年 1 月改称第三分校。1939 年 3 月改设于江西瑞金，1941 年 7 月迁江西广丰，1942 年 6 月迁福建邵武，继又迁回瑞金，1943 年 2 月迁江西会昌，后再迁回瑞金。1945 年 11 月至 1946 年 2 月裁撤。第四分校，原广州分校。1936 年 8 月成立，

1937年12月迁广东德庆，1938年1月改称第四分校，同年10月迁广西宜山，随后迁贵州独山，1944年12月迁湄潭，1945年2月撤销。第五分校，原昆明分校。1935年成立，1938年1月改称第五分校，1945年9月至1946年春裁撤。第六分校，原南宁分校。1926年5月成立，1929年迁桂林，1930年迁柳州，后迁回南宁。1938年3月再迁桂林，称第六分校。1944年10月迁宜山，后迁百色。1945年底撤销。第七分校，原天水分校。1938年3月成立，1939年迁西安，1945年11月裁撤。第八分校，原设湖北均县。1940年1月成立，1945年5月迁房县，同年6月撤销。第九分校，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43年3月成立，抗战胜利后撤销。

自1944年起，南京国民政府（时驻重庆）裁撤部分军事机构，军校各分校也于此时开始裁撤。各分校学生或肄业，或转入其它军校继续学习。

四、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的黄埔军校

1946年元旦，军校易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同年4月，教育长万耀煌奉调主鄂，由关麟征任教育长。不久，蒋介石不再兼任校长，遂命关麟征升任校长。抗战胜利至1949年10月，军校共招生两期，即第二十二期和第二十三期。为了适应打内战的需要，国民政府除了扩大正科招生外，于1947年命令已经停办的一些分校陆续改办为7处军官训练班，主要设在北平、西安、沈阳、台湾、迪化、汉口、徐州等地。至1949年秋，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军校附

设的军官训练班几乎全部散伙，仅存第四（台湾）、第六（原设汉口，后迁往广州）军官训练班。军校校长关麟征鉴于当时的局势，为保存军校实力，曾建议国民政府将幸存的第四、第六军官训练班现有人员、器材及成都校本部特科人员、器材合并于台湾凤山，成立本校分校。旋又变更计划，仅就第六军官训练班改组设立，并将该班移驻海南，以文昌县属之青澜港营房为分校地址，召训第二十四期学生，未几即停办。同年9月7日，关麟征调任陆军总司令，9月20日由张耀明继任军校校长。

尽管国民党妄图以加速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来挽救军队，以适应扩大内战之需要，但是，打内战不得人心，腐朽的政权更遭人民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已不可逆转。此时，军校第二十三期学生正修业未滿，但迫于形势，奉令于1949年12月4日毕业，不过并未离校。为了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军校除以两个学员大队留守校舍外，其余2800多名学生和国立政治大学迁到成都的学生逃出成都，企图在人迹稀少的西昌境内建立反共基地。但是，此时的军校因其本身和战争性质的变异，学生之士气及战斗力远非北伐、抗战时期可比。逃出成都者，大部被歼于大邑境内，余部溃散于川康边境。第二十三期学生中，只有77名台湾籍学生从成都空运至台湾，得以脱逃。

五、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期的黄埔军校

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到台湾后的1950年8月，罗友伦中将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以台湾凤山原第四军官训

练班班址为校址，正式恢复该校。

1951年4月，复校后的第一批学员——黄埔军校第二十四期学生入学。至1983年底，即黄埔建校60周年前夕，从第二十四期至第五十五期，共招生32期；毕业学生从第二十四期至第五十二期，共29期，达1.15万余人。继罗友伦之后担任校长的有：谢肇齐、徐汝诚、艾瑗、张立夫、林初耀、秦祖熙、言百谦、许历农、朱致远、卢光义、黄辛强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对军校教育做了较大改革，其共同特点是：相对战时学制延长，课程设置也有所变化。黄埔军校复校后，国民党在感到反攻大陆一时无望的情况下，也逐步做了一些改革。1954年6月，蒋介石指示军校学生自第二十七期起修业期限延长为4年，强调哲学、自然科学、兵学三者兼顾。军校自此开始推行所谓“新制教育”。1975年，再度修改教育体制，自第四十七期起延长学制为4年零3个月，对教学内容、招生、分配也作了较大的修改。以往教育以军事学科为主，普通学科为辅，改制以后，普通学科占总学时55%以上，使学生的自然科学水平尽量达到一般大学生程度。为了达到此目的，军校还特地接受台湾“教育部”督导。学生毕业后，除取得军官资格外，还由“教育部”授予理学士学位。1977年，经校长言百谦向台三军参谋总长建议，并征得“教育部”同意，自第四十八期起增设文科，毕业后授予文学士学位。

新学制实施后，军校与地方大专院校联合招生。但从

1955年起，又改由台湾“国防部”所辖军事院校联合招生。从1957年起，可以从军队士兵及高中应届毕业生中保送。

军校在凤山复校后，在学校管理方法及课程开设上，还吸收了一些西方军事教育的经验。如参考美国西点军校教育科目设置，普通学科施教分系，设政治、文史、外文、数学、理化、电机、机械、军工、测绘等9个系。军事学术科设军事训练部，下辖战术、一般、兵器、体育等4组。此外，也办过若干短期训练班、预备军官训练班、补训总队、专修学生班、专科学生班等。不过，比起战争时期，训练班是大大减少了。

关于《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 成文时间的考证

谢 忠 厚

《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是一篇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关于这一指示电的成文时间，过去一般以1981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为准，认为是由刘少奇在1937年10月20日草拟的。但是，根据近几年所掌握的有关资料，我认为上述判定有疏误。

一、我认为《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成文时间不在1937年10月20日。根据如下：第一、这个指示电是发给聂荣臻的，但此时（1937年10月20日）聂荣臻尚未奉命担负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聂荣臻1943年在《关于晋察冀边区六年来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说，他奉命留驻五台开创晋察冀根据地的任务，是华北军分会约在1937年10月23日决定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一书写道：1937年10月22日，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主力向晋东南转移，该师政治委员兼副师长聂荣臻奉

命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开创抗日根据地。^① 这表明，把发出《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时间判定在1937年10月20日是有所提前的。第二、晋察冀军区的成立，是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前提条件；但在1937年10月20日，这个前提条件尚不具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1937年10月25日向毛泽东《关于晋察冀绥军事部署的报告》中，才明确地提出了成立晋察冀军区的决策，并初步规划了晋察冀军区的范围。《报告》称：“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②第二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重要决策。根据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的记载：1937年10月27日，在五台县城准备成立晋察冀军区，11月7日正式宣布了军区成立的命令。^③晋察冀军区的成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从而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提供了客观要求和根本前提。由此可见，《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成文时间，应在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第三、从《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行文来看，也是与1937年10月20日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例如，“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

① 《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97页。

②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第49页。

③ 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第9页，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39年5月1日出版。

政府委员会”、“主席即以宋劭文担任”等用语，很清楚地表明这一指示电是对有关请示报告的答复。显然，这样的来往电报也是只有在晋察冀军区成立之后才有可能的。

二、我认为《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确切时间是在1937年11月16日。因为，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的酝酿和筹备，最初起于聂荣臻的一个请示报告。1937年11月8日，即在晋察冀军区成立的第二天，聂荣臻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关于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等问题的请示报告》。聂荣臻写道：晋察冀既成立军区，政权亦应有一统一组织。我意即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下分财政、民政、交通、经济、文化、锄奸等处。即以阎^①委之行政委员宋劭文担任主席。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并致周恩来转北方局。5天以后，即1937年11月13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对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做了批复。他们提出“晋察冀边区政府稍迟再成立为宜”，认为现在中心工作要加紧壮大我军，组织游击队，组织党和改造县区乡村政治机构，准备粮食和经费等。很明显，这个批复在内容上是与《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有很大区别的。又过了3天，即1937年11月16日，周恩来、刘少奇才就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问题致电聂荣臻并转晋察冀省委。指出：“（甲）在晋察冀全区，为加强〔与〕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

① 即阎锡山——编者注。

(一) 立即普遍进行区乡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民选。(二) 由当地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代表组织临时县政府委员会，好的县长可当主席。(三) 立即筹备〔临时〕边区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主席即以宋劭文担任。”电报还对边区政府的组织机构、基本政策以及筹建边区政府的策略等作了明确指示。周恩来、刘少奇的指示电，同时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向应、张浩、邓小平、朱瑞、彭真、彭雪枫等，并报毛泽东、洛甫（张闻天）。从内容和行文来看，周恩来、刘少奇的这个指示电，即是《刘少奇选集》收录的《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原始件。由上述3个相关的文献资料可以判定：《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成文时间应为1937年11月16日。

顺便指出：根据有关资料，《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署名，亦应由刘少奇为北方局起草的电报，更正为周恩来和刘少奇两人起草之。

三、我认为《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时间之所以会发生疏误，大致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这个指示电曾被收入1945年2月印发的《华北工作座谈会》文件中，当时题为《北方局给晋察冀指示电》，并标明时间：“大概是在1937年10月20日左右”。加以比较，就会发现1981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正是收录了这个版本，将题目作了相应的变动，改为：《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但是很可惜，在时间上，把“大概”、“左右”4个

字疏漏掉了，结果变成了“1937年10月20日”的确切判断。二是《刘少奇选集》在收录这个版本时，可能受到有关史料的限制。例如，那时可能还没有掌握上面提到的聂荣臻有关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的请示报告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有关批复，特别是周恩来、刘少奇的有关批复等重要文献资料。因此，没能对不同版本进行比较，所以对该文电的成文时间作出了不准确的判定。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五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